

回忆少奇同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回忆少奇同志

本社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回忆刘少奇同志的专集，包括张爱萍等同志的六篇文章。作者通过亲身经历的事实，生动地反映了少奇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忘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与信任。从这些亲切动人的故事中，读者可以了解到少奇同志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考虑和处理问题的深思熟虑与周密细致，待人接物的诚挚谦虚，平易近人，以及他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和自己的艰苦朴素生活。

这些回忆录都是一九六六年前所写，这次出版时，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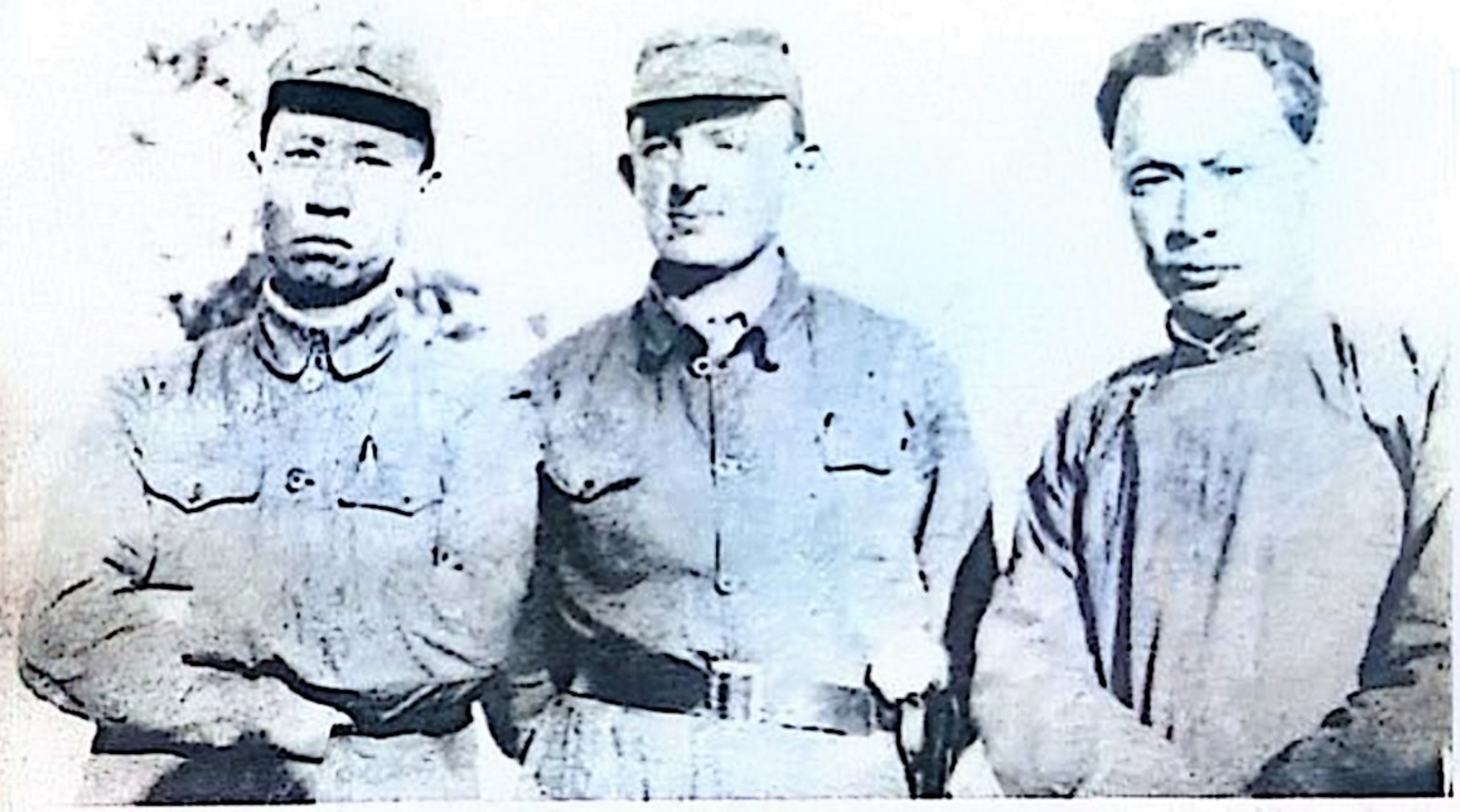
回忆少奇同志
本 社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6.75印张　2插页　105千字
1980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定价0.39元



刘 少 奇 同 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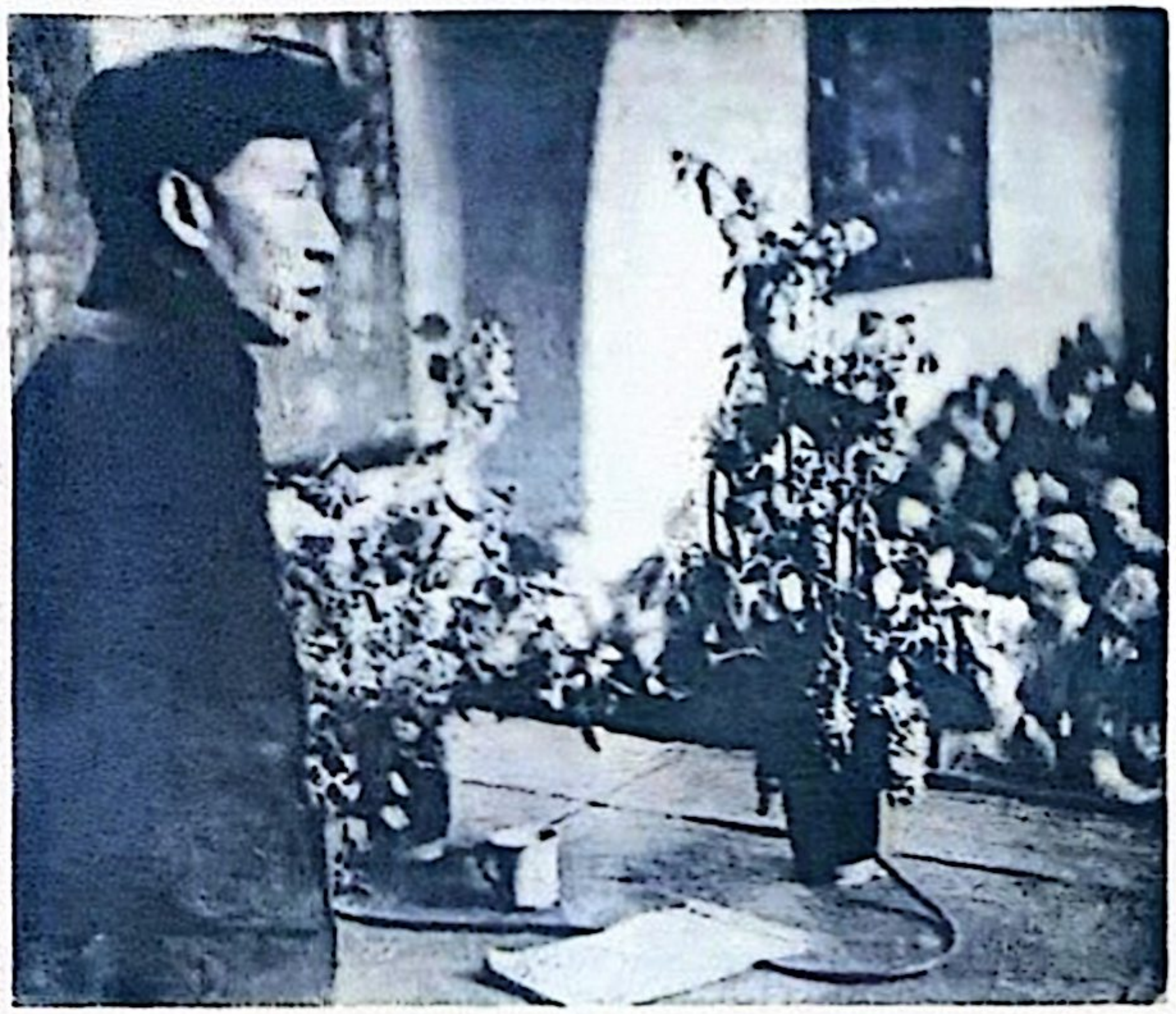
1924年6月，刘少奇同志与安源路矿工会工人学校教职员合影。



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同志，代军长陈毅同志和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1941年在江苏盐城合影。

刘少奇同志在苏北盐城新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





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目　次

真理的启示 ……………………………… 袁品高（1）

在刘少奇同志身边 ……………………… 张明生（7）

回忆往事

——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的片断 ……… 杨至成（14）

刘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 ………………… 马　文（24）

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敌后 ……………… 张爱萍（36）

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 ………… 吕振羽　江　明（53）

真理的启示

袁品高

“也好，去看看”

一九二二年，我在安源矿挑脚，挨了工头一次毒打，就很幼稚地下决心要学点本事护身，也好打抱不平，于是我就跟人学“国术”。那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好久了，我却一直不闻不问，一心只想把“打”学出来。

一天晚上，同房的两个工人谈起俱乐部工人补习夜校的事情，不记得谁问我：

“老俵，为什么不到夜校去读书呀？”

“我不读书，也不想读。”

“为什么，是跟谁赌气？”

“我读书被公公打伤了，怕读得。”

“夜校的老师很好，不打人也不骂人，对人很和气，我们工人去了他们在门口接，我们走时他们还送到门口。”

“你拳也学，书也读，做个文武全才不好吗？”有人开玩笑似的给我出了个主意。

我想，拳一定要学，书读不读没关系，“工”字不出头，读书也没用。但口里却随便说了句：“也好，哪天去看看。”

过了几天，我来到牛角坡工人补习夜校。一进门，李隆郅(立三)同志就热情的接待我。恰好不知谁找他有事，他就给我介绍说：“你和刘老师(即少奇同志，他是一九二二年罢工前不久由毛主席派来的)谈谈吧！”

少奇同志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后，又问：“你读了几年书？”

“别提了，小时候读书被公公打怕了。”

“我们是反对老师打人的。”少奇同志笑着说，又问我在哪里做事，多少钱一个月，家里几口人，生活过得怎样。临走时，少奇同志送我好远，希望我去夜校读书。

工人们说的倒确实，老师果然很和气，这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

第二次谈话

第二次，我刚跨进夜校门，少奇同志就喊我：“袁品高，你来了！”我心里想，我只来过一次，停了这么久，他还记得我的名字，这先生真好呵！

过几天，我又去了。少奇同志问我：

“你在洋炉炼焦处哪个工头名下做工？”

“傅桃滦名下。”

“傅桃滦对工人好不好？”

“还好。”

“有什么好呢？”

“他打架就要打赢。”

少奇同志笑了起来，说：“打不赢呢？”

“打不赢，替我们赔礼都可以。”停了停，我又补充说：“和别处打起架来，他还给我们工人助威。”

“呵！打谁呢？”少奇同志问。

“不是洋炉炼焦处的工人，就是土炉炼焦处的工人。”

“嗯，他还有什么好处呢？”

“讲点义气，供人读大学。”

“供什么人？”

“他一个堂兄弟。”

少奇同志笑了一下：“呵，这也是做好事呀？”

我有点脸红了。

停了下，少奇同志又问我：“傅工头还有什么好？”

“赌钱不打赖，用洋瓷脸盆装花边(银洋)。”

“呵！”少奇同志又笑了：“你们的工人真有好处呵！”

我懂得这是反话，还辩解说：“刘老师，我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少奇同志脸上变得严肃起来，沉重地说：“老袁，你想一下，他好打架，可打的什么人？讲义气供人读大学，又供的什么人？赌钱不打赖，用洋瓷面盆装银洋，他哪来这么多钱？”

我怔了一下，咄咄地说：“钱，他有的是。洋炉炼焦处的花边，一箱箱的，他自己搬不了这么多，就请人去掮。”

"你们怎么搞不到钱呢？怎么连饭都没有吃呢？"

"我们是赚硬的。"

"为什么不想多赚点呢？"

"我们没有三亲六友，想不到。"心想：我们想是想，就是"八字"不好。

少奇同志把我的膀膀摇了下："不是想不到，是没得团结。"

"不好团结，权在工头手里。"我说。

他做了个手势，比画着："一双筷子容易断，多了怎样？你们洋炉炼焦处、土炉炼焦处几百人，通通团结起来，你看力量怎样？你回去好好想想看。"

这夜，我的心老在打滚，好似有了结头解不开：工头为什么能赚钱买田，我们却苦得没法？我竟寻思起少奇同志最后说的一句话："要知道他们的钱是怎样赚来的。"

真理的启示

一夜没有想通，第二天到夜校，少奇同志问我说："你想了没有？"

"想不通。"

"我告诉你，"少奇同志说，"你去找个工人谈话，要找生活苦的，问他工头哪来的这么多钱买田、置地、赌钱。你也许以为：是命。他会说：'不是什么命，是他们吃了工人的血，把工人当牛马，他们剥削了我们。'你不相信，他又告诉你：'工头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要养活一家，还要请女工、买田、用面盆装花边赌钱，不是剥削工人哪来的这么多钱？是你蒙在鼓里了。'接着，他又说：'你或者以为有菩萨助他。'他就会问：'为什么专助这些人，不助穷人呢？'"

"菩萨，我根本不信。"我又说，"我家二公公教过书，他不信神，别人叫求神，他胡子一抹：'行时不要神灵保，神灵不保失时人。'"

"是呀！你去找穷人，他们会把真理告诉你的。"

我说："穷苦人到处是，不要找，我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彭冬生是最苦的一个，他外号叫婆公，人高大，穿件烂袄子，无钱缝新的，见到地上有块布就捡起来补，俗话中只有百家衣，他的就成了千家衣，五斤十二两重，裤子四斤，合起来九斤十二两。"

"他为什么这样穷呢？"少奇同志问。

"他家人口多，生活顾不来。他每月总是打连班，傅桃藻看他多发了几个钱，青面獠牙，算盘子滴哒滴哒，东一扣西一扣，却总发不到钱，还欠一身账。"

少奇同志听我这么说，笑着问道："你不是说工头好吗？"

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好什么，工头真好恶啊！"

要 算 账

少奇同志的话就象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的心窍，从此，我认识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道理。我想，单学打没有什么意思，到夜校读书去！

我又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找可靠的工人谈谈工人受苦受难的原因，他们的心一下都亮了，都到学校里来找少奇同志，要求和工头算账。

罢工的前一天，我又去找少奇同志，说："工人们一定要找工头算账！"

"那好！"少奇同志很高兴地说，"他们靠得住吗？"

我肯定地回答他："靠得住！"

"他们会听你的？"

"会听。"

"你怕不怕呢？"

"怕什么？说了不怕就不怕。"

"杀头呢？"

"杀就杀。"

"那好，今天晚上我们要罢工，不光是找工头算账，还要同矿上的官僚资本家算账！"

"那太好了！我们工人早就要干了！"

少奇同志接着指示我："要得，你负责洋炉炼焦处、洗煤台，汽笛一叫，你就把人集合好，和全矿一同罢工。"

他一说完，我就飞快地向指示地点跑去。

在刘少奇同志身边

张明生

接受任务

安源大罢工胜利后，我是俱乐部的纠察队员。一天，我在纠察团值班，忽然文书股长李求实同志对我说："老张，以后你负责保卫少奇同志，他有事出去，你就跟着他，怎么样？"我十分兴奋又有些胆怯地说："就怕不行！"求实同志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你行！这是经过党内讨论决定了的，认为你一定能搞得好。"我马上回答说："好，尽我的一切能力，保卫少奇同志。"

这一夜，我的脸在发烧，心总是突突地跳着。因为我感到一个普通工人能够跟随在少奇同志身边是极大的光荣，同时又感到责任的重大。一身是胆的少奇同志为了我们工人和拥有强大武装的资本家进行着斗争，今天，党把保卫少奇同志的任务交给我，这是党对我的极大信任，我一定要出色地完成这个极其光荣的任务。

第一次出差

第二天，少奇同志要到萍乡县衙门去磋商要事。我想，让我们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徒步十几里，怎么行呢？为了不让资本家笑话我们，我便赶忙在花冲找好了一顶轿子，请来几个工人。早饭后，少奇同志收拾了公文，走出大门，看见一顶轿子停在门口，便问："这是哪位老爷来了！"我说："谁也没有来，给你准备的。"少奇同志很不高兴，接着和蔼地对抬轿的人说："谢谢你们！我们俱乐部的人和你们一样，走惯了路。麻烦你们了，请你们抬回去吧！好在时间还早，可以找点别的事做。"

我怪不好意思起来，一下子不知怎么办好，呆住了。少奇同志用严肃但又温和的语调对我说："张明生同志，我们不能和资本家比呀，我们是俱乐部的人呀！"我的心忐忑不安，一句话也说不出。少奇同志走近我，拍着我的肩膀说："下次注意就行了！还是走路去吧！走路很舒服，又可锻炼身体。"顿时，我盈眼眶的热泪一下子全流出来。这倒并不是因为受了批评才流泪，只感到象在家里做错了事，父母不责怪，反而说："好崽，下次小心，去玩吧！"我心里翻腾得很厉害，责怪自己怎么这样不懂事！

少奇同志很瘦，精神倒很好，走起路来很快，脚步哧哧地响，我得紧跟才行。他怕我这个年轻的"通讯员"面子难为情，便放缓了脚步，对我说："我们去见他们，架子要装得足点，你做这个工作有意见吗？"

我说："很高兴做。"少奇同志说："高兴就好办！你是我的保卫，对外叫'通讯员'，回到家里就不分彼此。"

到了县衙门，我为了装出自己是主任的"通讯员"，故意双手捧杯茶给主人喝，然后递上主任的名片。他们谈话时，我坐在门口保护主任。

晚上，事情磋商好了，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少奇同志要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关了门，有说有笑谈起当天的事。少奇同志称赞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通讯员"扮得很象。

烟

那时我们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不分主任、通讯员，每个月都是十五块钱。少奇同志很爱吸烟，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慢步地踱着，向后理理头发，接连地抽着烟。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为了我们一万多工人的生存，在时局紧张的时候，他更是通宵地坐在灯下考虑问题，没有一点睡意。

工作时间长，烟就吸得多，有时烟盒空了，钱也没有了，他从不要求提早领薪，只是熬着不吸。实在要吸的时候，就用纸卷着烟头吸。他平常在家时吸剩的烟头从不随便丢掉。

我们看到他这般艰苦，心里发痛。有一次，提早给他领了薪金。他一看日历便问："这是哪里来的钱？"我说："看你烟都没有吸了……"少奇同志没等我说完，坚持说："薪金发放的时间是主任团决定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要不，当家的（管财经的）怎么办？你看，我不还在一样的吸烟吗？"他

这一说，我很难过，但又为他这种模范遵守财经制度的行为所感动。

我自己也很穷，以后我只好经常多买点烟装在袋子里面，见他没有烟了，就多拿几支给他。

'唱戏的旧龙袍'

我对"组织处"这个工作很感兴趣，由于经常到各处走动，见识多了，每次出外时，我总是打扮得像商人模样，脚上是光亮亮的皮鞋，一身学生装，内衣还是拉链的，这是要工贼看不出，摩登工人的"时髦装"。

少奇同志穿得很朴素，只有一件发白的长褂子，外出回来便脱掉，脚上大都穿布鞋，袜子都是补的。冬天，一件长得拖地的老式的大衣，袖子很短，我们称它是"唱戏的旧龙袍"；皮鞋也不好，后跟底缺了半边。一顶几年戴的绒帽子，旁边还有个洞。穿的一双袜子，外面看起来还好，可以保暖，但当我和他睡在一起时，才发现有洞子，袜底早已没有了。我问他穿了多少年？他说："还是家乡的土货呢！"穿着的东西烂了，我叫他拿去叫家里补，他说："行了，不要麻烦人家，不冷就行，多考虑一下工作吧！"

一天，我刚从外面回来，俱乐部总干事陈然看看我们两人穿的不一样，便对少奇同志开玩笑："主任呀！你的'勤务兵'比你还穿得好。我看，你倒像他的'勤务兵'呢！"少奇同志哈哈大笑说："那当然罗！工人生活改善了，应该穿好点。"他的话，含着多么深长的意味呵！少奇同志冒着生命危险

来领导工人运动，还不是为了大家的生活幸福，为人民当勤务员吗！

开水泡饭

少奇同志工作认真，工人有什么事找他，总是耐心地说服，把问题一直解决才罢手。

在生活上，少奇同志更不麻烦别人。我们往往外出有事回来晚了，大家都把菜吃光了。可是，少奇同志从不叫厨房炒饭做菜，总是用开水泡饭吃。我心里很不好过：主任每天工作到半夜，身体又不大好，有时还吐血，生活这么苦，怎么行呢！我每次总想弄点好的东西给他吃，他总是阻止我说："现在我们的生活不是很好吗！伙食费虽少些，可要为大家着想！不要为我一个人去烧火做饭菜，麻烦厨师，弄得他们得不到休息。"

厨师见少奇同志身体不好，又不让专为他做点菜，因此，往往打好一碗鸡蛋的热汤放在锅台上，等他回来吃。但他也不肯，硬要留给大家下饭吃。

"要永远记住"

一九二九年五月间，革命形势大大好转了，当时，安源矿工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广东去的很多，今天去几个，明天去几个。不久，党决定派我到广东去参加农民讲习所第二期学习。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使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得到可贵的学习机会，有了本领，将来可以为群众做

更多的事情。难过的是跟随少奇同志三年，在少奇同志的亲切教导下，使我提高了觉悟，增长了革命的知识，现在要离开他远去广东，又如何舍得呢？

第二天欢送我们时，我的心跳得更厉害，我马上就要离开路矿工人俱乐部，离开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同志们，离别少奇同志了，我紧拉着少奇同志的手，泪水直往下流。少奇同志亲切地嘱咐我："张明生同志，不要难过，我也舍不得你离开。为了革命的需要，这是党的决定。要永远记住，离开安源到那里去，不是去当官，要保持安源的作风，更好地做个人民的勤务员。"

我到广东不久，大约六、七月间，听说是党的工作需要，少奇同志离开了安源，调往全国工会联合会去了。

在广州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年，在广州我又会见了少奇同志，他那时是全国工联副执行委员长。少奇同志象在安源一样，穿的还是那件大青布衣服。我那时穿的却是呢子衣服，马统皮鞋，站在他跟前一比，我尴尬起来，暗自责怪自己没有保持安源工人的艰苦作风，以至于原来准备的许多话也都忘记讲了，只是说："以后我每个星期来看你。"少奇同志还是那样亲切地教导我："有时间就来吧，不要耽误了工作。现在重要的是工作，要好好地做好我们的工作。全国人民都等待我们去打倒军阀，解除痛苦呀！"我这时才发现，旁边还有好多人等他谈工作，我不能再耽误他的时间了。

一路上，我反复想着，少奇同志真了不起！在安源是这样，到广州还是这样。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耐心地教导每个同志。只要同志有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一直到彻底解决为止。难怪安源工人对他都非常尊敬和热爱。

三十二年的时间过去了，少奇同志经历了多少风险和艰辛啊！现在我是多么盼望着能再和少奇同志相见啊！

回忆往事

——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的片断

杨至成

一

一九三一年冬，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的时候，少奇同志是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的委员长。我在军委会总供给部工作，为了保证红军和前线的物资供应，我们组织了一些工厂，兵工方面有枪械厂、弹药手榴弹厂；军需方面有被服总厂，分厂下设纺织厂、鞋袜厂等，另有卫生材料工厂，大大小小的工厂有二十多个。工人分两种，一种是长期工，一种是临时工，合在一起大约二、三千人。这些工厂的行政管理工作受军委会供给部军事工业局的领导，工会工作直接受全国总工会执行局的领导。因此，我们在工作上经常得到少奇同志的指示。少奇同志在瑞金的时候，在苏区范围内，在军事方面建设了一些新的工厂。少奇同志对于军事工厂的领导极其重视，付出了很多精力。少奇同志遇事都非常认真，生活很朴素，平易近人，到处和群众打成一片，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工人和工厂的情况。

当时，军事工厂有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般的，而是很突出的，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军事工厂的管理上，干部都是从军队里调来的，习惯于用管理军队的方法去管理工人，因而工厂管理不得法；二是由于这些工人有的从城市和农村招来，并有少数是从俘虏兵里挑出来的，他们的阶级觉悟不高，在工作上缺少主人翁的思想，而是以旧的观点对待工厂、对待工作。这样一来，工厂就有些混乱，管理不得法，生产规程没有很好确立，工人干劲未能鼓起来，因此生产效率就不怎么高，对于保证前线供应大有影响。

正在这个时候，一天晚上，少奇同志找我去谈话，谈到军事工厂管理问题，他很恳切地告诉我说："管工厂不是带兵，目前的管理方法要改善，最好你们召集工厂负责人开个会，认真地研究一下管理工厂的方法和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当时，少奇同志和风细雨地与我谈了这些话，我真比吃了一服清凉散药还得劲，立即答应说："好！一定办。我们准备一下就召集会议，希望少奇同志出席指示。"少奇同志点点头说："你们开会我一定来参加。"

我从少奇同志那里回来，就着手召开军工会议，研究各工厂存在的问题。我找来几个同志在一起研究分析工厂的生产管理情况，想先通过一些实际材料，找出真正的原因来，便于开会时让大家讨论，得出统一的认识，改进工厂管理。当时对如何管理工厂有两种意见。有一部分人认为我们所领导的工厂是军工生产性质的，生产任务又紧又重，工人都是新来的，有些还是从俘虏兵里挑出来的，觉悟不高，

封建的地方观念浓厚，时常闹不团结，因此，需要用管理军队的方法去管理工厂。有一部分人认为上述意见是不对的，苏区的工厂是人民的工厂，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不象白区的工厂是属于中外资本家的，那里的工人是受剥削和压迫的。因此，管理工厂的方法，要用民主的方法，依靠工人群众来管理。工人觉悟不高，是教育问题，通过耐心教育可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树立主人翁的思想。这两种意见是对立的，但都是从改进生产管理出发的。因为，工厂当时确是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卫生材料厂一次坏了酒精三十多坛，手榴弹厂制造的手榴弹有些甩出去不爆炸，被服厂做的衣服有些因缝得不牢，一穿就脱线，等等，许多问题都是很严重的。于是我就将这些情况和工厂干部中存在的两种对立思想详细而具体地写了一个材料送给少奇同志。供他在开会讲话时参考。

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南方正是暑气逼人的时节，就在这个月的下旬，军工干部大会召开了，到会代表不仅有军工干部，还有各工厂选出来的工人代表参加，共约百余人，齐集一堂。开会地点是在军事工业局大厅。会场布置整齐，墙壁上贴满标语。记得其中有两条醒目的大标语，大意是“依靠工人群众，改进工厂管理”；“努力提高生产，保证前线供应”。特别是听说少奇同志要来出席会议，还要讲话，到会同志都很激动，个个心情振奋。约八点钟的时候，少奇同志果然来了，他上身穿了一件对襟短褂，下身穿的是一条齐膝短裤。见了少奇同志，大家都轰动起来，掌声四起，好久平

息不下去，足见大家对少奇同志的敬仰。

大会正式开幕了，我先将军工情况作了一个综合的报告，然后就请少奇同志讲话。此时，场内又热烈鼓掌欢迎。少奇同志走上讲台，示意不要鼓掌，于是场内顿时一片寂静。少奇同志首先讲到军工生产的进展和成绩，鼓励大家好好工作，并指出当前工厂存在的问题。他说：“工厂不象军队，它不是战斗组织，而是一个劳动生产组织，比军队的民主范围要广泛些，用管理军队的方法来管理工厂是行不通的。”话虽几句，却把问题的要害打中了，接着又说：“我们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工人要管理天下，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应当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并在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关心工人的福利，鼓舞工人生产情绪。”在说到军工干部的责任时，少奇同志耐心地告诉大家应该怎样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打成一片，帮助工人提高阶级觉悟。他告诉工人代表同志要认识新旧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在资本家的工厂劳动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我们应当反抗；在苏维埃政权的工厂劳动，工人已经成为工厂的主人了，应当自觉地积极生产。工厂就是家。他还谈到办工厂首先要认清目的是什么。他说军事工厂是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的，不仅产量质量要高，成本要低，还要保证及时供应，生产应当有计划性，要有成本核算，工人的工资应按技术高低来评定。他甚至对于很具体的问题都了解、都关心。他说鞋袜厂打草鞋不合算，应当发动战士在空闲时自己打草鞋。最后，他号召干部和工人密切合作，共同管理，积极生

产，完成支援前线的迫切任务。少奇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出席会议，大家已够高兴的了，现在又作了这样重要的讲话，讲得深入浅出，听起来既容易理解又觉得意义深长，使大家思想豁然开朗，无限兴奋。

会议开到吃午饭时，宣布休会。下午分组讨论少奇同志的重要讲话。在讨论中大家找到了管理工厂的门径，对几个思想一时还不通的同志，进行了群众性的说服教育。使到会同志统一了思想认识，交流了工作经验，都满怀信心地各自回到工厂中去。开完这个会议后，少奇同志又把会议精神写了一篇文章，登载在《苏维埃政府报》和红军的《红星报》上。由于少奇同志的关心和重视，给军事工厂的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因此，军事工厂经过这一番整顿，就逐渐有所改变了。

少奇同志在军工会议之后，经常要我们去向他汇报工厂的工作情况。他听汇报总是聚精会神的，有时还记在本子上；他要求向他汇报工作的人，汇报情况要清楚准确，不喜欢听含糊其词的话，如什么"大概吧"一类的说法。更不容许浮夸。有时，为了搞清和研究一个问题，他直接把工厂负责工会工作的干部找去谈话，亲自了解情况。有次，我汇报到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高涨的时候，他问：巩固不巩固？我说：不能说巩固，还缺乏一种巩固热情的措施，有些思想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他说："问题多怕什么呢？可以研究解决嘛！我主张你们还是搞劳动竞赛，巩固生产热情。"于是，他又详细地讲解了怎样组织劳动竞赛。根据少奇同志的指

示，我们回来后，经过会议讨论，立即在工人中组织劳动竞赛，分别不同工种、不同年岁的人，开展个人与个人、组与组、车间与车间、厂与厂的竞赛，定期评比。少共还组织了轻骑队(即生产突击队)，发现哪里生产成绩不好，他们就到哪里去突击。为时不久，工厂的工作就有很大进展。这时候，少奇同志见了我，又提醒我说："工人生产情绪越高，越要关心工人的生活，特别是安全工作，防止事故。"我觉得这个指示很对，我们就想了一些办法，解决工人的福利问题。苏维埃政府还办了工人医院给工人治病。

在劳动竞赛中，工厂党委和支部都加强了领导，军工干部的管理方法都有了很大改进，生产任务都要交给工会组织工人讨论，干部经常到车间和工人谈心，这样一来，干部和工人更加团结，关系更加密切了，一个工厂宛如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生产也不断上升。我记得一九三四年三月，军委负责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曾提到关于供给工作的一些情况，他这样写道："春夏季的衣服，我们已经有了百分之八十的保障；步枪弹的生产二月份比一月份增加百分之百，三月份可增加百分之五十；手榴弹生产二月份比一月份增加百分之百，三月份可增加九倍；卫生方面能够自己制造药品、器材，有些自制药品比西药的效力还好些。同时，我们的药能及时赶上部队的需要。今年要使每个红军战士能够种到牛痘。"

这些比例数字，表明了军事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我们得到这些成果，是由于执行了少奇同志的指

示，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群众管理工厂。

少奇同志那种实事求是、深入群众的作风，耐心教育和帮助干部搞好工作的精神，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二

当时，在党提出的“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号召下，动员参加红军的热潮是极其高涨的。少奇同志对于动员工人参军的工作非常重视，他领导全总执行局积极负起这一责任，指导各级工会组织动员工人群众响应号召，报名参军，保卫苏维埃政权。在动员过程中，虽然工人群众的参军热情很高，少奇同志还是认真要求各级工会做好扩军的宣传教育与组织工作，务使每个工人都真正懂得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意义。各地工会很快就组织了宣传队，广泛地向工人群众宣传“当红军光荣”，同时，还深入到工人家属里去进行宣传。这样一来，工人对参加红军的重要意义有了很深的认识，而个别的对亲人参军有思想顾虑的工人家属，也受到了教育，打消了不必要的顾虑。加之，工会帮助参军工人的家庭解决了一些具体困难，工人家属都积极鼓励自己的亲人去参军杀敌，使得参军热潮轰轰烈烈，自愿要求参加红军的工人非常踊跃，出现了不少父母送儿子和妻子送丈夫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在欢送参军工人的时候，锣鼓喧天，爆竹声响成一片，每个参军工人的胸前都带上一朵大红花，有的还披红挂绿，骑驴骑马，热闹非常。

要组成一支完全是工人出身的劲旅，的确是不容易的事，少奇同志经常指导工会干部进行调查，弄清每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坚定，身体是否强壮。经过一番细致的组织工作，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那天，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布工人师成立，命名为中央警卫师。这个师的成立，在历史上是新的一页。当时，这个师的全体指战员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写道：

“我们工人师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是在全总执行局的号召之下，自愿来当红军的，我们坚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全接受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并绝对服从其命令与指挥。

“我们都能了解我们是工农劳苦群众革命的武装力量，是苏维埃的军事柱石。我们已下定了坚牢的决心，从今天起以无产阶级坚决性顽强性和我们的热血与头颅，同全国红军兄弟一致的为工农阶级与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彻底解放与利益同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决死的残酷的斗争，彻底推翻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创造苏维埃的新中国……。”

工人师的成立，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忠心与热爱，显示了工人阶级崇高的品质，雄伟的气概和革命必胜的信心。这和少奇同志在苏区以马列主义教育工人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个师的旗帜是永存不朽的。

三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向苏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残酷的“围剿”，并且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我们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响应“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大家都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拿粮食来说，当时，在苏区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虽然，党领导苏区人民积极生产，多打粮食，但由于地少人多，粮食还是不够吃的，供应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前线红军吃饱，必须提倡节约。我记得，当时苏维埃政府规定的后方军事机关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供粮标准都较低。但在后方工作的同志政治热情极高，个个响应号召，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每人每天都从自己的定量中节约二、三两，以至四两。这样一来，如果仍象以往那样用吃大锅饭的办法，就行不通了。经过大家讨论，提出了办法：用当地一种长阔叶的野草织成草包，每人发给一个，每人每天按自己的粮食定量把大米放在包里面煮，包上写上名字，吃饭时各人取各人的饭包，这就叫做“包包饭”。

在实行吃“包包饭”的时候，中央负责同志都自动节约粮食，和大家一起吃“包包饭”。少奇同志带头积极响应节约粮食的号召，每天和全总的同志们一样吃“包包饭”，一天经常吃两餐，所以，他往往是饿着肚子在工作。但据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告诉我说，大家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说过

肚子饿，他那种忍饿工作的毅力，感动着周围的每一个人。有时同志们肚子饿了，但一想起少奇同志挨着饿顽强地工作时，就不觉得肚子饿了，而振作精神，顽强地埋头工作。

吃“包包饭”的消息传到了前线后，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全体指战员，大家纷纷表示决心，保证打胜仗。听说，有的红军战士打完一仗之后，炊事员同志送饭来时，就手端饭碗检查自己打死几个敌人，捉了几个俘虏，缴了几支枪。要是有了战果，就高高兴兴地吃饭，要是自己没有战果，或是战果不好，心里就难过，觉得对不起中央首长和人民群众，并默誓下一次战斗要多杀敌人，多缴获武器，不然就不吃饭。

少奇同志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节约粮食的动人事迹，不仅推动了全苏区节约粮食、支援前线的工作，而且变成了鼓舞红军战士克服困难、英勇善战的伟大力量。

刘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

马　文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之间，我曾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工作过一年半，直接受着他的教导，有些事情，迄今记忆犹新。

一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我在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担任工会委员长。这个厂的工会工作，主要是由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简称全总执行局）直接领导。因此，经常要向全总执行局汇报工作；有时是口头汇报，有时是书面汇报。

有一次，我接到通知，到瑞金全总执行局汇报工作，临回厂的时候，全总执行局组织部长梁广同志告诉我说："刘少奇同志要找你去谈谈。"刘少奇同志当时是全总执行局委员长。听说委员长要找我当面谈谈，心里又高兴又紧张。在这以前，我只听说过刘少奇同志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的老前辈，在大城市里领导工人运动的威望很高，国民党和帝国

主义分子都很怕他，工人群众敬爱他，拥护他，可是，我还从来没有和他见面谈过话。找我去，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我便不由得考虑起应当说什么话。

我走进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室，他见了我笑着说："你来了，坐吧。"开始时，我多少有点拘束，后来看他那样平易近人，热情和蔼，很快也就自然起来了。看样子，他早就知道我的名字。他先了解红军兵工厂的情况，同我工作中有什么问题。我一一向他作了汇报。然后他忽然微笑着对我说："有件事我要批评你。"我以为自己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可是，他接着说："你写的工作报告，有些字太潦草，以后应当誊写清楚再寄。"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心里想：委员长是多么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这个年轻干部呀，连我写的字潦草都及时帮助指正！真好，又有一位既严肃又和蔼的良师教育我，象我过去的教师在我答卷上及时改正我写的错字一样。他工作那样忙，每天不知要做多少工作，居然能在我的报告里发现一些潦草字，这说明他对工作是多么严肃认真，看信件是多么仔细。而自己呢，竟不替领导同志想想，把那样潦草的报告送给他看，想到这里，我感到象犯了大错误，难受极了。刘少奇同志大概看出了我的激动，接着鼓励说："不要紧，以后注意改正就行了。"

这事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一九五七年九月，我去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看望他的时候，他曾笑着又提起我写字的事，对我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啦。"我听了，立刻想起那件事，显然，委员长的记忆力非常强，还记得它呢。

二

和刘少奇同志那次见面以后不久，我被调到全总执行局工作，接触刘少奇同志的时间多了。当时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两个同志，一个是从福建省总工会调来的，一个是从江西省总工会调来的。由于新来，又是新工作，我们三个人都很年青，对工作也都没有经验。刘少奇同志知道这种情况，就经常亲自参加我们的会议，和我们一起商量工作怎么开展。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向我们三个人详细说明了全总执行局成立“国家企业部”的目的及其任务。对我们的工作，从原则到具体都考虑到了。他告诉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办公。要我们用纸写个牌子贴在门外，表示“国家企业部”已经正式成立。他还根据我们三个人过去的工作情况与当前的工作需要，指定我为部长，其他两个同志为干事。他是全总执行局的主要领导人，但我们和他在一起，一点也不感觉他有什么架子，所以很快就熟悉起来了。

过了些日子，委员长找我去谈成立苏区粮秣工会的事，他要我去找贸易局吴局长商量，征求他对成立这个工会的意见。我找到吴局长，向他说明准备成立粮秣工会的事。没想到，吴局长不赞成成立。我回去就把吴局长的看法向刘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心想，这位吴局长真保守。可是，出乎我的意外，刘少奇同志听了我的汇报，没有不高兴的表示。他沉默了片刻，大概是考虑吴局长的意见，然后心平气和地给我详细分析了成立粮秣工会的好处与不成立的坏

处，要我再去和吴局长商量。他说：“只要把道理向吴局长讲清楚，他是会赞成的。”后来，我根据他的指示，又去和吴局长谈了一次，果然，吴局长同意了。

三

红军兵工厂当时的工人有广东人、福建人和江西人，大多数参加革命不久，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封建地方观念，闹过不团结，有个时期甚至严重影响了生产。刘少奇同志知道了这种情况后，非常重视，派我到厂里去研究处理。我去了一个多星期就自以为把问题解决了，回来向他汇报了处理的经过。我原来以为，这次处理还是很顺利的。刘少奇同志和往常一样，精神非常集中地听我汇报。等我汇报完了，他没有马上发表意见，稍为想了一想，问我说：“你到厂里住在什么人家里？在哪些人家里吃饭？”开头我很奇怪，不明白他为什么问这些事，就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因为我和广东人比较熟悉，食住都是在广东工人家里。”他听了后，不太满意地说：“那么你得到的意见都是广东工人说的啦？”我回答他说：“是的。”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有了片面性。

“你这次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你的结论偏重于广东工人方面。你休息三天，要回去重新处理。”接着，他耐心地向我谈了做工作的方式方法，应注意的事项，要我下次再去时，千万不要光听广东工人的意见，要多听听福建工人和江西工人的意见。

对刘少奇同志这个指示，最初我感到很不好办，自己已

经在兵工厂全体大会上作过结论，现在自己又要去推翻，多难为情呀！可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刘少奇同志对问题的判断是很准确的，我没有什么理由，更不应当不考虑党的影响，不按照他的意见去做，所以思想斗争到最后还是去了。

第二次到了红军兵工厂一了解，情况果然如刘少奇同志所分析的，对上次的结论，广东人都很高兴，而福建和江西工人可很不满意。

我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重新收集了江西工人和福建工人的意见，并做了新的结论，才正确地解决了纠纷，使两省籍工人都很满意。

十多天后，我回到全总执行局再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处理的经过时，他微笑着说："这次你有很大进步，上次的事应该作为经验教训啊！"

事后我自己回想起这件事，越发感到刘少奇同志的英明，他对待问题和培养教育干部，是非常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

四

那时候，中央苏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几次"围剿"，红军的一般物质供应非常困难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刘少奇委员长的倡议下，全总执行局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号召大家踊跃募集草鞋，慰劳英勇作战的前线红军战士。同志们都热烈地响应了号召。我因为在兵工厂时有薪金，所以这时身上还有点存款，当场就捐献五双。五双，最初这是最高

的纪录，大家热烈的给我鼓了一阵掌。可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江西省总工会来的青工部长捐七双，笑着说要和我比赛。他大概和我一样，是由产业工人提上来不久的干部，身上也有点积蓄。大家见他捐献的数字超过了我，当然也给他鼓了一阵掌。

就这么着，他加，我加，一直往上增，最后我共捐了一百一十七双，比他多五双。买这么多草鞋，也需要不少钱呢，我仔细计算了一下自己的储蓄，还好，勉强够啦，这才放了心。在我们比赛的同时，其他同志也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了双数。这也是一场革命的比赛。

第二天一早，机关墙报《红旗》为此出了特刊，用红墨水大字标题表扬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当中还特别提到了我和那位青工部长。刘少奇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很关心，曾亲自去看《红旗》，并且，在工作和生活会议上多次赞扬革命比赛的精神！对干部的缺点他从不放过，总是耐心帮助分析提高认识，而对干部的优点或工作成绩，哪怕是很微小的，他却又是那样牢记不忘。

五

一九三三年春，党中央号召动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区工人加入工会，作为迎接当年"五一"劳动节的积极行动。我也担任了国家企业方面一些厂的动员工作。四月下旬的一天，我同梁广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去汇报，说明在总执行局和国家企业方面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不料，汇报以后，我

被指责“对党不忠实”，原因是，据中央组织部某些人了解，卫生材料厂工人加入工会的并不足百分之九十，而这个厂是我去动员的，因此证明我是虚报成绩。我当即向那些同志解释说，这个厂没有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加入工会，是因为该厂刚扩大起来，一部分工人到厂还不足三个月，虽然他们积极要求加入工会，但按照工会章程规定，暂时还不能加入。这个情况我是清楚的，只是没有分别加以说明。可是那些同志根本不顾这些事实，甚至吹毛求疵，一定要处分我。我满怀委屈的情绪回到全总执行局。当天晚上，党支部就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关于处分我的问题。刘少奇同志知道了，也来参加。一开始，他没有发表意见，先坐在旁边听了听大家的看法，了解了事情的真实情况，过了一会，才发言。他分析了问题的性质，最后说：“象这样的事，主要是因为马文同志事先疏忽了，没有分别说明情况，我看没有什么理由给予处分，以后多注意一些就是了。”本来，支部里大多数同志就不赞成处分我，只是因为中央组织部指示要处分，一时弄不清究竟该怎样处理合适，听刘少奇同志一分析，认识马上明确了，所以一致同意他的意见。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我之高兴，倒不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受处分，而是因为有刘少奇同志这样坚持原则，爱护干部的好领导。要知道，在当时那种“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环境里，全总执行局的党支部能抵制乱扣帽子、打击干部的作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六

有一个短短的时期，我思想有波动，不安心在全总执行局工作，觉得自己工作经验少，理论水平又低，担任部长很难胜任。我就去找刘少奇同志说明我的意见，请他批准我回兵工厂工作，结果被他批评了一顿。他分析了我的思想，对我进行批评教育。不过他的批评总是带着鼓励的。他教育我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处理事情要以党的利益为前提，不能感情用事。为了我这个思想问题，他接连找我谈了几次，终于把我说得口服心服。而当我完全安下心来以后，他却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用巡视工作的名义，派我去兵工厂工作三个月。显然，他这是有意照顾我盼望回兵工厂的心愿。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更不愿意离开全总执行局了。

七

一九三四年五月，全总执行局召开苏区国家企业工人代表大会，我被选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在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发现有三个代表犯过一些错误，于是决定取消他们的代表资格。当我在大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时，刘少奇同志从大会主席团坐位上走到我身旁，对着我的耳朵用询问口气轻声说：“还是可以当代表吧？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就宣布了？”我告诉他，那是经过资格审查委员会讨论通

过的。他听了再没有说什么，就回到原来坐的位子上去。等我报告完了，他又找我们商量这个问题，说应当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更好。他说："既然选出来了，他们犯的错误又不是很重，我看可以采取教育的办法帮他们提高认识，如果他们能很好的认识错误，有决心改正，最好还是保留他们的代表资格。"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同志们听了他的意见，又重新研究了原先的决定，结果认为否决那三个同志的代表资格确实不合适，就同意了刘少奇同志的意见。

后来，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讲话时，还附带解释了这个问题。他就是这样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就是这样关怀，鞭策和鼓励他们前进。

八

刘少奇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是很艰苦朴素的。他穿的衣服和我们大家穿的都一样。刘少奇同志为了带头节约粮食，支援前方红军，是饿过肚子的。他的日常用品是从伙食中每天扣出来的五分钱买的。每天开饭时，他和我们一样，先从锅里找到自己的饭饱子（每个饭饱子上有各人自己的名字）。饭桌子是长形的，坐的板凳也是长的，如同旧式学堂用的书桌和凳子一样。上下饭厅有一百多人在一起吃饭。饭前饭后大家在饭厅里见面时，总是喜气洋洋，完全象一个新型的和睦大家庭。刘少奇同志每次吃完饭，总是自己洗碗筷，洗完带回自己的宿舍。他住的地方也和我们一样，办公用具很少，所不同的只是他的文件书籍比别人多。

他很注意清洁卫生，经常打扫屋子，带动大家。他除非到远的地方去，是不骑马的，总是步行。马伕班有十匹马，干部们因公需用马的时候，要先经过总务科，刘少奇同志自己也不肯例外。

刘少奇同志对于革命工作的那种饱满精神和顽强的毅力，是别人很难比拟的。白天忙一整天，还继续工作或学习到深夜。这在刘少奇同志，是经常的事。我们的宿舍和他住的房子连在一起，往往从窗子里看到半夜以后，他还在继续工作。他的这种艰苦作风，感动着我们每个同志。

九

一九三四年七月，由于敌人的五次"围剿"，猖狂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中央决定大大精简上层机构，充实基层。我根据组织的决定，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全总执行局和敬爱的刘少奇同志，回到红军兵工厂工作。从那以后，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六月，在延安才又见到他。

一九三八年六月我到达延安时，住在八路军总部副官处。这时我才知道，曾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担任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在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之后，已经回到延安党中央，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当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恨不得马上见到他。自从在瑞金离开他以后，几年来我曾几次梦见他在教导着我的工作，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连他在哪里工作都不知道。我怀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心情，要立即去看望刘少奇同志。副官处的肖学林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

帮我打通了电话。那天晚上，刘少奇同志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叫通讯员给我送来了，信上说："在电话里谈得很少，现在我很清楚的想起了你。我们在江西悲惨地分离，现在在革命浪潮中又会合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请你明天上午来我这里谈一谈。"

我接过信，反复看了四五遍，激动的泪水湿润了双眼。那一夜好象特别长，怎么也睡不着，好容易才熬到天亮。第二天上午，肖学林同志帮我找来一个通讯员带路，通过古老的城门，沿着延河河畔走去；碧绿的河水潺潺地流着，就象乐器在大地演奏，它陪伴着我飞驰。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中央机关所在地。传达领我到刘少奇同志面前，他一见我，热烈地握住了我的手，并让我坐在他身旁的石凳上。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什么时候到延安的？"他问。我告诉他是前天。接着，他就关怀的问起我从离开他以后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了自己几年来的工作、思想和生活情况，他也向我讲了一些他自己的情况，谈话非常随便，和在瑞金时没有两样，一直谈到中午。我知道他工作非常忙，但他没有对我说一句工作忙的话。他留我吃午饭，饭后又继续谈。他向我谈了长征前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党造成的重大损失，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以及毛主席领导的正确，抗日的光明前途。当谈到我自己未来的工作时，他关心地问我自己打算做什么。我告诉他还想到工厂去。他听了很高兴，说："搞工业很重要，应当摸索一些办工业的经验，将来搞工业化有用处的。"他

见我身体很瘦，问我是不是有病，我告诉他没有什么病，主要是过去的环境不好，有些虚弱。他要我一定到医院去检查一次。……

到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虽然很不愿意离开他，但我还是站了起来。这时他又要同我一道去散散步，看一场中央机关的篮球比赛。

事后我自己想想才明白，刘少奇同志所以要同我去看篮球比赛，也是有意地提醒我注意锻炼身体。

* * *

上述这些回忆，仅仅是刘少奇同志感人事迹中的几件平凡小事。但是，我深深感到这些片断的事实，能够说明我们党与国家的领导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在革命的队伍里，为我们树立了优良的作风和良好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敌后

张爱萍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广泛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华中受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投降主义的抵制，因此，不仅整个华中的抗日工作不是从积极地深入敌后打算，就是新四军的几支抗日游击部队除一部深入苏南、苏北、皖东北敌后外，其余还徘徊于我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边缘区，背靠国民党大后方，依赖国民党，而不积极地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同志带着党中央的指示，来到了华中。经过他的领导和具体组织，纠正了王明路线的错误，把党中央的方针路线贯彻到新四军部队和长江南北的广大敌后地区。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前后，以少奇同志为首的华中局的领导，对在华中地区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更有重要意义。他根据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降到从属地位的科学分析，解决了抗日中反顽斗争、具体正确地运用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和建立敌后根据地等等关键性的问题，因此我党在华中的根据地得以创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扩大，不仅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对解放战争即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当然是少奇同志对党的贡献。

我们这些坚持华中革命斗争的人，就有这种亲身的体验。现仅就少奇同志一九四〇年初夏到淮北抗日敌后根据地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短短时期内所体验到的几个片断，回忆出来献给青年同志们。

淮河北岸迎亲人

初夏的华北平原，麦地间杂着高粱地，一望无际。微风吹拂着黄绿色的麦浪，散发出阵阵的麦花香。注入洪泽湖而流入长江的淮河，平静地缓缓东流，河面上偶然可以见到日寇、伪军早晚巡逻的小汽船。淮河两岸一片葱绿。

正是这样一个景色迷人的下午，淮河北岸突然热闹起来。从新四军第四总队驻地——泗县的洛岗，一直到淮河岸边，沿途几十里的路上，人群熙熙攘攘，欢欣若狂。这里有坚持敌后抗日的人民，有虽已属初夏仍然穿着棉衣的敌后抗日军战士，衣服虽然很破旧了，但是清洁、整齐；威风凛凛，也有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党政军各级干部，人们掩饰

不住兴奋的心情，怀着无限的希望和喜悦，等候着，盼望着，不时地顺着大路朝东南方向张望，有些人到处打探：

“你见过胡服同志（即少奇同志的化名）吗？”

“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同志么！”

“胡服同志几点钟可以到？”

“快了，马上就要到了。”

人们这种喜悦、激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块淮河以北，津浦铁路以东，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久前才从对敌伪顽的斗争中创建起来。我们这些人，打仗搞武装工作还可以勉强应付一下，但对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就感到很大困难，所以象盼望见到亲人似的，迫切向往着中央领导同志能够来亲自领导与具体指示。就在这样的时候，党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到了新四军第五支队地区的盱眙城。从盱眙到我们淮北，只隔一条淮河。这真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大家喜出望外，马上专门派人前去请少奇同志来淮北一趟，给我们作些指示。少奇同志已决定今天前来。这个不平常的消息鼓舞着每一个同志。我的心情也很激动，五年前的事情又浮现在脑海里。记得还是长征过湖南的时候，一天行军以后，他来到我们师里，他那种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对工作的详细、深透的询问与指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自从那时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了。经过这漫长、艰苦的五年，我自然渴望能看见他。

久久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一条渡船慢慢靠了岸。顿时，淮河边上人声欢腾。少奇同志在阵阵掌声和口号声

中走下了渡船；跟在他后边的是中原局的工作同志，无线电台报务员和警卫人员。我紧握着他的手，几年不见，呵！他的两鬓已有些斑白了，慈祥而严肃的脸庞也更削瘦了；但身上穿的一身洗得发了白的灰军装，象从前一样的整洁、朴素。他精神焕发，轻挽着马缰，微笑着，谦逊地向欢迎的人群招手。洛岗村这时更加沸腾起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军政干部拴下汗溜溜的战马，纷纷向少奇同志住处走去。

少奇同志从延安来到华中以后，走遍了长江以北我军各个游击区，直接领导了淮南新四军第四支队、五支队反对顽固分子磨擦的斗争和敌伪军的“扫荡”，并取得了巨大胜利。日以继夜的工作，长时间的操劳影响了他的健康，如今又带着这种久日的疲惫来到淮北。尽管我们大家都迫不及待的要向他汇报情况，听候他的意见，但考虑到他很疲劳，就都劝他先休息一下再说。可是他一会儿也不肯休息，一定要我们立即汇报情况，和我们研究工作。

汇报开始了，从上灯时分直到深夜，蜡烛换了一根又一根。少奇同志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香烟，全神贯注地听着汇报，我们几次请他去休息，他都不答应。眼看天快亮了，他还不肯去休息，说他在淮北只能待三天就要回淮南去的，一刻时间也不肯放松。后来我们只好说大家也要去休息了，少奇同志这才向众人笑笑，招招手，去睡觉了。但是没睡上几个小时，他就起身了，于是汇报又继续了一天。少奇同志对各种问题，都提出了许多意见和明确的指示，但他总是说：这是我的看法，请你们大家研究看。会后，大家都兴

致勃勃地谈论着少奇同志的指示。

时刻关怀着部队

在敌后那种分割、动荡的战争年月里，能见到中央的领导同志是不容易的，所以谁都想见见少奇同志，聆听他的指示。我们决定第二天召开全体军政干部大会，请少奇同志作报告。谁知泗县、五河的敌伪军偏偏在这一天的拂晓，突然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情况很紧急，全军立即投入反“扫荡”的战斗。报告会只好停止。出来“扫荡”的敌伪军受到游击队阻击，泗县城的两路敌人，黄昏前其主力一部仅占领了距洛岗三十里路的上塘集，另一路则只占领了上塘集以北的马公店；五河城的鬼子也在同时进占了郑集。根据情况判断，敌人第二天一定会向我合击。这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少奇同志及中原局机关的安全。我们决定趁敌人一时摸不清情况，连夜转移，打算从上塘集和郑集这两股敌人之间穿过，绕到敌人后边，也就是泗县东北面，然后再绕到濉河边上，跳出敌人的合击圈。这一行程约六、七十里。当将上述敌情及我们的行动计划向少奇同志报告后，他说：“你们对情况比我清楚。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好，就这样办好了。”

夜行军开始了，少奇同志骑着我们缴获来的一匹四只白蹄的枣梨色走马，和中原局的工作同志们随总队司令部行进。这是一个阴沉的夜晚，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谁也不敢拉下距离，同志们屏住呼吸，一个紧跟一个前进。走了不久，

下起雨来了，雨虽然不十分大，却很讨厌；淮北平原的泥土路，浇上一点小雨，就泥泞难行。不时有人摔跤，还有的人被粘泥拔掉了鞋子。这大大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更不用说肃静了。人们都挺恼火，心里狠狠咒骂着敌人。黑暗中，我用衣服蒙罩着手电筒的亮光看看表，小针已指向下一点。但这时我们已穿到敌人的侧后，脱离了敌人的合围圈。部队有些疲劳了，就在原地休息下来。我们正在路旁村庄的一个小茅棚里，听各路侦察员的敌情报告和研究情况，突然，少奇同志走进来。他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淋湿，雨水从军帽檐滴下来。他听了我的报告后，沉思了一会儿说：“是的，下雨，路很难走，我看你们部队很疲劳了。”略停一会儿，他望着我说：“既然已经基本上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你看是不是可以住下来呢？在战斗中，也应尽可能地保持部队的体力，照顾同志们的健康。”最后又补充一句：“当然，情况是你们比我清楚。”我心里想：若住下来，即使发生了万一，我们是战斗部队，不过打一天仗，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少奇同志及中原局机关在这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怎么办呢？这损失无法补偿。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事。于是我坚定地回答：“在此宿营是可以的，不过再前进十多里更保险一些。”

这样，我们又继续按原定计划往前走了一个多钟点，部队到达距濉河约二十里的地方才住下来。

“有理、有利，就坚决打垮他”

翌日，敌人果然合击洛垛一带，但扑了一个空。我们为避开敌人“打回马枪”，决定当夜向北渡过蔷河，转移到青阳镇东北二十余里的新行圩子、朱湖等我根据地的边缘地区。

夜行军又开始了。少奇同志仍然随我们一道行军。那天晚上无风无雨，行军速度较快，大家边走边说，情绪十分高昂。当我们到达青阳镇时，地方同志告诉我，朱湖和新行圩子一带今天下午到了敌人。究竟是哪儿窜出来的敌人，是什么敌人，一时弄不清楚。只好继续侦察前进。我们到达作圩子接到我侦察队的报告，说国民党顽固分子王光夏（国民党江苏省保安队第一纵队司令）趁日寇从西面对我“扫荡”之际，率全部四个团倾巢出动，从东面配合日寇向我进攻，于今天黄昏前占领我朱湖、新行圩子等以北地区。大家非常气愤。日寇进占苏北后，顽固分子王光夏在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指使下，表面上打着抗战的幌子，实际上一直和日寇暗中勾结，到处组织汉奸伪政权，不止一次背信弃义地和我们闹磨擦。只因为我们坚决打鬼子，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我们，才没敢明目张胆地举行军事进攻。这次他认为时机来到，有利可图，就完全丢掉他的抗日假面具，公开配合泗县、五河鬼子的“扫荡”，向我们进攻，并占领了我洪泽湖北、成子湖西一带根据地。这一来使我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南面是洪泽湖，北面是日寇的据点，西面是向我“扫荡”的日寇，而前面又是王光夏顽固分子的堵击，

经我们纵队几个领导同志商议，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决打垮顽固分子王光夏的进攻。为了站稳阵地，更有利于我组织防御和展开进攻，当时除令第一团趁王光夏部队立足未稳之际，首先抢占新行圩子外，立即去向少奇同志请示。

当我走进少奇同志的住室时，少奇同志背着手在屋里踱步，正和刘彬同志谈论着什么事。我把当前的敌情向他作了汇报后说：“目前我们已处在三面夹击之下，敌伪顽把我们夹在南北五、六十里，东西三十多里的狭长地带，形势很困难！”

少奇同志坐在那里，静静地一面听着，一面看着地图，脸色仍象我刚进门时那样开朗、平静，仿佛一切都成竹在胸了。我看他这泰然自若的神色，我心里也平静了许多。等我讲完后，他微微点了点头说：“是很困难啊，你看该怎么办好呢？”

我说：“看来，不反击是不行了。王光夏经常和我们闹磨擦，这次竟公开对我们进行武装进攻，是到狠狠给他回击的时候了！”

少奇同志很赞成，说：“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我们在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而顽固分子却趁机向我们进攻，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卫了，因此，打他我们是有理由的。这一点一定要给干部，特别是战士讲清楚。”他接着问：“你们纵队同顽固分子王光夏的力量对比怎么样？”

“我军有三个主力团，一个独立团，另外还有几支小游击队。其中两个团战斗力较强，打败过日本鬼子，还打垮过顽固分子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派来找磨擦的马骥亭两个团的进攻。由于要以一部牵制日寇，要歼灭王光夏部四个团是有困难的，但打垮他，赶出我根据地是可能的。”

“那就是说：我们又有利了，是不是？”少奇同志很明快的对我说。

“是这样！”我肯定的回答。

接着少奇同志又问了部队的政治情绪和有关作战等问题。然后他安详地说：“现在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变好的。……我们既然有理又有利，就坚决地打垮顽固分子的进攻！一定要用这些道理在部队里进行深入的动员。”说着，他把我送到门口，我带着明确的指示，愉快地向他告别。几天来的接触，使我深深地感到少奇同志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谦和、严肃的态度，对问题总是深思熟虑，而当他要作什么决定的时候，总是先征询下级的意见，由你自己去作出决定，而把他的决定变成执行者自己的决定。他这种凡事和群众商量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把全部粮食马上送到前方去！”

经过一天的战斗，我们从顽固分子手里夺回了朱湖和新行圩子及其附近大小二十余个村庄。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各机关和中原局机关也移驻新行圩子。这是一个分成

南北圩寨的数百户的大村庄，主要的人家都在北围子，南圩子仅是一家大地主的宅院，有围墙、有水壕，房屋建筑华丽坚固，室内的沙发椅、钢丝床、屏风等设备，更是洪泽湖地区的农村和城市中少有的。少奇同志及中原局机关就住在南圩子。

记得是我们同顽固分子王光夏战斗的第五天夜晚，顽军两个团被我们打垮，并被驱逐到根据地的边缘上——界头、曹庙一线，和我们对峙起来。“扫荡”我们的泗县城的鬼子，经我主力一部和游击队在车门山的阻击后，已退回泗县城。根据地基本上已恢复了，形势暂时缓和下来。我从前方指挥所来向少奇同志报告情况并陈述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因为战斗紧张，同时部队粮食也很困难，一天只吃两顿杂粮稀饭。在谈话中，感觉饿了，肚子咕咕的直叫唤。我忍不住悄声问刘彬同志：“能不能给搞点东西吃吃。”

这话被少奇同志听到了，他关心地问：“怎么，这样晚，还没有吃饭？”

于是，少奇同志就问起部队的供给情况，我在谈话中就将根据地初创，筹集粮食十分困难，和这三四天中部队几乎断粮等实际情况作了汇报。少奇同志听后，很不安的说：“怎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倒天天吃的是白面、大米呢！”

原来为了照顾少奇同志的胃病和身体健康，同时，考虑到中原局机关的人数也不多，所以，我们专门弄了些米面给他和中原局的工作人员们吃。看到他这种不安和自责的情

形，我后悔不该向他讲这些情况。我正想解释，少奇同志对刘彬同志说："快查查我们还有多少粮食，马上全部送到前方去！前方部队没有饭吃，怎么能够打胜仗呢！我们在后方没有什么关系嘛！"

我连忙向他说明："部队虽然米面吃得少些，但象玉米面、绿豆、大麦、穇子还是有得吃的。"他不等我说完，就说："我们在后方的人，才该吃杂粮。"我又继续解释，说明现在大的战斗已基本上结束，可以抽出一些部队去筹粮，少奇同志有胃病，不应该同我们一样来个"平均主义"。但他这次不象平常同我们研究工作那样，对我的解释，一句也不肯听，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我们在后方的人可以饿肚子，前方部队是不好饿肚子的！"

当时，我们大家对于少奇同志这种一切为了前方胜利的精神深为感动，这使我联想起几天前雨夜行军中照顾部队体力的事，更加强了我们不仅从大的方面，也要从小的方面关怀部队的观念。当我们政治部把少奇同志送粮食到前方部队的事传达到部队中后，全体指战员听了，都非常感动，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更多的歼灭敌人，来回答中原局和少奇同志的关怀。

"保存了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为了狠狠地教训这些"反共磨擦专家"，彻底粉碎顽固分子王光夏的进攻，完全恢复我根据地，少奇同志又决定在我们已取得战斗胜利的基础上，组织了当时在淮北津浦铁

路以东地区活动的八路军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的一部，与我们共同行动，并在少奇同志的统一指挥下，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在运河以西洪泽湖以北地区，歼灭了王光夏两个多团，把这股勾结日寇的顽固分子赶回运河以东。至此，完全恢复了我们原有的根据地。

战斗结束后，我回到司令部，到少奇同志那里汇报战斗情况。战斗情况他早已知道了，他对伤亡情况和政治情绪很关切，尤其对干部的伤亡情况更关切。我说，打这种顽固分子是不会有大伤亡的，当他知道我们部队营以上干部没有伤亡，连排干部仅有少数的伤亡，战士伤亡也不大的时候，他方放心地谈了向敌人斗力、斗智的问题，大意是说："伤亡不大，这很好。我们是打游击战，不仅要学会歼灭敌人，也要学会保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不然，自己都没有了，拿什么去消灭敌人呢？游击战更要把同敌人斗力和斗智结合起来，只同敌人斗力是不够的。"

在闲谈中，我讲了这次战斗中自己碰到的一件趣事。那是战斗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们把掩护顽军王光夏败退的一营多敌人，包围在城子湖北的一个村庄——山子头内，这是一个围墙高、壕沟宽，利于守而不利于进攻的围子。我们便决定黄昏攻击。为准备进攻，我和几个团长进行现场侦察，决定进攻部署。我爬到山子头围墙边一个矮草堆，利用一个堆麦草秆的草房棚子隐蔽自己进行观察。当我观察后转身向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忽然背上象挨了一拳似的，把我从矮草堆上撞下来。我还以为是谁开玩笑，后来才发现

是挨了敌人从圩内打出来的一枪，因为我站立在草堆上，半截身子正露在草棚上面，子弹穿过草棚上的横梁打到我的背心，子弹把我的羊皮短袄（是淮北区党委金明同志他们送来的）穿了一个洞，但我的背上只受了一点轻伤，子弹头落在衬衣里。

这本来是闲谈的，少奇同志却非要看看我的伤口不行。他亲自查看了伤口，一定要叫医生来给我上药……我说这算不了什么。说真的，我当时一面感到党的温暖，也一面感到难为情，这怎能算得是负伤呢！少奇同志还指着那件短羊皮袄说："皮袄倒给你保了险！"

当时，由于战斗如此频繁紧张，流动性大，部队供应很困难，夏季来了，同志们都还穿着过冬的棉衣，我则穿着那件护身的羊皮袄。

刘彬同志插上说："多稀罕，六月里穿大皮袄，真有福气啊！"逗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后来少奇同志严肃而含蓄地对我说："人家要你当指挥员嘛，哪里是叫你去当侦察兵！在一次战斗里，指挥员的伤亡对战斗胜败的影响是不同于一个战士的。羊皮袄是不能经常保险的！"

深夜的灯光

很久以来，我们时常被一个问题苦恼着：就是感到敌后的环境紧张，战斗频繁，工作杂乱，抽不出时间学习。人们经常说："什么时候得点空学习学习就好了。"但是有一天，

我发现这样的想法是错了。

事情是这样的：反顽战斗后不久，少奇同志就亲自到苏皖纵队视察工作去了。一天晚上，我们部队到达离苏皖纵队比较近的地方宿营。

深夜，我独自一人骑着马到了少奇同志住的村子。村子里静静的，四下无人，村外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我直闯进了村子，村内一片漆黑。我一面转弯抹角向前走，一面看看表，已是深夜下一点多钟了，心里想：少奇同志已经早休息了，此刻去，会不会耽误他的休息呢？正在进退两难、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看见村中间的一个大院落里，有隐约的灯光，我本能地朝着灯光走去。在大门口询问值班的警卫员，知道少奇同志正住这里，我从被窝里把刘彬同志拖起来，他正睡得香香的，我问道："少奇同志休息了吧？"

"休息？"刘彬同志一面揉着眼睛，一面看看表说："离天亮还早呢！"他一面领着我转过一间屋子，灯光从前面一间房内的窗棂上透出来。这灯光在漆黑的深夜里，显得分外明亮。我想，这么晚了，还没睡啦！轻轻推开了房门。少奇同志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一支烟，正对着那闪闪跳动的烛光，聚精会神地看书呢，文件和电报堆在桌旁。我顺眼看去，书页上划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

"这晚了，还没有休息呀！"我首先打招呼。他把书放在桌上，抬头望望我说："还早呢！"

少奇同志神采奕奕地同我谈了约莫两个钟头，当我告

辞出来的时候，差不多快天亮了。我回头望望摇曳的灯光和少奇同志映在窗户上的身影，心中十分感动。我们经常强调客观原因，抓不紧学习，现在这论调不驳自倒了；难道少奇同志工作不比我们更忙更紧张吗，环境不是也一样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刻苦地坚持学习呢……相比之下，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刘彬同志告诉我，少奇同志经常利用工作完后在深夜里读书，要不然就长久地站在地图跟前，或是在屋里踱步深思。深夜不眠已是他的"正常生活"了。

对干部宣传毛泽东思想

少奇同志非常重视培养干部，关心干部的理论学习。他在淮北根据地虽然只待了近两个月，但在这紧张繁忙的日子里，只要有机会，他就主动给干部作报告，经常找党政军各行各业的干部们个别谈话，对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提出具体建议。在谈话时，他总是想尽办法，启发诱导，从理论上提高干部的认识，打通干部的思想，或从具体情况，谈到原则理论，然后才着手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如在这次解决根据地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问题时，他就是非常耐心细致地反复向我们阐明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以及这一方针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深远意义。他经常对干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对我党、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他通过我党大革命时期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十年内战时

期同"左"倾教条宗派主义的斗争，红军长征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同张国焘的斗争以及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等等历史事实，反复地阐明，反复地对比，来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全部发展历史证明，要使革命得到成功，没有正确的领袖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就是全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领袖，我们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他的话不仅提高我的政治认识，使我弄清了党的历史事件中，哪是正确的路线，哪是不正确的路线，谁是正确的，谁是不正确的。我也是从这时起，才懂得"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的马列主义"。

少奇同志还谆谆告诫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时常教导我们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他说："听党的话和听群众的话是一致的，凡事和群众商量，一定能作好工作。"

少奇同志还常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认识论，学习唯物论辩证法，学习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他解释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的意义，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深入调查研究中认识客观，认识矛盾，抓住本质。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少奇同志正谈到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时，桌上送来一盘蚕豆，他一边吃饭，一边夹起一粒蚕豆，用它从下种到发芽，生长到结果实的全部生长过程来解释否定之否定这一法则。他对一些理论问题，总是谈得又通俗又深刻。他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教导我们。

少奇同志对党的干部和党员的政治思想修养，非常重视。他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同我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内斗争问题。当时部队在敌后分散的环境里，我们那时都还年轻、幼稚，政治水平很低，个人的修养更差，不懂得怎样进行党内斗争和对待自己的同志，不大识大体顾全局，因此不仅在政策上，也在党内团结与斗争以及个人修养等方面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就在所难免了。他反复解释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斗争——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通过他的开导和启发，给我们淮北地区党政军民干部以极大的教育，特别是给我教育帮助更大。少奇同志离开淮北不久，当我们从《抗敌报》上读到他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庆祝党诞生十九周年的大会上作的题为"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的时候，我们许多干部都觉得它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对着淮北地区和我们自己的情况讲的。这个报告，对于处于敌后的党的建设（也是对全党）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它成为以后整风中的重要文件之一。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深夜于甘孜完稿

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

吕振羽　江　明

前　言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调少奇同志回延安，华中局决定一百多名干部随行，其中除柳岗等人外，原来还有吴信泉、王兴纲、贺绿汀、沈其震、崔义田等同志。出发前，华中局指示我们：这是一次极端严重而艰险的长途行军，每个同志都要把跟随少奇同志安全地回到延安，作为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同志们，明知少奇同志回延安，对全国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大家的心情，却不免有些依依不舍。有的同志甚至要求自己随行，有的同志则在少奇同志临行之前，找机会去和他谈谈话。被指定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的我们，自然，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不但因为能够追随在我们敬爱的少奇同志左右，能够朝夕和他在一起，还由于能够回到革命圣地延安，见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少奇同志临行前，在苏北阜宁单家港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对华中地区过去的工作做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对当前的工作做了全面、系统、细致而具体的安排。为着满足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各直属部门、单位及地方负责同志的要求，少奇同志分别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并对工作提出了建议。由于皖东北区党委、淮南区党委、淮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独立旅有些负责同志没有参加华中局扩大会议，少奇同志又于行军途中，在淮北区党委所在地的周集，安排了同他们的一次会议和谈话。少奇同志离开华中地区后，也还是不断通过电报和信件指导华中的工作。

当时，从华中局所在地的苏北阜宁通往延安的路途，有许多走法；我们随少奇同志回延安的这条路线，是经过我党我军负责方面周密布置的，一共穿越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军的一百零三道严密、险恶的封锁线；经历了爬山涉水、成年的艰苦的夜行军，何止万水千山！在炎热的暑天，爬过了高入云霄的太行山；在酷寒的隆冬，走过了晋西北的冰山雪地。一路之上，多次遇到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固军的伏击，……在任何艰险、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少奇同志总是非常镇定和乐观，对情况的分析明若观火，充满了信心，058都以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为前提，处处关心群众和爱护干部，不容许损害群众的点滴利益，并且不知疲倦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结合当前的具体情况和斗争教育干部。……在那样艰险的行军过程中，少奇同志随时随地深入地全面地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组织解

决工作中的问题，贯彻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少奇同志回延安所经过的山东分局、湖西区党委、鲁西区党委、北方局、太岳区党委，以至晋绥分局，工作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起了转折性的作用。

这一切，都给了我们以极其深刻的教育和不可磨灭的印象。

党　　籍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少奇同志及随行人员从苏北阜宁单家港起程回延安。从此，我们开始了夜行晓宿的长途行军生活。

头一天就是夜行军。正是仲春之夜，满天繁星闪烁，田野里洋溢着花草的清香，阵阵春风拂面，使人感到心旷神怡。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在祖国这样美丽的土地上，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却分布着敌人一座座阴森森的碉堡，一道道严密的封锁沟和封锁墙。在铁路、重要公路两侧险要的地方，敌人的封锁沟有几丈宽、几丈深，里面放满了水；封锁墙高过一人。而在封锁沟和封锁墙的每一个道口上，都有敌、伪军日夜驻守和巡视着的碉堡，敌人就利用它来切断我们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企图分割、消灭我们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但是，由于我党、我军到处都和群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紧紧地依靠群众，坚持斗争，敌人所设下的这些障碍，丝毫也阻挡不了我们的活动，更吓不倒我们。

在艰险的行军途中，少奇同志和我们经常随身携带着

铲子，有时要把又宽又深的封锁沟铲开一个口子，人马才能通过；有时少奇同志和我们要从齐腰深的水沟里涉水前进。当我们从汉奸和大地主的庄子附近经过时，那些汉奸和大地主由于作贼心虚，不时从碉堡里盲目地放射土炮和枪弹。炮弹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爆炸，子弹呼啸着掠过我们头顶。每逢这样紧张和惊险的场合，少奇同志总是显得那么沉着、镇静，他安详地对大家说："不要怕，夜晚的枪弹是打不着人的。"我们每一个随从少奇同志的人员都觉得在少奇同志身边，无论碰到的环境多么艰苦，多么危险，都是能够克服的；少奇同志随时随地，特别是在险恶的场合，都给予我们以百倍的信心和勇气。

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淮海区党委所在地——周村。

这一天，邓子恢、金明、刘震等同志正在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有一位同志来找少奇同志，要求谈谈关于他的党籍问题。少奇同志立即叫柳岗去接见他，并且叮嘱说："党籍有问题的人，心情常是抑郁的，你要很诚恳地接待他，让他心里有什么话都敢于向你讲出来。"

柳岗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接见了那位同志。通过谈话，知道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参加过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和一些同志在苏北涟水一带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但他一直没有离开过革命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四军进入苏北，他立即参加了工作，并积极要求解决他的组织关系问题。柳岗又仔细看了他随身带来的申请书和党委关于

处理他的问题的材料，发现他在被捕入狱后，有些关键性的问题，已经没有人能够证明。

那位同志走了后，柳岗把这些情况向少奇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少奇同志听完汇报，沉思了一会儿，才郑重地对柳岗说：

"明天你去找他，再好好地详细谈一次，把他的话仔细记下来。他今天和你见过面，明天可能会和你谈得更多更深些。要想办法解除他的顾虑，让他把心里话彻底地大胆地讲出来。这对党有好处，对解决他的问题也有帮助。党籍问题关系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我们一定要很严肃地去对待，要给予极大的关切。一个人，要来革命，谁也没有权利拒绝他。你只有义务，以同志的态度，好好地去听取他的申诉，根据一定的原则，帮助他解决问题。"

柳岗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指示，第二天清早起来，匆匆地吃过饭，立即跑到几里路外的一个小学校去找那位同志。他就在那里工作。果然，他显得比头一天刚见面的时候心情开朗多了，神色也不象原先那样抑郁。谈话的内容，基本上和头一天所谈的一样；但是慢慢地，他终于又讲出了一些新的情况：原来，一些当初和他在一起进行斗争的人中，有几个叛变了。这个问题，他过去一直不敢讲，怕讲出来，把问题弄得更复杂，更不容易得到解决。这时，他一边讲，一边再三申明：对于找不到适当的人证明的几个问题，愿意自己提供保证；如果党将来发现他自己所讲的与实际情况不符，愿意接受党的任何处分。他的态度是诚恳的。

柳岗回到宿营地，把这些情况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送给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同邓子恢、金明、刘瑞等同志研究工作的会议结束时，不觉已是深夜了。少奇同志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了几步，然后回到桌旁，借着微弱的豆油灯光，看起这份报告来。他仔细地看完了这份报告和有关的申诉材料后，对柳岗说：

“这个问题一定要帮助他得出一个结果来。可是目前，我个人不能代表组织来处理这个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淮海区党委也不能解决，必须经过华中局才能处理。同时，有些问题还需要经过反复缜密的调查，才能下结论。”

说完，少奇同志就在报告上批了几句话，大意是：建议华中局根据该同志提出的申诉和有关材料，认真进行调查，依据原则处理。然后，少奇同志把材料交给柳岗，并交代说：“你告诉他亲自到华中局去一趟。”

后来，在山东分局，我们接到了这位同志充满着激情和喜悦的来信，他说，经过华中局反复调查，他的历史终于搞清楚，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感激少奇同志对他的关切，表示今后一定更好地为党工作。

密切联系群众

我们跟随少奇同志离开淮海区党委，向山东根据地出发了。临行前，少奇同志对我们说：“华中根据地开辟较晚，山东抗日根据地是老区，八路军也是老部队，我们到那里以后，首先要尊重他们，虚心地向老区多学点东西。”

经过两昼夜的紧急行军，大队人马来到了离陇海路三里左右的一个村庄里。大队部传令就地休息，再一次地检查通过封锁线的战斗部署。马上就要通过敌人严密的封锁线了。在陇海线上，敌人驻扎着重兵，修筑了一连串的碉堡；巡逻的铁甲车不时在铁路上出现。情况是险恶的，大家的心情既紧张，又严肃。

开始行动了。按照事先的安排，负责护送少奇同志的领导同志，把他所率领的两团兵力，分别摆在大队的两翼。到了距离铁路半里多路的地方，部队隐蔽下来，监视两侧的敌人碉堡。这时，负责护送的领导同志指挥另一部分勇士，出敌不意地径直插到前面的铁路卡子，把伪铁路人员全部绑了起来。一切都在沉静地敏捷地进行着。

前面布置妥当，一声令下：“过封锁线！”

刹时，我们这支秩序井然的队伍，象一支穿云飞奔的火箭，神速地、静悄悄地强行通过了陇海路封锁线。

夜色漆黑，几步之外不见人影，后面的同志紧跟着前面的同志，两眼盯着联络信号——左腕上系带的洁白的毛巾；四野十分寂静，只听到轻微的脚步声，和行列中偶尔发出低沉的传达命令的声音。

经过彻夜急行军，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到达了山东军区滨海区边沿的一座小镇子。

在这座边沿地区的乡镇里，经常驻有八路军的部队，我们到达的时候，就驻着一一五师独立五旅的一个连。这一带群众基础比较好，我们的力量是很强的。我们一行人决

定在这里吃午饭，休息一会，准备下午继续向山东分局进发。

同志们经过了一夜艰苦的行军，本来就已经十分疲倦了，现在来到安全地点，就象回到了家里一样，心里放下千斤担，又轻松，又踏实，有的人倒下头来就睡着了；有的同志连背包还没有顾得解下来，背靠在墙上就发出了鼾声。

大队为少奇同志准备了一间比较安静的小屋，想让他能好好地休息一下，但少奇同志在屋里喝了一杯水，就走出去了。我们立刻跟着少奇同志走上街头。每到一个地方，少奇同志总要先观察当地的地形，并且尽可能地了解情况。

这个镇子很小，只有南北一条街道。少奇同志一面浏览着街道两旁的小卖铺和民房，一面仔细地察看着张贴在墙上的宣传画和标语：

"积极进行减租减息工作！"

"加强减租减息工作！"

少奇同志站在标语前面，微微倾侧着身子，沉思了一会儿，默默地说："积极地进行减租减息工作；"他回过头来，望了望我们，"这里的减租减息运动不知道搞得怎样了？这些口号是地方党组织提出来的呢，还是农救会提出来的？……"

这时，少奇同志的视线，又落在后面墙上的一张彩色招贴画上。这是一张天主教的宣传画，画端印着一排黑色的大字："升天堂之路"，一行穿着西装革履和长袍大褂的人，牵着服饰华丽的女人和孩子，在一条大路上正向着这几个大字奔去；与此相反，就在这幅画面的下端，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一群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贫苦人民，正在痛苦地向着画面的下角走去，在他们前面，也是五个黑黑的大字："入地狱之门"。

少奇同志在这张画前端详了很久，然后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你们看，天主教这样反动的画，也贴到这里来了。从这张画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宣传上是挖空心思的，它的阶级性、目的性都非常明显。"

这时，我们这些随行的同志都仔细地倾听着，但有的同志对少奇同志的意思还弄不清楚，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于是，少奇同志指着那张画解释说：

"你们看，要信他的教嘛，就可以上天堂。那些长袍马褂、西装革履、服饰华丽的老爷太太们，都是些什么人呢？还不是地主、资产阶级；而他们走的路是通向'天堂'的阳关大道。不信教的，也就是那些反抗他们帝国主义秩序的人，就要入'地狱之门'，走到阴森森的'地狱'里面去。"停顿了一下，少奇同志又带着启发的口气，望着我们继续说："这幅画采用的形式，使人一目了然，象这样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向敌人学习。它是宣传宗教，为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服务；我们呢，把它颠倒过来，让它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不是挺好吗？"

我们听完少奇同志的话，感到少奇同志看问题总是那

么深刻透彻。于是，我们小心地揭下这张画，把它保存起来。

这时，附近的一些老乡看到少奇同志和随行人员在街上逗留，便逐渐围拢过来。警卫员同志为了少奇同志的安全，尽量环绕在少奇同志周围。可是，少奇同志却有意地向老乡们靠近几步，接着，就和老乡们亲切地攀谈起来：

“日本鬼子和皇协军常到你们这儿来吧？你们生活过得怎样？……”

“敌人倒是常来咱们这儿，好在有八路同志给咱们保家乡，咱们不怕。”老乡回答时，还得意地做了个八字手势。

“首长，咱们还有不脱产的民兵哪！……”老乡们看到有几个挎着匣子枪的人站在少奇同志左右，猜想出这一定是位八路军的负责同志；而少奇同志任何时候都是那样诚朴，那样使人很容易和他接近。现在，谈话的内容又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使老乡们感到特别亲切，所以越谈越有兴趣，人也围得越来越多了。

少奇同志从老乡们的生活，一直谈到村里有些什么人，开展了哪些工作。从谈话中，少奇同志了解到他们大都是农民，于是进一步问道：

“你们村里有农救会吗？”

“有，有农救会。”

“村里的老乡们是不是都参加了？”少奇同志接着问。

“都参加啦！只有老财不准参加，给鬼子当兵的人家也不能参加。”

“农救会开会不开会？”

“农救会倒是常开会，就是不怎么热火！”

“除了农救会以外，村里还有什么组织？”

“还有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

少奇同志听了，微微点点头，目光又落在那两条关于减租减息的标语上。他用手指着墙上的标语，态度亲切地问道：

“这是你们贴的标语吗？你们不是说要减租减息么？现在减得怎样了？”

这时，站在远处观望的老乡也都拥挤上来了，人们越聚越多。显然，少奇同志的话触动了他们内心的深处。是呵，减租减息正是当时农民群众最关切的事情。

老乡们纷纷回答少奇同志说：

“我们村里已经减了！”

“我们也减了。”

有的则说：“我们也要减的。”

少奇同志听到老乡这些话，考虑到这里的减租减息运动可能还没有真正搞起来，而农民群众都有着强烈的要求，他于是问道：

“你们大家对减租减息怎么想法？老财他们愿意吗？”

许多老乡都回答说，他们完全拥护减租减息。也有的人说：“还没有同老财商量哩！”

“地主都跑到鬼子据点里去啦！你要减他的租，还能找到他？就是找到了，他也不肯回来！”说话的那位老乡，流露

出气愤和惋惜的神情。

“是呵，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好多老乡同情地说。

“我看，有八路同志给咱们做主，大伙儿能齐心，还怕他减不了！”另一位老乡下结论似地说。

少奇同志和蔼地微笑了，注意地看着那位说话的老乡。正在这时，一个警卫员同志从人丛中挤了过来：

“请首长吃饭去。”

少奇同志点了点头，依旧站在那里，继续和老乡们交谈，细心地倾听着他们的谈话，观察着他们的情绪。

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同志只好重复说：“首长还没有吃饭，吃完饭再来谈吧？”

老乡们也说：“首长，请回去吃饭吧。和你说话怪有意思的，可是让你饿着肚子，我们可过意不去。”

说着，站在少奇同志周围的老乡们，自动地让出一条路来。少奇同志这才同我们一起往回走。走在路上，少奇同志还不时地回过头来，望望老乡们；老乡们也都不停地向少奇同志挥着手。

少奇同志一边走，一边对我们说：

“这里是边沿区，农民群众对于减租减息也有着强烈的要求，可见我们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是完全符合群众的要求的。”

少奇同志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忘了连夜急行军的疲劳，使我们也受到感染，不知不觉地忘却了疲劳。

匆匆吃过午饭以后，我们随着少奇同志，立刻离开这座

村镇，出发了。

一路上，少奇同志还在思考着和老乡们的谈话。他对我们说：

“关于这个地方的减租减息情况和老乡们的反映，沿路都可以考察，从考察中可以使我们在思想上受到启发。毛主席随时随地都注意了解情况，掌握情况，研究情况，从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大家都应该好好学着这样做。”

少奇同志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最好的榜样。每到一处坐下来喝水时，他都要找老乡交谈，指着墙上贴的标语或者其他的东西，向老乡们提出一些问题。当我们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学着这样做起来的时候，少奇同志就说：

“很对，我们就应该找一切机会和老乡交谈交谈，看看党的政策贯彻得怎样，群众的反映如何。看看他们村里的减租减息究竟搞了没有，搞得怎么样；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基本群众的要求，中农的态度和其他阶层的反映怎么样。总之，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接近群众，从群众那里学到东西，随时随地都要了解、收集情况，提供给党作为制订政策、部署工作的参考……一个好的共产党员都应该这么学，这么做。”

少奇同志经常拿毛主席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来教育我们，而他自己就正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象毛主席那样来进行工作的。少奇同志的这一切活动，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教育意义很大。我们深深感到跟随着少奇同志，

随时聆听他的教导，真是多么幸运呵！

晚上，我们到达了宿营地。又经过了大半天的行军，大家都希望少奇同志早一点歇息。但是，少奇同志却不肯休息，刚刚安顿好住处，就又找老乡谈话去了，并且再三叮嘱我们也分别去和群众攀谈。

这个地方所反映的情况，和那个镇子上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那个村镇是边沿地带，这里是根据地里面。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还没有把农救会看成他们自己的组织，甚至有个别人连农救会究竟在干些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向少奇同志反映了这些情况。他注意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然后说道：

"要使群众把农救会看作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农会必须真正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真正为他们办了事，他们才会把农会看成是自己的组织，爱护这个组织。这样，农会才能有力量。"

我们都听得入了神。少奇同志接着又指示我们说：

"减租减息是我们目前的根本性政策，是我们党单独提出来的。你们到了分局以后，要更多找些干部和老乡谈谈。了解情况也不是容易的。要从各方面的人去了解，从各种各样的意见上去了解，从而分别真伪，发现问题。"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启程了。一路上和昨天一样，注意了解情况和收集群众反映。当天下午，我们终于到达山东

分局所在地——东海县的诸繁。当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也驻在这里。我们随少奇同志住在这里，大队人员分散住在距诸繁约五里地的西盘等几个村子里。

少奇同志住下以后，对分住在附近村庄的随行干部们说：

"你们住在那里，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向老乡们学习。要深入学习，必须深入群众，深入了解情况。我们在路上听到了一些关于减租减息的情况；你们在这里也可以了解一下，看看情况是不是一样，必要时好向分局汇报。要老乡们讲真心话，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对拿枪的人。但是，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让老百姓真正认识到这点，他们是会讲真心话的。"

随行人员听了少奇同志的指示，都高高兴兴地走了。

螺　丝　钉

由于连日连夜急行军，一路上生活又比较艰苦，随行的人员中，有几个勤杂同志和干部生了肠胃病，肚子泻得很厉害。少奇同志知道后，每天都派人去看望他们。过了几天，那几个同志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少奇同志又叮嘱我们说：这些同志一路上很辛苦，现在病了，应该很好地照顾他们，不要让病再继续发展。在饮食、卫生等方面，要好好安排，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并且要我们注意：不要因此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增添太多的麻烦。同时，他还要我们把山东分局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所准备的一些食品，分送给病

员们吃；把华中局特为他准备的一些药品，也去给病员服用。

听了少奇同志的话，我们思想上是有些顾虑的，觉得把一些食品分送给病员还可以；但是对于拿出药品，就有些犹豫了。那时候，根据地里不能制造药品，因为少奇同志肠胃不好，这回延安的长途行军是极其艰苦的，华中局特地从敌占区的上海，设法搞到这一点药品，准备少奇同志在路上服用。这些虽然是简单的成药，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很宝贵的。考虑到这里，我们当即向少奇同志提出：

"把吃的东西送给病员，药还是不要送吧。到延安路途很遥远，你的肠胃又不好，万一在半路上病了，找不到适合的药品，怎么办？从党的利益出发，我们觉得保护你的身体是特别重要的。"

少奇同志听了，温和而恳切地对我们说：

"这些药品虽然是在这里，可是，我们却要留给现在没有病，准备给将来可能病的人去用。药，本来是给病人吃的，不应该让需要药的人不能吃，而给没有病的人准备着。我们大家都是为着解放人民的，凡是参加革命的人，任何一个人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员，病了应该吃药，我们应该设法找药给他们吃。"

少奇同志的话，使我们又感动又惭愧。少奇同志无处不在深切地关心干部，他总是把自己放在群众和同志之中，把自己当作普通的一员，从来没有丝毫特殊。他对同志的关怀是热忱的、恳切的。

病员们得到少奇同志送去的药品和食物，很是感激。大家的心情舒畅，不久，病情都有了好转，渐渐地恢复了健康。

根据山东分局了解的情况，我们知道从山东到延安这条路上，敌人的封锁越来越严密了，到处是敌人的封锁线，到处是据点和碉堡，战斗十分频繁和紧张。有些地方，我们必须从敌占区经过，而过去还没有负责干部在这条路线上走过，路上的情况也不够清楚。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负责同志们认为少奇同志返回延安，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布置，然后才可以走。因此，我们只好在山东分局暂时停留下来，等候时机再走。

我们跟随少奇同志来到山东的，连同干部和勤杂人员，共有一百多个同志。当我们在山东分局住了一个时期后，就发现事务、机要等人员中，有一些同志不大安心自己岗位的工作，他们认为做这些工作很枯燥，又没有什么大的出息，不如到前线去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好。同时，在个别干部中间，也有一些不够团结的现象。

少奇同志很注意这个问题，他就对我说：

"你好好去了解一下，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这里面有些同志参加革命的时间不多，他们只知道抗日打鬼子，共产主义思想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我们要好好地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觉悟。对干部，共产主义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少奇同志叫我首先找几个负责同志了解情况，和他们谈心；然后，再找一般干部谈，包括饲养员和勤务员在内。

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不要偏听偏信。

过了两天，柳岗把各方面的情况向少奇同志做了汇报。少奇同志说要亲自和他们谈谈。第二天，他叫我们把那些单位的几个负责干部请到他那里去。

当那些同志来到少奇同志的住处时，少奇同志亲切地招呼他们坐下，给他们倒开水（那时候我们是没有茶叶的，能喝到开水已很不容易了），随后请他们谈谈自己单位的工作、生活和干部思想情况。

在少奇同志面前，谁不愿意把自己心里的话向他诉说，谁不愿意把自己心里的问题提请他解决呢？！因为他是那么尊重每个人，保护每个人合理的自尊心，即使你犯了错误，他也从不会用任何侮辱性的话来刺伤你，或者给你扣帽子，而是孜孜不倦地诱导你自己去达到正确的认识，启发你自己去发现错误及其根源，鼓舞你纠正错误的信心和力量，帮助你卸下包袱，轻装前进。

少奇同志仔细地听完了每个人的汇报，然后恳切地向在场的干部们说：你们的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你这部分工作能不能做好，从你这一部分来看，问题是小，但如果从革命事业的全部来看，问题就很重要。你这部分搞不好，旁的部分就要受到影响。你这部分工作能不能做好，首先就要看你这里党内是否团结得很好。共产党之所以战无不胜，就由于能把千百万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必须党内团结得很好，才能去团结群众。共产党如果不能把群众团结起来，任何工作都是毫无作为的。党内是否团结的好，又要看那

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们是否团结的好。

少奇同志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又给他们倒了一些开水，接着向他们郑重地指出：团结，这是我们党的根本性的问题。每个共产党员思想意识纯不纯，都要在这个问题上受到考验。他说：

“革命嘛，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为了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我们不是为了什么私人贪图来参加革命的。你要搞共产主义嘛，那么，个人主义的东西与共产主义就是不能相容的。”

少奇同志稍停了一停，启人深思地接着说：

“如果真正树立了共产主义思想，那还有什么个人问题在脑子里作怪呢？那么，同志之间还会闹什么关系呢？有些同志说：‘我为革命什么都可以牺牲，甚至生命也可以牺牲的，但就是这一点，在个人的感情上想不通，受不了委屈，忍不了这一口气。’这说得通吗？这样小小的一点个人利益、个人感情都不能牺牲，那还能牺牲什么呢？”

说到这里，少奇同志慈祥的看着他们，用询问的口气说：

“你们说是不是呢？我说了这些，你们的意见怎样？”

少奇同志的话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使人感到极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他的明智和语言具有极严密的逻辑性，对问题的解剖分析，象剥笋一样，一层层剥露出问题的核心，使人们感到这些话是极其真实和充满了力量，是经过了斗争烈火的考验，在党性原则基础上的至理名言，它给每

个共产党员以明镜和准绳，启发每个共产党员自觉地去检验自己。大家听了少奇同志的话，思想上都明朗起来。又看到少奇同志那种慈蔼恳切的神态，心里都十分感动。这时，每个人都看到少奇同志的目光正对着自己，这目光是如此严肃和慈蔼，充满了对同志的信任和期待。它又象一道温暖明亮的阳光，照透到自己的心里。他们都站起来向少奇同志表示，一定要牢牢记住少奇同志的教导，并把它贯彻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临走时，少奇同志又叮嘱他们说：

"如果是这样，你们回去以后，都可以找自己单位的同志们开开会，把勤务员、饲养员都找到一起，负责干部先做自我批评，解除大家顾虑，然后让大家开怀谈心，谈谈自己的思想问题和工作意见，看看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负责干部要求自己严格些，能进行自我批评，那不会降低什么威信的。必要时，为下面干部的过失担负些责任，也不会背包袱的。"

他们回去后，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开了会，同志们把自己的思想情况都谈了出来，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志间的关系比过去融洽了，但那种希望转业的思想仍未解决。少奇同志又要柳岗分别去找那些思想问题较严重和一些认识较正确的同志，进行个别恳谈，然后把他们找到少奇同志那里去。

开始，有的同志还不免有些拘束，但由于少奇同志那样和蔼亲切地接待大家，启发大家谈话，使大家感觉到就好象在一个很熟悉的普通同志面前一样，自然而然地，大家都变得活泼起来，毫无拘束地把自己的心里话谈出来。

少奇同志在他们谈过以后，对于他们正确的意见和思想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加以肯定和鼓励；同时针对他们中间不安心平凡工作的思想，深入浅出地进行启发教育。他的态度既认真，又亲切，大家都信赖地望着他。他说：

"这也难怪，你们参加革命不久，受的锻炼也不够。这种思想，要用党的观点来看，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才能正确地认识。"他举例说："党，是个有机体，社会也是有机体；无产阶级在生产劳动上，都是由机器把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固定下来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都只能集体去进行，才能解决问题。"

他停顿了一下，眼睛注视着大家，饶有风趣地说：

"你们见过机器吧？机器都是各个部件和零件装配起来的，它们分工合作，缺少哪个部件都会受到影响，哪怕是一只螺丝钉。我们都知道，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党的每项工作都是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每个工作岗位都是重要的。"

少奇同志转过头来，微笑地对坐在他身旁的同志说：

"你说电台工作重要不重要？"他又看着另外一位同志，"你说刻蜡板重要不重要？"

等待了一会儿，他这才继续说下去："我看都重要。每个干部在工作职务上纵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在发挥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从作为一个螺丝钉的作用来说，本质上都是

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而你对革命的贡献，首先也就是看你怎样发挥螺丝钉的作用。只要把工作做好了，就是人民的好勤务员。毛主席常常说：在我们这里，真是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

小屋里静静的。少奇同志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

"在这里，我想给同志们讲一件事情，说明一个好党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担任什么工作，都能对革命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时候，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决定，让毛主席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到兴国县农村去工作。当时，毛主席就去了，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兴国农村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它给我们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创了正确的方向。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工作，而在于一个人对革命事业是否无限忠诚。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是把你摆在任何岗位上，你就是一个螺丝钉，你就要很好地尽你的螺丝钉的作用，克尽职责，这才是你时时刻刻应该考虑的问题……"

说到这里，少奇同志微侧着头，问大家：

"你们说是不是呢？"

听着少奇同志亲切的、耐心的谈话，同志们的脸色渐渐开朗了，心情也显得很舒畅。有几个年轻的同志，眼睛里闪着泪花。他们听到少奇同志问自己，异口同声地说：

"是的！"

"首长这一说，我们真开脑筋了！"

这时，少奇同志也显得很高兴。他站起来踱了两步，环顾大家说：

"那很好，你们自己明白了，回去后再和旁人谈谈，提高了自己，同时又帮助别人提高，在我看来，这是很快乐的事情。"

当同志们回去时，夜已很深，皓月当空，银光把大地照耀得亮晶晶的。一路上，有的同志安静地走着，若有所思；有的同志兴奋地诉说着自己激动的心情：

"嗨，真解决问题！"

"句句话说到了我心里。"

"首长可真是诲人不倦呵！在他面前，我真是什么都愿意说。要不是怕影响他休息，我真不愿意走哩！"

"这次回去，可得好好发挥螺丝钉的作用了！……"

调 查 研 究

一天晚上，柳岗坐在桌旁，就着微弱的豆油灯光，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不觉有人来到身边，轻声问道："你在看什么？"

这正是少奇同志。

柳岗站起身来，一边把书放在桌上，一边回答说：

"我在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少奇同志微笑着说：

"很好。要好好学习，反反复复多读几次。这是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中国历史实际结合的典范。”

柳岗望着少奇同志说：

“它的分析和论断都是极其深刻的。读过几遍，总还想读。”

少奇同志点点头，接着说：

“对，中国人这样深刻和正确地认识自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古以来，中国人谁曾这样深刻地正确地认识过自己呢？它不仅是中国的历史，而且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中国革命的科学的总结。”说到这里，他看着柳岗笑了笑。“毛主席号召大家学历史，这很重要。你不是也喜欢历史吗？我们首先就应该着重学习这样的文件来提高自己。”停了会儿，他加重语气说道：“这个文件，我看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只要全党好好学习它，党的骨干都能掌握它，按着这样去做，就能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

在谈话中，少奇同志反复地指出：要好好地学习，好好地体会它，只要把它读透，能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就能懂得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就能懂得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要多读，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去读，要联系当前革命斗争的生活实际去读。读的时候，最好根据自己的体会写笔记。

“你记笔记了没有？”少奇同志问。

“随手记了点。”

“对，要记笔记，要写得真实。过一个时期，把这篇文件再读一次，读过以后，看看自己原来的笔记，这样可以提高自己的认识；有了新的认识，再来写笔记，又有了新的提高。这样学下去，一次会比一次深刻。”

当时，我们和山东地区的干部一起，都在学习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在学习中，有的同志提出：怎样才能正确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怎样才能使自己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不犯错误？有一次，我们把这个问题提给了少奇同志，请他帮助我们解决。他听了以后，点头说：“这问题提得很好。”

少奇同志接着做了这样的解释：我们现在讲的党的方针政策，是指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反映客观规律的东西，是真理。所谓真理是什么？就是用科学态度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客观规律的真实反映，所以它是科学的，是战无不胜的。这不是空话，而是由于我们对客观形势做了全面、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所得出的必然结果。少奇同志谈到这里，谦虚地问：“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这时，大家正忙于把少奇同志的指示记录下来，还没有来得及去考虑回答少奇同志提出的问题，我们只好以点头表示领会。

少奇同志脸上浮着微笑，轻轻地弹着香烟上的烟灰。

在这短短的时刻里，往往就是他敏捷地发现和思考问题的过程。他看着我们期待的神情，又耐心地谈到了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他说，党的路线，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根据全国的情况制定的，体现了全国一般的共同特点。因此，我们在体会、掌握这些方针政策的时候，一定还要和具体条件、环境、地点、时间适当结合起来。比如说：全国是一个整体，它有着一般的共同特点，但各个省、各个解放区却都有它不同的特点；而一个省内，各个专区、各个地委也都会有不同的特点；各县以至于同一个县的各个区、乡，都有不同的地方；你们看有两个村子完全一样的吗？这个村和那个村的减租减息运动，虽然有他们共同的特点，但也还有它的不同之处。所以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因此，因地制宜，这样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发挥应有的威力。如果是用这样的方法去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那么也就可能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少奇同志稍停了停，最后简明扼要地结束了这一次的谈话。他说：党的方针政策根据群众的要求制定出来以后，一方面当然要组织干部学习，另一方面还要提交给群众去讨论和实践，在群众那里经过考验，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然后才进一步去发展它。毛主席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也就是这个道理。总结经验也就是对我们的方针政策的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少奇同志来看过我们几次，有一次，少奇同志看到我们正在学习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

于是，他又关心地和我们谈起了有关调查研究的问题。少奇同志告诉我们，毛主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做不做调查研究，如何做调查研究，这是世界观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本分歧。我们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为了解决问题而去进行调查。通过这种调查，去抓活的情况，活的思想；抓群众现实生活里的问题和要求；抓各阶级、各阶层乃至于地主、资产阶级、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和问题，然后再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正因为我们进行了这样的调查研究，所以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认识得就更加准确，使我们更加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知道在具体的情况下，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如何使党的方针政策适合于具体的情况。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也使我们胸有成竹：应该依靠什么人，应该怎样去组织力量进行各种斗争。

少奇同志说：调查研究的方法很多，我们要学会用毛主席的方法去进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方法是要深入下去，从多方面了解情况，不要偏听偏信。一方面从个别人那里了解；一方面要开调查会、座谈会，多方面情况的汇集，就能挖掘出真实的东西来。我们应该把调查研究得来的材料加以鉴别，加以分析判断，看出哪些是真实的东西，决不能被不真实的东西所蒙蔽；如果被不真实的东西蒙蔽了，那就要在工作中犯错误。但如何使调查得到正确的材料，除了工作方法外，还有思想方法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立场问题，

看你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呢，还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如果是后一种方法，那得到的材料就是不真实的。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少奇同志来到诸繁以后，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罗荣桓、朱瑞和肖华等同志都接连来向他汇报情况和工作。听了同志们的汇报，少奇同志知道山东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在减租减息的问题上，分局的负责同志中有不少很好的意见，特别是罗荣桓同志，他提出了很精辟的见解。罗荣桓等同志的意见是：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搞减租减息，通过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把农民运动开展起来。但是，当时分局的个别负责同志也有这样的看法：首先把妇女和青年发动起来，农民运动和减租减息也就好搞了。少奇同志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的意见，不时还提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让每位同志把意见讲得更深入更具体。最后，少奇同志说：

“很好，这些都是极关紧要的问题。现在我对情况的研究还不够，我争取尽可能在这儿多住几天，和你们一起研究一下，这很有好处。”

山东分局和机关、部队、群众团体各系统的干部，听说少奇同志住在诸繁，都纷纷来找少奇同志和随行干部汇报情况，提出自己对群众运动的看法和意见。凡是要求会见的干部，少奇同志都要挤出时间，一一接见他们。

为了进一步研究山东地区的问题，少奇同志指示我们，

要山东分局把党政军民的有关材料都送来，把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也找一份全的来，分给我们进行研究，同时，还要我们和分局各部门的同志分别谈话。少奇同志告诉我们说：看这些材料，要注意抓问题，抓政策，抓执行情况；研究每个时期是怎样贯彻和体现中央方针的；对工作方式方法也要注意研究。少奇同志再三叮咛我们：

“政策，这是中央规定的；你们主要注意研究贯彻中央政策的具体方针以及执行政策的情况，特别要注意各阶层群众的反应。”

我们根据少奇同志的意见，从山东党的历史上着手，对全部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研究材料的过程中，有关建党、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的重要材料，少奇同志都要亲自过目。少奇同志从群众和干部的反映中，从材料的分析中，加上亲自调查研究，已经掌握了整个山东地区的基本情况，找出了工作中关键问题所在。可是，少奇同志仍然不轻易的下判断，而是采取了极其严肃慎重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少奇同志经常对我们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几十年来，我们党由于坚持了这样一个正确的路线，挽救了革命，发展了革命，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我们党最根本的东西。

一个时期以后，少奇同志经过反复地研究，对问题考虑成熟了，决定找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们来开会研究。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少奇同志刚吃完早饭，山东分

局的罗荣桓、朱瑞、肖华等同志来到了。大家就围着一张四四方方的饭桌坐下来。

会议开始了。少奇同志以他那一贯的民主方式和谦虚的作风，让每个同志把自已所掌握的情况和看法，尽量谈出来。少奇同志认真地倾听着，时而作些笔记，时而插几句话，使每位同志都能够畅所欲言。

当会议讨论到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时，有个别同志提出：进行减租减息是否要跟山东参议会商量和提请参议会讨论通过的问题。

少奇同志沉吟了一会儿，慢慢抬起头来，极其严肃地说道：

"减租减息的政策是我们党单独提出来的，在执行中到底要不要取得参议会的同意，你们可以研究一下。我看，问题是比较明白的。同时，到底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就是说，依靠群众自己去解决问题呢，还是把减租减息运动仅仅作为我们的一项一般的工作来看待？"

少奇同志谈到这里，稍停了一下，看了看大家，然后用商量的语气说下去：

"我们发动群众来抗日，群众运动的中心环节是什么？是主要通过搞青运、妇运来带动整个运动呢，还是把农民运动开展起来，也就是通过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把农民运动开展起来？"少奇同志的话，越说越有力了。"我看，就是要轰轰烈烈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道理很明显，把农民发动起来了，他们的老婆和孩子也就跟着起来

了。这是我的意见，对不对，同志们可以研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深入考虑。你们都是在山东工作的，都是掌握了情况的，可以深入分析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只有一个，党对于解决每个任务或问题的正确的政策只有一条。我相信，经过研究后，大家的意见会取得一致的。"

会议连续开了两天，经过少奇同志不断启发，大家对党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方针政策的精神，思想上都比较明确了，对一些有关问题的认识也比较清楚了，意见逐渐取得了一致。最后，少奇同志做了总结发言。他指示山东分局要坚持党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决把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少奇同志强调说：

"政策是中央规定的，丝毫不能打折扣，至于在你们这里如何具体贯彻，我的意见，你们还可以研究。我今天的发言，也可以研究；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请分局讨论一下，并向中央报告。"

山东分局讨论了以后，完全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并且布置了一个干部会，请少奇同志做报告。

这一天，少奇同志向山东分局县级以上干部做了关于全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报告。报告中对山东分局如何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做了全面的具体的指示。这个报告使山东地区的工作起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报告完了以后，少奇同志对山东分局的同志和我们说：

"我这个报告对这里的工作合适不合适，干部们听了以后有些什么反应，请你们去了解一下，告诉我。"

我们和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政治部的同志们了解到，所有参加干部会的同志们都反映少奇同志的报告很好，解决了山东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他们说：

“报告真解决问题，以后工作就有办法了。”

“这次会议将标志着山东地区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听了胡服同志（少奇同志当时在敌后用的代名）的报告，就象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一样。”

山东分局讨论了少奇同志的报告，并且根据报告的精神做了决定，贯彻执行。山东分局和少奇同志的报告的精神传达下去以后，干部和群众的热情都高涨了起来，对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有了信心和办法。

我们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听过汇报后，又找了分局的同志来，根据山东的情况和其他地方的情况，和他们研究如何具体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并和朱瑞同志作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少奇同志说：

“现在运动很快就要开展起来了。目前，减租减息就是你们这里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一起来抓这一工作。你们自己也可以亲自下去走走，了解情况，帮助工作。柳岗也跟你一道下去。”

少奇同志望了望柳岗，又接着说下去：

“在运动全面开展以前，要训练一大批干部队伍，去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可以调几百几千干部上来，训练一两个星期。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具体贯彻方

针政策的方式、方法都告诉他们，还要根据各县各村的一般情况和不同情况进行分析，总之，讲得越具体越好，甚至关于如何跟农民谈话，也可以写些东西给他们参考。”

少奇同志望了望朱瑞同志，又说：

“我们在华中地区就是这样做的，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

“都要讲些什么，您能具体谈谈吗？”朱瑞同志恳切地望着少奇同志问道。

少奇同志仰头想了一下，说：

“大概有这样几点内容……”

朱瑞同志赶紧取出自来水笔和笔记本。

“不过，还要结合你们山东的情况。”少奇同志开始说下去，“我们在华中时，都是把地区划成一片片的，每一片地区，每一个村子，集中力量搞重点。有时，先攻薄弱环节，有时，先攻下阻力比较大的重点村。究竟怎样搞法好，这就要看怎样搞对带动全面运动有利。在搞重点的时候，就要集中力量把重点村搞深搞透。在重点村周围的村子里，每个村子都派一个人住在那儿，找一间房子办公，公开挂上‘××村农救会减租减息运动询问处’的牌子。派去的干部，旁的事也不必管，专门了解各阶级各阶层对重点村的反应。特别要注意贫雇农和地主的反应。看看贫雇农有些什么积极的表现，还有些什么顾虑。汉奸、地主有什么反应，他们如何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中农和知识分子的反应如何，等等。这样，就可以掌握一些情况和扩大我们的影响。”

最后，少奇同志着重补充说：

“同时，还要特别注意贫雇农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作为将来培养的对象。”

山东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在少奇同志亲自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在运动开展的过程中，朱瑞同志经常来向少奇同志汇报。少奇同志总是仔细倾听着，帮助朱瑞同志研究情况，估计形势，特别注意了解各阶层的动态。在运动开展起来后，曾发生了个别过“左”的行动。少奇同志听了汇报后，对朱瑞同志说：

“运动总是曲线进行的。群众起来后，过‘左’一点，是合乎客观规律的。问题在于领导上要掌握稳方针政策。既要掌握稳方针政策，又不容许挫伤群众的斗志，不容许向群众泼冷水，——泼冷水是罪过，——这样，才能使运动健康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才能搞得又深又透。”

在运动过程中，少奇同志指示我们经常了解情况向他汇报，并及时给予分局的工作以指导。他还指示我们，通过山东分局把运动开展得好的、中等的和最差的典型县份的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村支书和农会主席各找两、三个以至五、六个，和他们恳切地交谈，问他们执行政策的情况怎么样，执行得好或执行得不好的关键在哪里，向他们询问各阶层、特别是基本群众的反应怎样。有时少奇同志还亲自同他们交谈，并郑重地对这些县区村的干部们说：

“一定要通过群众自己的手解决问题，同时要通过农会

去做；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农会壮大起来，巩固起来，让农民真正把农会当成自己的组织。”少奇同志告诉他们，这一点很重要，一定要十分注意。他们向少奇同志提出了不少问题，都及时得到了满意的解答，提高了信心。

在运动中，少奇同志还亲自到东盘、黑林子、夏庄等村庄深入了解运动开展的情况和政策执行情况。

朱瑞同志和柳岗从下面回来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分局汇报了，分局又作了讨论。我们把这些情况都汇报给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很高兴地对朱瑞同志说：

“我看，这次运动搞得很好，山东根据地可以扎下根了！”少奇同志沉吟了一下，又说：“但还有些不够的地方，有些村、区、县份还没有搞深搞透。你们要趁热打铁，在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把搞得好的，进一步深入巩固，把差的提高到好的水平，使落后的赶上来。这就需要继续不断地进行艰苦、深入、细致的工作，如果不做工作，还可能垮掉的。你看，是不是把那些好的经验推广介绍一下？另外，在运动中经过锻炼，有许多干部得到了提高，获得了经验。是不是可以把干部调动一下，把那些搞得好的地方的干部，调一些到领导力量较弱的地方去；同时，把那些搞得平平的甚至不好的地方的干部和群众，找一些到好的地方去，让他们从实际中开开眼界，学习学习，让他们看一个时期，懂得群众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再把他们调回去。这样，就可以使搞得平平的地方，赶上来搞深搞透；较差的地方也能跟上来。”

山东分局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做了以后，实践证明，少奇同志的指示是正确的。

不久，日本鬼子向我山东根据地进行“扫荡”。在反扫荡中，少奇同志和我们随着一一五师师部，由诸繁转移到了东盘。傍晚，忽然从南面传来了枪声。由于敌情很紧，当夜我们即急行军向诸城黑林子村转移。

一到黑林子村，引路的同志急匆匆地带我们来到一个贫农家里休息。当我们走进老乡家里时，他们正忙着腾房子。老乡全家五口人，住着两间小北屋；里间的炕上，躺着一个老汉，口里哼哼唧唧的，看样子正害着重病。原来，这位老人已经病了好几个月。这时，他的儿子和儿媳妇正要把老汉搬到他们自己住的炕上去，好把里间让给首长住。少奇同志发觉后，急忙摆摆手，制止说：

“赶快别搬，让老人家好好躺着。”他回过头来，望着我们说：

“怎么能占用病人的房子呢？病人是需要舒适和安静的。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睡，就是一夜两夜不睡觉，又有什么关系！”其实，少奇同志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地睡觉了。

这时，我们看见那对朴实的青年农民夫妇，激动地站在一旁，两眼望着少奇同志说：

“首长，你们为我们老百姓没明没夜地干工作，打鬼子，真够辛苦了。我们随便凑合几天，腾出间把房子，让你们好好歇一下，难道还不应该？”

少奇同志听了，态度和蔼地安慰他们说：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可是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不能占用病人的房间，影响了老人家养病。”

第二天清早，少奇同志就吩咐我们到师部医务所去，找医生来给老汉治病。

我们在黑林子村停留了近一个星期，老汉经过师部医生的治疗，病逐渐好了起来。这家老乡和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老乡吃糁子煎饼、大葱、黄酱等饭食，一定要送一些给少奇同志和我们。

当时，正在发动减租减息运动。我们转移到黑林子村后，即在群众中进行布置和动员；这一对青年夫妇一开始就主动地向我们工作队介绍村子里的情况，汇报各阶层的反应，在斗争中表现得很坚决。听说，他们后来一直是该村的积极分子。

壮大自己，削弱敌人

少奇同志住在诸繁期间，罗荣桓、肖华等同志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山东地区敌、友、我三角斗争的形势，以及敌、友、我力量对比等情况。由于我们在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给自己工作上带来了不少麻烦，大块的根据地被敌、顽军交叉地分割了，造成了我们在人力、物力、交通等等方面的很大困难。他们认为，这是个历史性的问题，山东分局也曾经讨论过，但问题比较复杂，分局不容易解决，他们说，少奇同志来了，事情就好办了。

接着，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也向少奇同志汇报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并带来了山东分局的党刊《斗争》，请少奇同志看看《抗战的山东，统战的山东》一文。朱瑞同志说，这篇文章总结了山东分局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方针，希望少奇同志给予指示。

少奇同志以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观察力，已觉察到了山东地区的统战工作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但他仍和贯常一样，对于象这样一类重大的原则问题，总要反复地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决不轻易下结论。少奇同志当时便恳切而又谦虚地说：

"对于你们的工作，对于山东地区的整个情况，我了解得还很不够，等我把情况再好好研究一下，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商量。"

少奇同志一向都是发现问题很敏锐，但解决问题却很慎重、细致，对于重大问题，不论在什么时候，都紧紧依靠组织力量、集体力量，和按照组织原则去解决，从来不由个人作决定。他总是启发干部对问题进行共同商量和仔细思考，反复酝酿，最后达到认识上的一致。这一次，毫不例外地也是这样。

少奇同志听完了朱瑞同志的汇报后，为了启发朱瑞同志去思考一些问题，就耐心地对山东地区的敌、友、我等基本情况和斗争作了启发性的原则指示，他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日寇是侵入我国领土的凶残的帝国主义。对敌的斗争，完全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目前来说，坚决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全国人民和全民族的利益。毫无疑议，我们应该而

且只有我们才能够把这副担子挑起来，狠狠地去打击敌人，千方百计地不断去削弱敌人和壮大自己。但敌人里面还有伪军、伪政权，他们中间的某些下层工作人员和下级士兵，并不都是甘心为帝国主义和汉奸集团服务的，因为这里面有个民族矛盾问题。当然，民族矛盾不能离开阶级矛盾，但也不能和阶级矛盾划等号。所以在敌人内部、在敌伪之间，都还存在着矛盾，有着许多可以利用的空子。

至于国民党顽固军，在目前阶段，本来是我们的友军，但由于他们的阶级特性所决定，他们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其所以抗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经讲得很明白，这是因为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又反映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对于顽固军的态度应该是这样：对于他抗日的这一面，要注意联合他；但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这一面，毛主席讲过：礼尚往来，有来必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必须坚决给予回击。当然，顽固军也不是一样的，有蒋介石的嫡系，也有杂牌军等等，在他们之中，有一部分是一面抗日，一面反人民；有一部分则并不怎样抗日，主要在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只是打着抗日的幌子，甚至配合敌人向我们进攻；最坏的一部分则是暗和敌人勾结，明目张胆地配合敌人"扫荡"，来袭击和蚕食我根据地。我们对于顽固军的总的原则是这样：凡是不利于抗日的，不利于人民的，都应给予坚决的斗争。

少奇同志讲到这里，稍停了停，就走向朱瑞同志，亲切

地问：

"你考虑了没有？你们是不是按照这个原则办了？我们党的政策是这样的，对于顽固军是又打又拉，拉他去抗日，打他的反共反人民。这个策略是毛主席根据几十年的斗争经验提出来的，在马克思和列宁的书里是找不到的，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意义，我看这就是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你们贯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策略思想没有呢？"

少奇同志这一番带启发性的谈话，使朱瑞同志开始意识到了某些问题，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仍然还不够明白。听到少奇同志这样的问话，一时不免有些茫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临走时，朱瑞同志要求少奇同志另找时间专门谈一次这个问题。

朱瑞同志走了。少奇同志坐在桌旁沉思着。过了好一会，他才又拿起《抗战的山东，统战的山东》一文，仔细地阅读，不时用铅笔在上面划些记号，有些地方还写上了批语。

少奇同志通过这篇文章，又联想到朱瑞同志的汇报和山东其他负责同志反映的情况，以及一路上所听到的群众的意见。山东分局在贯彻和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很好解决，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

为了把问题搞透，少奇同志指示随行人员从各方面去收集有关材料，并且对材料进行仔细地、深入地、全面地研究和分析。

在研究材料的过程中，少奇同志还不时来指导和启发我们，询问我们看了些什么材料，感到有什么问题。这种亲切的关怀，对我们实际上是最好的督促，更加强了我们的工作责任心，头脑也变得更清醒了。

少奇同志亲自研究了各项重要材料，详尽地分析了山东的形势。当时顽军占据的沂蒙山区南面地区，在抗战开始时，本来是我党领导的游击队首先进驻那里。可是我们的某些同志为了联合抗战，把它让给了敌、顽军，结果不但分割了我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之间的联络，而且阻隔了我们从鲁南到鲁中去的交通。由于敌人的这种分割和阻隔，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阻碍了自己的发展，并使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蚕食和压缩，这种形势对我们的抗战很不利，对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更为不利。如果不很快把这个问题解决，它将会便利敌人进一步分割我们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样，就不只会影响我们抗日力量的壮大，而且会使我们越来越困难。这是有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有关坚持和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性问题，必须迅速解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一问题未能得到及时解决呢？这与当时山东分局个别负责同志对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对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和掌握存在着一些问题是分不开的。

事情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早在抗战开始时，日寇沿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前进，国民党军队相继南撤，国民党政府的

官吏都弃职逃走，国民党的省、专署、县、区各级政权机关都无形瓦解了。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山东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拾起国民党军遗弃的武器和弹药，组织了敌后武装，坚持高举起敌后抗战的旗帜。但在当初，我们的某些同志还不知道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其中有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有一个原在沂蒙山区任职的国民党县长，跑到郯城去了，当时我山东武装部队的负责人却又派人去请他，那个县长不敢回来，他说："我现在是光杆子一个，怎么回去？回去了又怎么能当县长？"我们的同志为了要联合国民党抗战，就告诉他说："不要紧，现在到处都是枪，我们可以给你动员一些人组织警备队。"结果真帮助他组织了一个连的武装，他才回来了。他有了武装，腰杆子就硬了，跟着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加剧，他的反动行为也一步步地加剧。后来，顽军某部进占沂蒙山区南部，成为插在我鲁中和鲁南、滨海之间的一把刀子。这个国民党县长实际上起了引进和跳板的作用。事情发展的结果，把我们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了，变成了插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一把刀子，变成了横梗在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内部的顽军的堡垒，给自己造成了不少的困难和麻烦。

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势，使问题解决得更快、更顺利，少奇同志不时找罗荣桓、肖华、朱瑞等同志交换意见。最后，少奇同志决定召请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开会来共同商量和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晴朗的上午，少奇同志的临时住室里，被灿烂

的阳光照耀着，显得特别明亮。山东分局的各位负责同志，环坐在少奇同志的周围。

会议开始了，少奇同志说：

"今天请大家来谈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贯彻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和发动敌后抗日群众运动的问题；一个是如何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问题……"

在少奇同志的启发下，会议的空气热烈而又和谐，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们对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歧意见，毫无顾虑地摊开了。据我们的记忆，罗荣桓同志是代表了正确的意见。少奇同志认为这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并决定继续开下去，让分歧意见进一步敞开和交锋，直到大家认识一致和问题得到解决为止。

散会后，刚吃过晚饭，朱瑞同志又跑来了。他先找着柳岗说：

"少奇同志疲劳了吧？我有些问题想找他谈谈，请你去请示一下。"

柳岗去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

"我不疲劳，请他进来吧。"

但是，柳岗并没有立刻就走，只是看着少奇同志，因为少奇同志当时正在患胃病，夜晚常睡不着觉，饭也吃得很少，柳岗想建议他休息一下，改日再谈。

少奇同志似乎已经看出了柳岗的心情，就站起身来，轻声地对柳岗说：

"我们是过路的，留的时间不长，他们要谈什么问题，应

尽量让他们来谈，而且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朱瑞同志刚走进屋，少奇同志就亲切地说：

“你看今天的会开得怎样？这样开行不行？”

朱瑞同志感动地说：

“根据您的多次谈话和指示，以及会上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对我启发很大。减租减息政策，在我们这里，实质上没有很好贯彻下去。抗日群众运动，我们也没有抓好。这些问题我都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听了您的指示后，我对原来的做法也有所怀疑，但认识还很不够。今天有些同志在会上提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少奇同志一面注意地观察着朱瑞同志的情绪，一面说：

“你脑子里有问题没解决，能正面提出来很好。思想见面嘛，问题就好解决。”

少奇同志仍然象以前几次一样，慈祥而又严肃，他用各种道理，各种例子，引导朱瑞同志从党的政策原则上去认识问题。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方针，为的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是壮大我们自己，削弱和打败敌人。我们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目的就是为了战胜日寇，而问题的中心则在于如何不断壮大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我们总不能先把自己手中的革命的力量交给顽固派，去求得和人家联合。再说，毛主席讲过的嘛，对付顽固派，要又联合又斗争，我们不能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只有正确执行又联合

又斗争的政策，才能壮大自己，削弱敌人，取得胜利。

讲到这里，少奇同志亲切地弯下腰，望着朱瑞同志的脸问道：

“你看是不是这样？山东过去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偏差？”没有等朱瑞同志回答，少奇同志又谈到我党历史上有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的情况，由于能及时虚心接受和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很快就变成了好的领导者，把党的工作做得很好。

少奇同志对于干部，从来都是这样，只要他是同志，甚至不管他犯有多大错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启发、教育和帮助，一直到他醒悟过来。

朱瑞同志聚精会神地听着少奇同志的话，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这些话很重要，我得回去好好消化。我原来没有这么想过。”

柳岗怕少奇同志太疲劳，就劝朱瑞同志到院子里去走走，休息一下脑子。结果少奇同志也和我们一起出来了。

院子里已是一片夜色，皎洁的月亮高挂在空中，月光透过树梢照射到人们的脸上。少奇同志从朱瑞同志半明的脸部，看到了他仍在思考问题，于是就带着宽慰和鼓励的语气说：

“你们这里的气候真是好。山东的群众也是可爱的很，你们要是把现有的问题解决了，我相信你们的工作一定会搞得很好的。”

朱瑞同志怀着感激的心情，告别了少奇同志。临走时，

朱瑞同志再一次提出要求，希望少奇同志改日再和他谈一次有关山东工作等问题。

少奇同志同意了，并说：

“这些问题都是属于政策原则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完全对，下次你来，咱们再好好谈谈。”

在第三天的会议上，少奇同志对山东地区在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了系统的总结发言，并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同时又明确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和原则。少奇同志指出：要用各种方式方法告诉顽固军，他们要是抗日，我们就愿意和他联合；他们搞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就一定不能容许。如果他们一定要配合敌人向我们进攻，蚕食我根据地，梗塞我各个根据地间的交通联络，我们将给予坚决的回击。另外，还要告诉他们，双方人员通过彼此地区，要保证安全，不得阻难。如他们能接受我们这些条件，我们双方可以派代表，很好地协商一下如何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和如何配合作战等等的问题。我们党的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

罗荣桓同志在会上插话说：

“历史证明，这也正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武器，只要我们正确地掌握了这三条，就不怕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最后，少奇同志作了总结，他说：

“归根结底，山东地区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壮大

自己，改变敌、友、我力量对比的问题。要改变这种力量的对比，只有一条：壮大自己，削弱敌人。”

讲到这里，他引用毛主席的话来反复说明，让每个人都能较透彻地去了解它的精神实质。然后他又说：

“现在，我们虽然有困难，但从总的长远的方面说来，敌后条件很好，首先是群众在我们手里，真理也在我们这方面，正义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八路军和人民的武装。只要我们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壮大自己，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当然，这还需要经过相当艰苦、曲折、复杂的斗争才行，不经过这些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假使我们在路线上犯了错误，那就必然会削弱自己。”

少奇同志深深吸了口烟，接着又说：

“日本帝国主义是一种腐朽的势力，它是极端反动的。它在我国的社会基础非常狭小，非常薄弱。帝国主义的前途，必然趋向死亡，这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帝国主义都是不甘心自己死去的。因此必须要壮大人民自己的力量，用人民的力量把帝国主义送进坟墓里去。中国的顽固派同样也是如此。你们都读过毛泽东同志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吧！这几篇文章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敌人，应该如何去取得胜利。你们也可以根据这些原则，解决你们的问题。依我看，在你们这里，解决敌、友、我力量对比的问题，客观条件

是有利于我们，就看你们能否掌握这些客观规律。违反客观规律，是要遭受历史的惩罚的。”

会后，不仅原来代表正确意见的同志感到心情舒畅，对工作更有信心；就是原来抱有一些错误认识的同志，也改变了认识，感到轻松。罗荣桓同志说：

“只有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去做，山东根据地才能巩固和扩大，敌、友、我力量的对比，才能引向更有利于我们的方面发展。”

少奇同志走后，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尤其在罗荣桓同志主要负责以后，山东的整个形势便逐步而迅速地转变了。在我们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与顽固军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坚决地进行了又团结又斗争的艰苦工作，顽固军由于不能坚持下去而自动撤离沂蒙地区。一块一块被敌顽分割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我们力量不断壮大的形势下相继联结了起来，并终于联成了一片。这种转变，是和少奇同志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及其一系列的指示分不开的。

正确贯彻统战政策

当时，山东地区敌、友、我三角斗争的形势非常复杂，在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遇到了很多比较复杂的重大问题，关于“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的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记得有一天，少奇同志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山东的有关材料，有几个县、区、乡的干部跑来见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和他们进行了交谈。他们反映：我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有一部分较进步的国民党员（主要是一些中学教员，不是蒋介石一系的），来到我根据地参加抗战。他们来了以后，不久就建立了一个组织——“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但这个组织的性质，是政党、政治团体还是群众团体？建立这样一种组织的目的，它和领导抗战、开辟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共产党的关系，和八路军及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应该怎样等等问题，没有弄得很清楚、明确，存在于彼此间的一些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因此，他们和我党、政、军的关系也就不是很正常的。他们在我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一套与我党、我军、抗日民主政权的平行组织，他们的工作，并对我党、政、军保密；而各级协会组织的经费，以及由我们帮助他们建立起来的两个旅的军需供给，都由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

因此，当时的“抗协”（“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的简称），客观上没能发挥对抗战的积极作用，有些地方甚至阻碍了抗战工作的开展。我们的党员干部对这种情况，普遍感到不满。少奇同志到山东后，不少同志都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并希望得到适当解决。

少奇同志一向很重视来自下面的意见和汇报，他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对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工作都有好处。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负责同志，也分别向少奇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并送来了全部有关材料。

少奇同志在听取了山东分局负责同志对解决“抗协”问题的意见后说：其他党派的人，到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抗战，我们是欢迎的；但必须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地加以处理，不容左右摇摆；根本问题在于有利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壮大抗战力量，而不是来分散抗战力量。

讲到这里，少奇同志又慎重地指出：任何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到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抗日，必须服从我们党的领导和遵守党的各项政策，这才有利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大家正听得入神，少奇同志又转过话头说：

“对‘抗协’的问题我还不了解情况，看来似乎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我们也帮助研究一下。话又说回来，如果‘抗协’真如有些同志所说的那样，自搞一套，不真正接受我们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就不能长期继续下去；否则，是对民族抗战事业不利的。”

过了几天，柳岗从山东分局回来，正准备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少奇同志却派人先来找他了。

少奇同志告诉柳岗，为了帮助山东分局解决有关“抗协”的问题，还应该去了解一下“抗协”的态度。特别是他们一些主要负责人，对“抗协”的前途都有些什么打算和想法？其中有些什么共同打算，有些什么不同打算？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最好还约他们来这里谈一谈。

柳岗听完少奇同志的指示，就顺便请示说：

“正好，我刚才接到‘抗协’来信，他们希望我去和他们谈谈‘当前阶段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以及有关孔孟思想的一些问题。”

少奇同志说：

“这很好，你明天就可以去，可以在那里住上三、五天，和他们交朋友，和他们个别地恳切地谈谈。”讲到这里，他好象看透了柳岗的心思，又说：“‘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紧紧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去和他们讲讲，对他们认识‘抗协’的性质、任务，也会有启发的。”

第二天早晨，柳岗临行前，少奇同志又嘱咐说：

“和他们谈话，一定要开怀畅谈，才能谈出心里话和看出问题。要记住，假如他们不愿意谈，就丝毫也不勉强，越勉强，他们就会越不愿意谈的。”停一停又说：“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听说‘抗协’负责人中间，彼此有些猜忌，交谈中更要慎重。”

柳岗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到了“抗协”，一切都很顺利。在那里住了五天，又回到少奇同志身边。据柳岗了解，“抗协”的负责人中间，似乎只有个别人满足于目前这种状况，大部分人特别是下面工作的人员，由于和我们党的关系不够正常，在群众中也得不到支持，都感到有些苦闷。他们再三表示，希望见见少奇同志，并能亲聆少奇同志对“抗协”工作的指示。

听了柳岗的汇报和山东分局同志反映的情况，又研究了许多材料，以少奇同志那样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智慧和透彻的洞察力，对"抗协"的情况和问题，已是了如指掌。柳岗向少奇同志汇报后，请示说："是否写信要他们来？"

"可以。你明日将这些情况去告诉分局负责同志，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写信给'抗协'。"

少奇同志这种高度的组织修养，遇事都遵重地方党组织，考虑他们的意见，对柳岗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

和山东分局商议以后，给"抗协"发去一封信，通知他们：少奇同志欢迎他们来谈谈。去信的第二天，"抗协"的负责人就都来了。少奇同志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并叫柳岗通知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

正式和他们接谈，是在当天晚上。地点是在少奇同志临时住处的院前坪地里，由警卫员同志把两张长方桌连成一个长方的台面，大家围桌而坐。这一夜，月明如昼，天高星稀；院内的几棵洋槐，迎着微风招展。

谈话开始了。少奇同志为了不使他们感到拘束，首先便引导他们对山东一般情况，畅所欲言；然后又启发他们转到"抗协"问题上去。少奇同志恳切地表示，他很愿意和他们谈谈这个问题，听听他们的意见。他说：

"我们都是抗日战线上的朋友，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都不要有什么顾虑，意见不同也不要紧。目前阶段我们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只要是有利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是对全国人民和全民族有利，

什么问题都是好商量的，容易解决的。诸位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谈话是否就可以从这个原则出发？"

"抗协"的负责人都聚精会神地聆听少奇同志启发性的讲话，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越来越轻松愉快，有的人还无拘无束地插话说："在咱的思想中，就不是明确地知道从这样的原则上来考虑问题。"有的人则不自觉地仰头望着星空，似乎在边听边凝神深思。听罢后，他们都表示要好好地考虑一番。

少奇同志又让他们随便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里就说哪里。他们在发言中都谈到了自己怎样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成立"抗协"的经过，还谈到自己的一些想法。

已是深夜十点钟的光景了。柳岗建议休息一下；警卫员同志便乘空请少奇同志服药，因为他这几天正有些胃痛。

大家在院子里等候了一会，谈笑风生，态度都很自然。"抗协"一位年事最长的张老先生说："这正是良夜、美景、盛会！人生难得的境遇……。"

少奇同志服完药走出来，大家又重新入座。少奇同志便请他们谈谈"抗协"的现状。其中一位主要负责人，从"抗协"的组织情况谈到两个旅的军队问题，其他的人还不时插话来补充。有些人提到个别地方的"抗协"下级组织及个别人员和当地党组织关系不够正常的问题；有的人并请求少奇同志对"抗协"的工作和前途给予指示。特别是关于那两个旅的军队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书生，不懂军事，更不知道怎样管理军队和指挥作战。因此，这两个旅的武装，不只

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成了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个负担。对此，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感到苦恼。

少奇同志一直耐心地倾听着他们的意见，这时慢慢站起身来，在院内踱了几步，然后走到台子对面，说道：

“是呵，听你们讲来，抗日同志协会存在着一些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对抗战不利，你们感到有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是一种对待问题的积极态度。”

这时，他们也显得活跃起来了，连声说：

“问题是不少。”

“难得先生路过山东……”

少奇同志认真地考虑着他们每个人的意见和要求，深沉地思索着全部问题的中心所在。从他们的言谈中，看出了他们也有了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要求。接着，少奇同志仍是用启发性的商量的口气，向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他说：

“你们的意见都很好，提出的问题都很重要。至于问题如何解决，首先应该研究一下‘抗协’的性质问题。它究竟是一个政党，还是一般的政治团体或是群众团体？”

他望了望大家，然后对抗日的政党、政团和群众组织的不同性质、任务，他们与领导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及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关系，一一作了详细的说明。

少奇同志接着说：

“但不管‘抗协’是属于哪种性质的组织，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都是欢迎的，都要按照一定的原则来对待。

如果是政治党派，那就是友党的关系，就必须按友党的地位去安排。”

这时，“抗协”的一位负责人问道：

“我们‘抗协’究以属于哪种性质的组织为好？”

少奇同志说：

“这是属于‘抗协’的内政问题，须由‘抗协’自身去决定，我们只能提出上面那种原则性的意见供参考。但不论你们如何决定，我们都是欢迎的。”少奇同志并希望他们仔细考虑，反复酝酿。

“抗协”的负责人请少奇同志休息，明天再继续谈。这时已过夜二点，仰望天空，北斗星显得更加明亮和光辉。

少奇同志的谈话，在他们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散会后，彼此还在纷纷议论，认为少奇同志的指示打开了他们的思路，使他们考虑问题有了一个准绳。张老先生说：“活了一辈子，见过的人物也不少；和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接触，还是第一次。”

第二天下午二时，他们都来到少奇同志卧室的外间，继续进行谈话。经过一天的思考和酝酿，他们的意见基本上取得了一致。但有的人还表现犹豫，希望少奇同志给予指示。

少奇同志微笑着，眼光炯炯地注视着大家，从容地说：

“诸位先生的意见是诚恳的，对一些问题又都经过了思考和酝酿，我们相信是能把问题解决得很好的。要解决‘抗协’的性质，我以为最后是否还得由你们的委员会或是代表

大会来作出正式决定？”

他们说，委员会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有决定问题的权利。

“那很好，你们几位共同的意见是怎样？只要这个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得到恰当解决，别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少奇同志说。

“抗协”的主要负责人当即严肃地站起来说：

“根据胡服先生恳切详尽的指示，我们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和酝酿，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伟大和大公无私。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我们‘抗协’的性质，作为一个政党和政团是不会对抗战工作起多大作用，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前途。何况，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帮助，我们这般人沦落在敌后，不知已成什么样子了！因此，我们希望共产党批准‘抗协’为山东的一个抗日群众团体。舍此，别无更好的道路可走。”

讲到这里，他们看到少奇同志的面容流露着慈祥的笑颜，大家都感到舒畅，滋长了同志的情谊。那位代表“抗协”发言的同志，两眼注视着少奇同志，又进一步说：

“如果先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保证统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族抗日战争中，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少奇同志严肃地说道：

“我认为诸位是从大局出发的，你们这样的决定，是符合民族抗战的利益的。我想我们山东分局也会同意，抗日民主政府也会表示欢迎。”

少奇同志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们就情不自禁地连忙插话说：

“象我们这样过去参加过国民党的人，是否还可能参加共产党？”

“象我这样的老朽，也还能作一个共产党员吗？”

少奇同志微笑着说：一个人只要决心参加革命，谁也没有权利禁止他，革命是每个人的权利。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人的阶级立场也是有变化的。要革命，参加到党内固然好；即使不参加到党内，也不一定不能对革命做出很多很大的贡献，鲁迅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证。

他们越听越高兴，都受到很大的鼓舞，提高了革命的热情和信心。

这时，少奇同志又嘱咐柳岗说：

“你把这几天我们交谈的情况，尤其是和‘抗协’同志们的共同一致的意见和要求，向分局做个系统汇报。”

他又转向“抗协”的负责人说：

“诸位还有什么具体问题，也可以找分局的同志谈谈，和他们一起研究解决。另外，你们最好根据今天研究的结果，用文字向分局写个报告。还有，你们回去，应该把你们的思想和决定，变成‘抗协’每个成员的思想和行动。”

问题就这样完满地解决了。“抗协”的负责人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充满感激和崇敬的心情告别了少奇同志。

这以后，“抗协”干部都积极参加了减租减息运动，在运动中，不少年轻人在政治上得到了较快的进步，相继提出了

入党要求。一些主要负责人，以后也不止是同我们坚持了山东根据地的斗争，而且大部分也参加了共产党组织，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一切从实际出发

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同志在反扫荡中牺牲了。宣传部的工作任务很繁重，人手本来就不多，李竹如同志的牺牲，使工作更加紧张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就请求少奇同志派柳岗去暂时帮助工作。

当天晚上，少奇同志找来柳岗，把朱瑞同志的意见告诉了他，让他考虑。这也可以说是少奇同志的一个特点，在一般情况下，他交代任务从来不是用命令的口气，而是向你说明情况，让你自己去考虑。但是，从对情况的分析中，你会自然地得到启示，明确任务的意义，从而坚决地去执行。

柳岗回答少奇同志说：

"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听从胡服同志决定。"

话刚说出口，柳岗心里却又不免有些矛盾。因为少奇同志当时正在研究山东的全面情况，工作十分繁忙，身体又不大好，自己在他身边虽然做不了什么大事情，但总还可以帮他做点具体事务工作。……

"你看怎么样？我看应该去帮一下。"从柳岗踌躇的神情中，少奇同志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于是补充说："当然，我这里也还有些事情需要你。你上午去分局工作，下午仍回到这里来。就这样办，好不好？"

"好，我去。"随后，柳岗又请少奇同志对分局当前的宣传工作，给予一些方针原则性的指示。

少奇同志微笑地看着柳岗说：

"先不要问我。必要的时候再告诉我。你到那里帮助工作，主意不要出得太快，首先要多了解情况，多听听宣传部同志们的意见，多向分局领导上请示，在具体执行任务的时候，胆子要放大些，心要放细些。当然，工作中碰到了什么问题，你可以来问我。但是，你如果什么事情都要问过我再做，那么，你无论什么时候也不敢独立负责进行工作。"

少奇同志遇事都把组织原则抓得那么紧，又是这样大胆放手的培养干部，使柳岗非常感动。第二天上午，柳岗就愉快地到分局去帮助工作了。

有一次，分局宣传部在研究对敌宣传工作的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把我国古代诗人的反战诗歌，译成日文，对敌宣传，以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这时，柳岗立刻想起刚过了陇海路封锁线，在滨海区边沿的小镇上，少奇同志要我们向敌人学习的那幅画来。柳岗于是就把少奇同志当时对于那幅天主教宣传画的分析以及对同志们的教育，向宣传部的同志们作了传达，并提出在诗文旁边也可以配上形象鲜明的招贴画，使宣传效果更好。

宣传部的同志们听了柳岗的传达，都感到少奇同志的指示对自己很有启发，于是，大家立刻动起手来。不几天，诗画并茂的宣传品一张张的创作出来了。其中有一些宣传画特别成功，如"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诗句

下面，画着在日本富士山前，樱花树下，一个美丽的日本少妇正在痴情地期待着她的丈夫归来；而在另一端画的却是曝晒在中国广漠无垠的原野上，在那破碎的太阳旗下的一堆骷髅白骨。又如在“一将成功万骨枯”的诗下面，画着一个胸前挂满了勋章的日本军官，他双脚踩在一堆日本士兵的尸体和骷髅上，左手高举酒杯，右手搂着“爱国妇人慰劳队”的女人，正在洋洋得意地狞笑。这些画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侵略战争的本质，反映了这个服务于日本统治阶级的战争，给日本劳动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反映了日本人民和士兵对于侵略战争的厌倦和憎恶。

画搞出来以后，我们就把它送给少奇同志看。少奇同志看了，很高兴地说：

“对，做工作就是要肯去想办法。我看这些画，日本士兵一定会喜欢看的，而日本的军官呢？又一定会阻止他们去看。这样，就不只是达到了宣传的目的，而且还会扩大日本军官和士兵之间的矛盾。”

听了少奇同志一次比一次深刻的指导，柳岗和宣传部的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信心也更充足了。很快地，一张张诗画并茂的宣传品随着装满了袜子、毛巾、肥皂、香烟、糖果的宣传袋，送到了敌人的据点里；在敌人必经的路口，不论是墙上、树上、地上，也到处贴满了宣传画。

这些画一贴出去，果然不出少奇同志所料，把日本士兵们吸引住了，一个个围着画转，有的士兵看过后还偷偷地抹

着泪花。日本的“太君”（军官）看到这些现象，就更加惶恐起来，他们向士兵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观看中国人的宣传品，违者严惩。但禁令征服不了士兵们思乡的感情和厌战的情绪，他们当着“太君”的面不敢看，只要“太君”不在旁边，见到宣传画，就总是偷偷地看。当时有不少士兵就因为偷看中国的宣传画，被“太君”鞭打脚踢，加深了敌人官兵之间的矛盾。

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兴奋地去向少奇同志汇报，少奇同志听了，仍是那么安详地微笑着说：“是的，一定会这样的。”

在这些日子里，柳岗经常上午到分局工作，下午又回到少奇同志身边。遇到比较重要复杂的问题向他报告，他总是那样仔细倾听，并随时给予明确的指示。

在当时的山东，特别是在孔子的故乡鲁南一带，不只在上层，就是在群众中，孔子的影响也颇深，如成年男女不得父母或家长许可，便不敢公开参加任何活动，有些父母或家长常拿“老夫子”（即孔子）的言论来约束家庭内的成年男女。这对于我们抗日民主建政和开展群众运动，都是一种阻力。因而，对孔子应采取什么态度，便提到了分局宣传工作的日程上。分局宣传部的一些同志，认为应该正面提出孔子来加以批判，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几千年来，孔子在群众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我们只能利用孔子来向群众进行教育，而不能直接批评孔子。柳岗当时感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既不能对这种不利于抗战和民主的落后

保守思想让步，也不能脱离群众。但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自己思想上也不明确。请示朱瑞同志，朱瑞同志也认为这样的问题应向少奇同志请示。

下午，柳岗回来向少奇同志汇报了情况，并转达了朱瑞同志的意见。初夏的和风轻轻吹拂着，窗前婆娑多姿的树枝摇曳着，投影在这个朴素的房间里。少奇同志坐在窗边，注意地倾听着，凝视着坐在对面汇报的柳岗。随后，他沉思了一会儿，以严谨而又谦逊的态度对柳岗说：

“这类问题，最后还是要请山东分局根据实际情况去处理。我只能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少奇同志当时说的大意是：孔子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不能否认，其主要方面又成了阻碍社会前进的有害东西。今天中国还有它的社会基础，在山东、特别是鲁南这个地方影响比较大，那也是很自然的。说到这里，少奇同志上身微微前倾，注视着柳岗说：

“你想想，他生在鲁南，孔子庙就在曲阜，还有许多传说遗迹，历代帝王差不多都到这里立碑，致祭……”

少奇同志继续详细指明：由于孔子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光是个历史传统问题，还存在着一定的社会依据。因此，要群众把这长期以来的传统思想改变，要完全消除孔子对群众的消极影响，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在敌与我之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

少奇同志站了起来，背着手缓缓地踱着，他的目光落在

那两扇大门上已经退色的对联上，然后意味深长地说：

“农村到处张贴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的对联，我看那就是地主阶级的标语、口号；它能为农民所接受，是有其社会基础的，那就是封建性的经济基础和其家长制的残余等等。”

柳岗一面聚精会神地听着，一面很快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少奇同志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又说明：本来，在抗日战争这样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各方面都在重新组织力量，都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而意识形态等东西的根本改变，只有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才能跟着改变的。我们通过减租减息运动、生产斗争、民主建政等等一系列的运动和斗争，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来一个文化教育运动，可以逐步地改变群众的思想面貌。但是要根本解决问题，须待抗战胜利之后。

少奇同志稍微停了停，幽默地说：

“目前，我们在有些问题上还是要同孔子妥协的。”

他接着讲述怎样妥协的问题，说明暂时可以不去正面地批评孔子，但这不等于可以去迁就落后，不对有害的东西作斗争。对于有害的思想，是必须进行批判的，只是不正面地作为孔子思想去批判。

少奇同志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当我们进行每一项工作时，既要足够地估计到群众的革命热情和要求，也要恰当地照顾到群众的觉悟和认识水平，主观主义是办不好事情的。

少奇同志还讲到孔子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他说：譬如

孔子曾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是主张民族自卫、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它，不应该把孔子一笔抹杀。

最后，少奇同志引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明，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从对立统一的辨证法的原则出发；并强调指出，群众工作绝对不容许脱离群众；宣传鼓动工作是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是我临时想到的，你看怎样？"少奇同志看了看柳岗的神悄，大概担心他误把中心工作放在处理孔子的问题上，于是慎重地叮嘱说："不要把过多的力量放在这些方面；目前的宣传鼓动工作，应该是围绕正在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去布置和进行。"

当时，分局的宣传计划里面，又打算通过群众团体的指示，到各个乡去建立文化宣传站，把它放在村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经常性的群众宣教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柳岗也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认为，这种想法倒不见得不好，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领导群众搞完减租减息以后，结合生产建政和对敌斗争，把农会巩固起来，同时把农民引上民主斗争、武装斗争的道路。而群众经过减租减息，生活改善了，觉悟提高了，很自然地就要求掌握印把子和枪杆子，来保护他们的胜利果实。群众运动是有一定规律的。因此，少奇同志认为目前不必分散力量。他恳切地看着柳岗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你可以去问问朱瑞同志，你必须根据分局的指示办事。"

柳岗感到经过少奇同志一层一层地剖析，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少奇同志是这样循循善诱，使你感到他并不是在这里下结论，而是不知不觉地引导你去探索问题的根源，把握事物的本质，使你自己原来还在犹疑中的问题，都获得了正确的解答。他是那样懂得你的心思，好象看透了你的心，有些问题还没等你提出来，也会帮助你找到解答。

那时候，山东老百姓家里逢年过节办喜事，都要贴对联。分局宣传部便打算用这种旧形式宣传新内容，写它几百几千副对联，用旧的楹联集锦的形式，印发给敌占区的群众。同时，有关岳飞的传说在山东流传很广，在群众中的影响很深，每个村里差不多都有人会讲岳飞传，群众都很爱听。晚饭后，或者在阴雨天，老乡们就凑到一起，岳飞传一开讲，很快就会有许多人来听。因此，当时我们研究，想把岳飞传加以修改，去掉里面的迷信部分，强调反金和民主方面，用古本岳飞传的形式印行，通过敌占区的说书人去进行宣传。但这件工作是要组织相当力量才能做到的。有了这个计划后，柳岗就去向少奇同志请示。

记得，那是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大家边走边谈。这时，麦浪迎风起伏，天空彩霞缤纷，它的投影使那柳枝飘拂下的小溪流水显得分外绚烂。但是，谁也无心欣赏这美丽的大自然景色，大家都为谈话的内容所吸引住了。

少奇同志显得很高兴，在听完柳岗的报告后，点头微笑说：

"这样的想法很好，工作就是要肯去想，想尽各种各样

的办法，来开展有利于我们和打击敌人的斗争。”

他接着说明，对联，那是封建时代的标语，口号，封建统治者利用对联去为他们服务，现在，我们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是完全可能的。譬如辛亥革命后，许多地方贴“万民平等，五族共和”的对联，那就是以封建时代的形式来宣传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那么，我们何尝不可以这样作，我们何尝不可以利用它来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哩！问题是在这些方面，应该只用较少的力量，如果用过多的力量，以致影响其他工作，特别是中心工作，那就要考虑了。”

少奇同志顺便坐在柳树下的石头上，点燃了一支烟。我们有的在石头上坐下来，有的在他身旁站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谈到修改岳飞传的问题。他指出，把岳飞传修改一下进行宣传未尝不可，但是，书本身有一定的结构，你如果是改动太多，要碰到困难的。这比利用对联更容易为敌人发现。

“那是不是可能费力多收效少呢？”少奇同志用询问、启发的神态看着柳岗，“拿对联说，你搞几百几千副对联，敌人发现一副，也不容易马上通通发现；同时，对联一向在群众里面也没有固定的内容。岳飞传，那就不同了，你要用修改了的东西去改变在群众中长期流传的故事，更是不容易的……”

少奇同志站起身来，环顾着随行的同志们说：

“这样的问题，应该从多方面来考虑一下，是不是？”

大家都听得出了神，不觉已是皎月东升，时间不早了。

少奇同志精神焕发，和我们一起，迈着稳健的步伐，浴着晚风归来。

柳岗每次把少奇同志的指示告知朱瑞同志，朱瑞同志都很高兴，认为少奇同志的指示非常重要，并且说，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去布置，山东的宣传工作一定能够很好地开展和摸出规律来。

少奇同志在山东地区停留了四个月左右。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山东地区的工作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地的面貌改变了；敌友我的力量对比改变了，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干部的水平也提高了，党的团结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核心堡垒作用大大地发挥出来了，根据地也巩固扩大了。特别是少奇同志那种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原则，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使山东地区的党员、干部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也使跟随在他身边的同志们得到极大的教育。

三年以后，朱瑞同志回到延安，我们又见面了，谈起过去的事情，他说少奇同志那次经过山东，对山东工作的开展是起了决定作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他的指示是正确的。

关心群众利益

七月，我们离开逗留了几个月的山东分局，继续向延安进发了。根据交通情况和沿途的敌情，山东分局认为一百

多名的大队干部随少奇同志行军，目标大，行动不方便，不容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少奇同志于是决定让大部分人员由东海、诸繁转回华中，只留我们几个人和警卫班随行。

在去往鲁南的路上，要渡过两条大河——沭河和沂河。这两条河是平行的，都是从北到南。两河之间的距离约有十华里。在沭河和沂河沿岸，日本鬼子设立着密集的碉堡据点，如果我们在两河之间约十华里的地带被敌人发现，那就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了。

少奇同志事先了解到这些情况，并且和负责护送我们的一一五师第五独立旅旅长曾国华同志具体地研究了渡河的部署。当天，曾国华同志分别派出几批妥实干练的人员去侦察情况，在沭河、沂河岸边组织水手，准备渡船。少奇同志和我们预定在傍晚时分悄悄渡过沭河，急行军穿过约十华里的中间地带，连夜偷渡沂河。

傍晚，曾国华同志护送少奇同志和我们渡过了沭河，按照事先规定的路线向沂河奔去。正行走在中途，忽然狂风呼啸，沉雷震耳，顷刻间天地一片漆黑，大雨象瓢泼似地浇下来。我们浑身全湿透了，每个人都关心着少奇同志的身体，因为他当时正患着肠胃病。少奇同志却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反而来关心每个人，特别是关心随行的女同志。少奇同志对每个护送或是充当向导的同志及群众，都给予极大的尊重和信任，他自己在行军中总是作为普通的一员。

到达预定偷渡的沂河东岸时，已经是深夜了。倾盆大

雨越下越大。曾国华同志沿着岸边仔细寻找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事先派来侦察的人员和准备的渡船；他虽然是一个善于游击战尤其是善于夜战的能手，但是这一次由于护送党内这样一位负责的同志，感到自己的责任十分重大，因而不免有些焦虑。加之少奇同志当时的身体不够好，在暴风雨中，大家都担心他会淋出病来。

在这对面看不见人的黑夜中，人们沉默不语，少奇同志早已觉察出来大家的担心和曾国华同志的心情，他宽解地对大家说：

“既然派来的侦察、联络人员和布置的渡船没到，也不要着急，只是我们不要让敌人发现和遭受突然袭击。可以先到河岸比较隐蔽的地方，等待和研究情况。”

于是，大家都来到一家摆渡人的茅屋里。

一个钟头过去了。大雨仍没有停止。派去侦察、联络的人和预先布置的船仍然没有踪影。

曾国华同志分析可能发生了意外，便亲自带领便衣警卫、侦察人员到附近村子里了解情况，特别是河对岸敌人的动向。据老乡们说，今天还没有发现沿河敌人有什么动静，象这样刮风下雨的天气，伪军们很少单独出来，但是日本鬼子却在这样的夜里，和我们渡河的同志开过火。曾国华同志根据情况进行了判断，认为象这样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大雨天，对我们隐蔽过河是有利的，但是日本鬼子为防止我们利用雨天黑夜偷渡，也有可能设下埋伏。因此，到底渡河还是不渡河，他觉得是个大难题。

回到茅屋里，曾国华同志向少奇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检讨自己事先布置不够周密。

少奇同志认真地听了曾国华同志的汇报，没有丝毫焦急的表示，对曾国华同志也没有任何责难，反而给他以安慰。少奇同志镇静地说：

“我对情况毫无了解，究竟怎样行动，还要请你决定。”他思索着，分析说：“根据你所讲的情况，这里是敌人一个重要的口子。我们的侦察联络人员又没有消息，预先布置的渡船也没有到来。过去，我们在这样的夜晚也出动过，敌人有这个经验，目前又正是夏收的季节，敌我对粮食的斗争正处在剧烈的时期。同时，我们白天经过的地方，有些是市镇，也有可能走漏消息。当然也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从最坏的情况估计出发。毛主席常常讲：我们从最坏的情况估计出发没有坏处。过不过河，还是请你决定。不过，在这个地方不宜待得过长。如果不强渡，那就应该考虑是否转回到沭河东岸去。”

经过少奇同志这样明智的分析，曾国华同志心里有了底，决定返回到沭河以东。当夜，我们急行军向东转进。

第二天夜晚，我们再一次渡过沭河，穿过中间地带，安全地过了沂河，脱离了险境。后来曾国华同志得到情报：据说就在我们准备渡沂河的那个大雨天的夜里，敌人在对岸渡口附近设了埋伏。那时如果我们强渡过去，就会受到难以臆想的损失。少奇同志的判断是多么英明啊！

渡过沭河、沂河以后，我们进入鲁南的册山地区。这天

夜里没有月亮，漆黑的天空撒落着蒙蒙细雨，庄稼地里浸满了水，路上的沟渠又多，少奇同志和我们只好摸索着前进，准备在天亮以前走出敌占区，进到我们鲁南抗日游击区。

不幸，给我们带路的同志迷失了方向，走了好久，还没有转出这块地盘。看看天快亮了，还在敌占区里转，大家十分担心少奇同志的安全，有些同志着急地嘟囔起来：

“怎么搞的？这么半天还没走出去！”

“眼看天快亮了，被敌人发现了怎么办？”

“真是乱弹琴……”

这时，少奇同志正站在一棵树下，好象在思索什么。听到有人抱怨向导，就走过来对大家说：

“你们不要抱怨向导同志。他负着很重要的责任，找不到路，已经很着急了，我们不要去搅乱他的心，要让他冷静地去慢慢想办法。”他侧过身来，口气温和的安慰向导同志说：“不要着急。这一带地方你很熟悉，仔细想想，你会摸清方向，会找出路来的。”

少奇同志的话，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就连向导那紧蹙的眉头，也慢慢舒展开来。他走到三岔路口，认真地辨识着方向。这时，我们看着少奇同志徐步走回树下，象往常一样平静地站着，安详而镇定。

的确，我们自从跟随少奇同志行军以来，无论遇到什么意外的事情，从来没有看到少奇同志着过急，优愁过。他总是非常镇静地鼓励我们，给予我们以力量和信心。他对每一个根据地护送我们的同志，都是关怀的、信任的，经常让

我们去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要求，尊重他们的意见。他常常教导我们说："护送我们的同志，他们既了解情况，又和当地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决定都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才作出的，我们只有听从他们的安排，要我们怎样行动就怎样行动。你如果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表示怀疑，那就很容易动摇他们的决心，这样反倒容易把事情办坏。如果万一他们的布置有错误，那也必须在一定的场合，作为经验教训，适当地提出。"少奇同志就是这样地信任和尊重同志。

向导同志在少奇同志的安慰、鼓励和启示下，终于找到了一条小路，把我们顺利地带进山区——这里已是鲁南抗日游击区了。

正是炎热的夏天。雨过天晴，酷日当空。经过彻夜急行军，水米没打牙，大家又累又渴，汗如雨注，衣服全被汗水浸透，湿漉漉地紧贴在身上；每个人的嘴唇焦干，嗓子里就象冒了烟一样。这时，正巧路过瓜田，一眼望去，遍地都是水凌凌的大西瓜。随行的勤杂同志顺手就摘了两个西瓜，送到少奇同志面前说：

"首长口渴了，吃点西瓜吧！"

少奇同志一见，脸色顿时严厉起来，说：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赶快送回去，从哪里摘来的，送还到哪里去。"

接着，他回过头来凝视着我们，严肃地说：

"你是不是真正关心群众的利益，就要看这种场合。假如大部队从这里经过，口渴了都自己去摘西瓜，几千个人，

一人一个，不就把这一大片地里的西瓜摘光了？那么，老乡一年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这对我们党，对我们军队的影响很不好。敌人和汉奸会利用它来破坏我们的。你们想想看，群众不赞成，我们还能在敌后待下去吗？根据地还能巩固扩大吗？"

少奇同志看到大家都不说话了，似乎觉察到大家的心情，语气慢慢缓和下来，继续说：

"当然，我们革命就是为了群众，保存革命力量是符合群众利益的；如果不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群众会吃更大的苦头。比如在长征的时候，我们硬是没有粮食吃，只好打了借条向群众借，以后再设法偿还。可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到了非摘几个西瓜来解渴，就不能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的地步。你们说是不是？"

他这一问，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在敌占区和游击区行军，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常常靠着庄稼地边走，一来为了隐蔽自己，不易暴露目标；二来万一发生了情况，可以钻到青纱帐里，有个回旋的余地。在敌人活动繁多的地区，有时还要在高粱地里穿小路。有时一夜要走一百多里路。在这样长途的急行军中，走到后半夜，真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一个不小心，或是没有抓紧牲口的缰绳，牲口就扭头抢吃一口庄稼。特别是在就地休息的时候，那怕只休息五分钟，一坐在地上，有些同志马上就睡着了。而正在路边吃青草的牲口，就去抢吃路边的庄稼。

一次休息时，少奇同志发现了这种情况，他立即提醒我

们要好好管住牲口，并恳切地告诫我们说：

“你们都读过《三国演义》吧？就连曹操行军都不让糟踏老百姓的庄稼。何况我们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群众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不爱护群众利益，就不会有什么党性。我们革命就是完全为着群众，应该随时随地有这份心事。”

从那以后，我们在行军中就地休息的时候，就不象以前那样紧紧挨着庄稼坐下，免得瞌睡时身体压坏了庄稼；并把牲口的缰绳紧紧地缠在自己的手腕上，这样，只要牲口一动，我们就会马上惊醒。少奇同志看到我们这样做，满意地笑了。

又一次，也是黑夜行军，由于连续跑了几天急路，到了下半夜，实在疲乏不堪，一边骑在牲口上走路，一边打瞌睡。正在迷迷糊糊地走着，忽然砰地一下，不知什么东西碰在头上，猛然惊醒，抬头一看，嗬，原来是又香又大的梨子。这时，借着闪烁的星光，我们才发现正从梨林穿过，枝头累累，硕大的梨子把树枝都压弯了。微风吹来，清香扑鼻。旁边一个爱淘气的警卫员故意提高嗓子：“看，好大的梨子打脑袋哟！”把大家逗得哧哧笑。尽管那时大家口里干渴，却都不约而同地弯下腰来，从树丛中小心翼翼地穿过，深怕把梨子碰掉呢！

把斗争坚持下去

在前面的路途上，要穿过大片敌占区，要通过当时山东

的国民党死顽固派周倜的据点，更重要的是，我们随身带着华中局和山东分局的十二包绝密文件和密码。路途艰险，任务又重，为了保护好党的文件，避免由于人多而引起敌人的注意，组织上决定分散行军，我们和警卫排的几个同志作为第一批，携带六包文件先走；少奇同志随后出发。

我们把一切准备好，就去辞别少奇同志。这时，大家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几个月的行军生活，我们一直是跟随在少奇同志左右，今天突然要离开他，心里有一种难舍的感情。特别是一旦离开少奇同志后，对少奇同志的安危就更觉担心。

少奇同志看到我们站在他的面前，就亲切地关照大家说：

“你们这次西行，责任很重呵！”他指指我们背上背着的六大包文件，“这是绝密文件，你们一定要保卫好党的文件。随身要带好火柴，万一落在敌人手里或者被敌人包围，必须立刻把文件烧掉，千万不能让文件落入敌人手中。当然，我们应该争取一切机会和可能保全自己，实在万不得已时，就牺牲自己，保卫党的机密。”

少奇同志虽然只说了这么短短的几句话，但是，这几句话却充满了一个革命者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于革命同志深厚的关切和热爱。这种伟大的感情感染了我们，大家立刻从刚才那种难舍难分的心情中振作起来，每个人都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感到党对自己的无比信任。大家背负着文件包，愉快地告别了少奇同志，信心百倍地奔上

征途。

第二天晚上，我们穿过了津浦铁路，远远地看到月色下闪耀着一片银光。这就是壮阔而秀丽的微山湖。看到她，我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兴奋。在这方圆二百多里的敌占区，她是我们唯一的据点。四面都是敌占区，经常遭受敌人残酷的"扫荡"，我英勇的微山湖游击队就坚持活跃在这里。当天夜里，我们必须赶到那里才能歇脚、休息。

趁着月光，我们疾步向着指定的方向行进，不久就到达了湖边。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寻找，只听得"依呀"一声，从玉花纷飞的芦苇丛中，飞出几只小划子来。七、八个游击队员立刻把我们接下船去。小划子在水波中箭似地向前飞驶，很快地就把我们带到了湖中的一个沙屿上，准备休息一天再过湖。

我们在微山湖里一直转到黄昏，才在邳县靠岸。上岸后，往西南方向走了半夜，天空忽然下起雨来，四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一片高粱地里，我们迷失了方向，结果柳岗带着四包文件和一行同志走到前面去了，江明和另外几个同志带了两包文件落在后面——队伍失散了。这里正是顽固军周侗的据点，又紧靠着日本鬼子的据点。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

为了不在路上撞着敌人，后面的同志决定派几个人往前面去寻找队伍，留下的几个人暂时隐蔽到高粱地里保护文件。

更深了。雨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湛蓝的天空中，现

出点点繁星。江明站在高粱地里，看着那满天星斗，不由得想起有一次随少奇同志穿过陇海路的情景来。那却不是这样一个星光闪烁的夜晚，队伍在穿越公路时，被敌人发现了，枪声乱响，同志们都紧张地立刻分散开来。记得少奇同志那时是多么从容，他一面关照着大家的行动，一面镇定地向大家说："沉着一点，夜里的枪是打不准的。"脱险以后，少奇同志一边走，一边告诉我们：在黑夜行军，必须学会识别方向。他指着北极星给我们看，说北极星的位置总是在北方，只要找到北极星，就不会迷失方向。他还告诉我们：在没有星星的阴天，夜晚可以通过建筑物和植物来辨别方向；一般的庙宇和民房，正门多半是向南开的；如果碰到树木，可以用手摸一摸树皮，朝南的一面因受阳光曝晒，表皮粗糙，朝北的一面就比较细滑……

狂吠的犬声四起，枪声又响起来了。

"江明同志，队伍还没有找到，怎么办呢？"小刘紧紧地抱住一包文件，看着江明说。

江明的思路被打断了。但是，少奇同志在斗争面前从容不迫的形象，仍然缭绕在她的脑际，鼓舞着她，使她感到浑身都是力量。她对小刘说：

"不要紧，前面的同志不会走远的。万一我们被包围了，你就顶住打，我就烧文件。我们一定要记住少奇同志的话，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党的文件决不能落入敌人手里。"

不久，和前面的队伍联络上了。我们继续向前飞奔，黎明前，进抵十字河，经过一场短促的战斗，我们带着完整无

缺的文件和密码，闯过了顽军的封锁卡。安全地到达湖西区党委，在这里又和少奇同志会合了。

* * *

离开湖西军区，当夜就是艰苦的夜行军，要通过约一百华里的敌占区，在这里，几次都要从敌人的“钉子”中间穿过，有一处，不到一里路的地方，一边有一个钉子，前面还横着一道几丈深、几丈宽的封锁沟，须用铲子从沟沿挖一道口子通过。寨子里的地主也无目的地向我们打炮。

在穿过敌人这样严密的封锁线之后，进入游击区，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可是，少奇同志却提醒我们，在游击区里仍然要提高警惕。我们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依旧保持着紧张的战斗戒备。那时，虽然已是秋天，天气仍然很热，加上行军速度很快，常常是汗流浃背，疲惫异常。这天晚上，天还没亮，我们就赶到了宿营地——一个偏僻的三家村。

整个村庄在沉睡中，没有一点动静。那夜没有月亮，我们趁着星光，悄悄地进了三家村。只见黑洞洞的几所小草房，没有一丝光亮。老乡们经过一天紧张的劳动，正沉入梦乡。

警卫员同志正要叫老乡的门，想在屋内找个地方，让少奇同志休息。少奇同志发觉后，马上制止说：

“不要惊动老乡。这里是游击区，敌人也常常来来去去的，这样深更半夜，你们一叫门，他们辨不清是敌人，还是八路军，又要担惊受怕。”

当夜，少奇同志就和我们露宿在外面。

一觉醒来，觉得身上有些凉，用手摸摸，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原来，秋夜的露水把衣服全打湿了。我们赶紧侧过头来，看到少奇同志正伫立在一棵树下，凝视着晨曦掩映着的凸凹不平的山谷，衣衫也被露水打湿了。这时，大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激动，想到少奇同志日夜操劳，身体又不好，为了怕惊动老乡，自己和大家一起露宿在外面，这种对群众的关怀和体贴，真是无微不至呵！

不一会儿，茅屋的门开了。几个老乡走出来，他们忽然发现一些穿着军装的人，不免有些惊疑。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八路军时，又是惊喜，又是感动，眼睛里闪着泪光，激动地说：

“同志，你们干嘛不叫门呢？”

一位老大娘用手摸着我们湿漉漉的衣服和头发，嘴里念叨着：

“唉，这是怎说的，全给露水打湿了，生了病怎么办？赶快进屋里去吧。”

老乡们顿时忙碌起来，抱柴禾，拉风箱，要我们烤衣服，给我们烧开水。弄得我们都很过意不去。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鲁西区党委。

* * *

离开鲁西区党委后，经过了一夜的急行军，通过了敌占区，突破了封锁线，我们到达了冀鲁豫接管部的沙区。

沙区是一片沙土地带，到处是沙窝，很不容易长庄稼，老乡主要靠种枣树、挖土盐维持生活。敌人在这里实行了

十分残酷的三光政策，不仅强迫群众砍掉他们的命根子，——枣树，而且还残忍地把人推到井里去，把井都填满了，断绝了群众的水源。我们后来经过一个小村，全村五眼井被堵死了三眼。这年又碰上大旱，群众生活困苦极了，家家户户都没有粮食吃，只能用枣树叶子和尚未成熟的小枣充饥。

我们一到沙区，就有人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当地的敌情和群众的生活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负责沙区工作的领导同志中间，有个别同志在工作中缺少办法，情绪低落，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够密切，以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少奇同志和随行人员，又多方面地了解和研究了情况。

少奇同志对这些情况十分注意。有一天，他把沙区的几位负责同志请到他住的小屋里，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坚持游击区的斗争，开展根据地的工作问题。

这是一间狭小的土房，屋里除了一个土炕和一副简朴的桌凳外，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少奇同志请那几位同志坐到土炕上，亲切地问：

"我们从你们这里经过，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知道的？是不是可以谈谈你们这里的情况，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没有？"

那几位同志比较具体地向少奇同志汇报了这里群众困苦的生活情况，汇报了敌人为了隔绝鲁西同冀南以及晋东南的联系，封锁十分严密的情况；汇报了我们和敌人斗争的

艰难情况，等等。汇报十分详细，但是没有谈到今后准备怎样来克服和战胜这些困难、改变局面的问题。

少奇同志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感到这个地区有一些同志之所以信心不足，一方面是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不足；看困难方面多了一些；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工作中群众观点不够，没有使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让群众自觉地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于是，少奇同志就耐心地从各方面来启发他们，从当地基本群众以及各阶层人士对敌我的态度，一直问到农民救国会在群众中的作用和威信如何，差不多每个问题都贯穿着我们和当地群众的关系问题。但在当时，其中的个别同志总是感到当地客观条件太差，对于在本地区能否坚持下去的问题，显得神情踌躇，面有难色。

少奇同志仍是那么安详和坚定，他严肃而恳切地向他们说：

"困难是存在的，但是革命嘛，本来是一条充满了困难的道路。眼前的问题是如何设法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目前首先要想办法帮助群众生活下去，要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步骤。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在吃枣子和枣叶，那是不行的。应该赶紧动员老百姓种植瓜果蔬菜。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水，一是种子。目前很多井被敌人破坏了，我们全党全军应该立刻帮助老百姓一起来疏通恢复。另一方面再和区党委商量，到旁的地方去匀点种子来。"

少奇同志说到这里，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绿油油的枣树，又接下去说：

"种什么呢？我看菜呀、瓜呀、萝卜、豆角等等，凡是能生长的都可以种。将来能结瓜果就吃瓜果，长不出瓜果的，就是叶子藤子也可以吃呀，总比吃生枣和枣叶要强，比没有吃的更强。这样，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后，瓜果长出来，群众生活就好一些了，枣儿也成熟了，我们再帮助群众把枣子卖出去，换些粮食和日用品回来，群众的生活就更安定了。"

说到这里，少奇同志语气更加坚定而明确地说：

"我们在这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给群众东西，而不是向群众要东西。"

这时，我们看到那几位同志的神情，已经不再象刚来到时那样，他们紧蹙的眉毛渐渐舒展开来，眼睛也显得明亮了。其中一位同志带着感动的神情，问少奇同志：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请你也给我们一些指示。"

少奇同志思索了一下，说：

"到今冬以后，我们就得采取一些步骤，帮助群众恢复生产了。你们这里，各地区搞生产不是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嘛，必要时还可以请求区党委给一些帮助和救济。我们要通过这些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但这些工作，必须通过农救会去做，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真正认识到农救会是自己的组织，是为他们办事的。现在先帮助老百姓度荒，然后再恢复生产。把生产搞起来了，再去同区党委研究，在适当时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通过这一运动使群众的生产得到发展，

组织得到巩固，群众的觉悟就会大大提高。"

少奇同志看了看那几位同志，见他们正听得出神，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兴奋活跃的神色。少奇同志的话头忽然又转到了另一个问题上：

"当然罗，光是有这些办法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全党全军的作风问题。我们必须和群众同甘共苦，在群众中生根，要使群众相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这里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长期坚持下去的。要做到这样，我们的军队和干部就一定要深入到群众里面去，每个人至少在群众中交几个知心朋友。要使群众真正认识共产党是他们的自己人、亲人，八路军是他们自己的军队。使他们敢于向我们讲真心话，而且说了以后感到很高兴。如果发现了群众中的问题，可能解决的，不管大大小小，都应该及时帮助他们解决；不能解决的，也应该及时向他们解释，并指出出路。当然，要这样，我们领导干部首先要放下架子，把自己放到群众之中，要真正认识到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而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特殊，因而高踞群众之上。那些站在群众头上拉屎撒尿的人，是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而对他们个人来说，也是很危险的。你们说，象张国焘这些人，哪一个有好下场？"

夜深了。少奇同志透过小窗户看了看湛蓝的碧空，满天星斗闪烁着点点银光。

当我们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站在门外，紧握住我们的手说：

"这回胡服同志从这里经过，真给我们解决了问题。说老实话，如果说胡服同志的精辟而正确的观点和见解，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和办法，那么胡服同志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于部循循善诱的教诲，更加给了我们革命的精神力量。我们向党保证，回去以后，一定遵循胡服同志的指示，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 * *

我们到了鲁西以后，少奇同志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听取了区党委和军区的汇报，对他们的工作和问题，一一都作了指示。当时在鲁西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大刀会、小刀会的问题。

鲁西有一大片地区，大刀会、小刀会的群众原先是要求抗日和接近我党我军的，但由于敌人暗中收买，潜入大刀会、小刀会的地主、兵痞、流氓以及国特和汉奸等反动分子，采用了种种险毒、卑鄙的手段，利用某些群众的落后情绪，破坏群众和我们的关系，渐渐地建立起为敌伪服务的地主、汉奸的统治。军区和区党委为着和敌人争夺这个地区的群众，采取了许多步骤，进行过许多工作，军区还特地组织了武工队，前去开辟工作。少奇同志到鲁西时，这个问题也提到了他的面前。

少奇同志听到这个问题后，作了仔细的了解和研究。他严肃指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必须千方百计把局面打开。他对大刀会、小刀会作了科学的分析：这类组织，原先也是一种农民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过是一种比较落后的组织。后来，地主阶级和其他社会渣滓，为着想利用它，也想法混了进去，这就使这个组织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反动的成分和性质也就日益多了起来。现在敌人竟又在那里施展种种阴毒的手段加以利用，这是不容忽视的。但不管怎么样，它的大多数会员都是农民。地主和坏人虽然是其中当权的，却是少数。群众和敌伪间的矛盾，敌人也是无法对付的。所以，只要我们长期地持续工作，这类组织里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完全可以争取过来的。采取武工队的方式，也是可行的。

鲁西的同志听到这里，便开始感到有了信心。接着，少奇同志又恳切地对他们说：象这类工作，既不能性急，又不容许等待，要抓紧时机。第一步在于如何把基本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明白我党政策，明白只有抗日，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才有出路。对其他各阶层的人们，也要尽量去争取，或者把他们中立起来。对那些与我作对的坏人，也要先礼后兵，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改正，我们不咎既往。对于个别死心塌地与我为敌的坏分子，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他，叫他改变态度，否则决不饶恕。说到一定要做到，要杀驴子给马看样。但是决不容许去树立新敌，扩大他们与我党我军的矛盾。

鲁西的同志有的插话说：

"这样，方针政策明确了，就好办了。"

有的说：

"按照这样的方针政策去做，局面是完全可以打开的。"

少奇同志接着说：

"你们采用武工队的形式去开展工作是好的，但武工队不和当地群众建立联系，工作是不能开展，不能深入的。和群众建立联系，又必须不要让敌人有借口，不要使群众因此而受到迫害，不然，群众就不敢和武工队接近了。"

少奇同志还指出，要步步深入、步步扩大地开展武工队的工作。一方面，必须采取各种办法作好调查研究工作，及时展开对敌、伪、地主及其他各阶层的工作，越具体、越细致越好。另一方面要和当地的地下工作相配合，为地下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开辟道路。最主要的是建立和扩大秘密的群众组织。同时，以直接行动去提高当地人民的胜利信心，去动摇敌伪的军心，从政治上去瓦解敌人，削弱敌人，扩大敌伪之间的矛盾，伪军内部官兵之间的矛盾，尤其要扩大敌伪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千言万语，不外是要把党的政策、毛主席思想，和你们的情况结合起来。

鲁西的同志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意见，并认为问题在原则上已得到解决。

冀鲁豫平原分局建立后，在黄敬、苏振华、杨得志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少奇同志指示和原区党委的部署和工作的基础上，不但较顺利地解决了大刀会、小刀会的问题，并扩大和巩固了我军和我解放区。

发展冀中地道战

冀中平原是大量种植棉花和小麦的好地方，日本帝国

主义为了掠夺冀中的棉花和小麦，为了巩固其在平津的统治，他们就用了很大的力量，采取各种残酷阴毒的手段，经常向我冀中和冀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消灭我党我军和抗日民主政权。但是，英勇顽强的我军和劳动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这种残酷、艰苦的斗争中，开辟、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并且锻炼和壮大了自己。

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同志知道少奇同志要经过北方局回延安，就由冀中率领两个旅越过平汉路，赶到晋东南的辽县麻田，向北方局汇报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向少奇同志汇报和请示。他们在汇报中谈到了地道战。

他们说，在冀中，敌人的"扫荡"和我们的反扫荡斗争，是极其激烈、复杂而频繁的。在"扫荡"和反扫荡的过程中，那些掩护在老乡家里的老弱伤病人员，老乡们虽然总是千方百计地来进行掩护，但有时也还免不了被敌人发觉，受到敌人的伤害。冀中的老乡家大都有地窖，在"扫荡"最残酷的时候，每当敌伪进到村子，对每个人进行反复盘问和挨家搜索时，有的老乡就把埋伏在自己家里的老弱伤病人员藏到地窖里去。但后来，被村里的坏人走漏了消息，所以敌人一来就找地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的组织就发动基干民兵研究挖地窖的经验。开始，把这户和那户基本群众家的地窖打通，窖口开在柜、橱下，后来又从烟囱里通出去，敌人进到这家，我们就转到那家去。有时敌人进入到那家搜索时，我基干民兵还从地道爬到那家的烟囱上去打敌人。

但这样的地道还是很小，后来也不免受到敌人的破坏。甚干民兵和群众根据切身的经验，在区党委和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又进一步把整个村庄的基本群众各户的地窖全部打通。这样，掩护老弱和伤病员的地窖，发展为民兵打击敌人的场所，初步形成了地道战。不过这时的地道战主要还是放在防御方面。

少奇同志很重视他们的汇报，并且再三地询问了关于地道战的情况。如群众怎样利用地道去和敌人做斗争？各阶级各阶层对这种斗争形式的态度怎么样？敌人又是用什么办法来对待地道战的？然后他肯定地指出：这是广大群众在实际斗争中的一种重要创造，可以大大加以利用和发展。这也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我党我军和广大劳动人民结成了血肉难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大家还可以研究一下，究竟能不能进一步发展？

大家看到少奇同志这样重视地道战，都感到很兴奋，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少奇同志却说：

“大家都仔细想想，找时间再一起来谈谈。”

少奇同志对抗日沟的形式是很熟悉的，并有丰富的经验；但对于地道战却没有亲身经历过。

少奇同志连日来研究和琢磨了冀中地道战的情况，同时又吩咐柳岗到冀中区党委组织部长黄凯、情报部长张存实等同志处去了解情况。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少奇同志正在屋子里阅看有关冀中工作的文件和材料，黄敬、吕正操等同志又来到柳岗

处，打算再谈一些有关地道战的情况。少奇同志对冀中的工作，除有关地道战问题外，已在北方局的会议上提出了全面建议，并得到北方局的完全同意，但黄敬和吕正操同志说，还有些问题需当面请示。于是，大家就一起来到了少奇同志的临时办公室。少奇同志细心地倾听了黄敬、吕正操同志的汇报，每当他们谈到关键性的地方，还不时发问，提出些问题。在他们谈完关于地道战的补充情况后，少奇同志又要他们提出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地道战的设想和意见。

过了几天，当少奇同志对情况已经全面掌握，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吩咐柳岗去找黄敬、吕正操等冀中负责同志，约他们一道来商谈。见面后，少奇同志便说：

“想和你们一道来研究一下发展冀中地道战的问题。地道战的斗争形式，古今中外都还没有这种经验，完全是群众伟大的创造，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我看可以坚持下去，并且可以大大发展。你们看怎么样？”说到这里，他又打趣地说：传说中的一个土行孙，就闹得官家无法办，我们人人能作土行孙，难道敌人还能有法来对付！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黄敬、吕正操同志认为地道战可以发展，并根据对冀中情况的分析，提出了如何发展的意见。

少奇同志就象往常一样，严肃而恳切地说道：

“对，你们的意见基本上都是好的，信心也是好的。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出发，把广大群众的创造性的经验，提

高到原则上，再拿到群众中去实践。这就是毛主席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少奇同志站起来踱了几步，朝着黄敬等同志亲切地说：

“我看要发展地道战，是否应该从根本的方向上来提高一步？你们现在的地道战，主要还是防御性的，如何能由防御的形式逐步转为既能防御又能进攻的形式，这是发展地道战的一个关键问题。”

吕正操同志目光炯炯插话说：

“这就把我们的地道战提到了游击战争的原则高度。”

黄敬同志也说：

“你不指出，我们都没有这样想过。但怎么转，也还不是容易的。”

少奇同志进而启发他们说：

“怎么转可以研究，我想群众既然可以用地道来防御敌人，那么他们一定也会想出办法，来更妥善地防卫自己，更多地去打击敌人，扩大战果的。现在，你们不是已经可以突然从地道里爬到烟囱上、屋顶上去袭击敌人吗？这就是进攻的性质嘛！把这种斗争形式扩大起来，我看就可以处处去打击敌人。同时，你们还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把地道活动和地上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

少奇同志吸了几口烟，接着说：

“敌人不是常说我们八路军神出鬼没吗？把地道战发展起来，就是神出鬼没的办法之一，也是迫使进入根据地的敌人，陷于草木皆兵的被动地位的一个办法。”

黄敬同志说：

“这真给我们开了窍。”

吕正操同志也说：

“这是个能行的办法。”

但是，少奇同志又进一步提醒大家，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我们现在的地道活动范围还很小，敌人还会想出很多办法来对付我们的。要把活动范围扩大，以我根据地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会有许多实际困难。斗争是很复杂的，不要只看作是个单纯的武装斗争或技术问题，而是一场很严重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有坚定的阶级路线，依靠贫雇农。地道战的民兵游击队，成分必须纯洁，成员必须是贫雇农中最有觉悟最可靠的人，武器必须掌握在他们手里。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可团结的一律团结，可中立的就中立。因为敌人来“扫荡”时，除开汉奸狗腿子外，不管他是地主、富农，也往往要遭受日伪军的奸淫掳掠和烧杀，所以也不得不连人带物藏到地道里去。这样，他们不也就和地道战发生共同的利害关系了吗？但是，游击队的武装、地道战的结构和作战计划等等，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的。同时，还必须严防村里的坏分子向敌人通风报信。对地富和可疑分子也要提高警惕，还要严肃地告诫他们，为共同的利害不许泄密，如果谁泄露地道战的秘密，就决不宽饶。重要的是要系统、全面、深入地掌握情况，掌握每个村子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的政治思想动态，尤其是坏分子和伪军家属的动态，正确地把党的

阶级政策和统战政策深入具体地贯彻到地道战中去。这一切都需要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组织工作。

黄敬同志和吕正操同志一面注意地倾听着少奇同志的指示，一面认真地作着笔记。

少奇同志问：

“能够作到吗？”

黄敬同志停住笔，有信心地回答说：

“中心区大都可以做到，边缘区还需要回去研究和进行工作，有些村子甚至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我们保证一定能按你的指示去做。”

吕正操同志说：

“关于地道战的问题，我们从来还没有提到这样的原则高度去想过，现在认识比较清楚了。在冀中当前的形势下，只有这样做，才能发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击敌人，保证胜利。”

少奇同志说：

“是么，这样做就能使民兵和一般群众从实际斗争中提高觉悟，并且不断得到考验；能使我党我军锻炼得越来越坚强，可以从根本上去打垮敌人妄想缩小、并吞我根据地的政策。”

讲到这里，黄敬同志要求少奇同志对地上斗争和地道斗争如何结合的问题，作一些具体指示，吕正操同志则请少奇同志休息一会再讲。于是大家就到院外坪子里盘桓了一会，然后又回到少奇同志的临时办公室。

少奇同志继续说：

“是呀！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还有很多问题得谈谈。”他又望了望黄敬同志，“你提的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设想的：敌人的力量看起来有点气势汹汹，但实际上是空虚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不可能同时在每个村子里、每栋房子里都住下兵，也不可能长期住下去。因此，地下的民兵如何活动，应有这样一个原则：县的游击队应以县为活动范围，区的游击队基本上不离开区，各村民兵原则上也是围绕各自的村子打游击。这样，敌军来时，如住到这个村子里，那个村的民兵游击队可以活动起来，去袭击、扰乱、引诱敌人。当敌人进攻那个村子时，这个村的民兵游击队就可以从地道里爬出来，打它的屁股，那个村子的游击队民兵就及时转入地道。使敌人疑神疑鬼，什么地方都要挨打和受惊，不敢安然住下。至于游击队如何配合正规军，我们军队过去是有一套经验的，现在你们又多了一个地下战场，可以用民兵游击队从地上和地下两个方面配合去牵制敌人，扰乱敌人，打击敌人。当敌人企图回击时，正规军就可以截击、追击和袭击，可能时，还可集中优势兵力，吃掉他一些。总之，要把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学说，结合你们的情况灵活运用起来。”

黄敬、吕正操同志都很兴奋，情不自禁地点头说：

“这样做，冀中根据地就好坚持了，反扫荡的仗就好打了。”

少奇同志接着又指出，现在的地道，只是在一个村子里

相通，横剖截断是敌人已采用过的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是还可以用其他阴险毒辣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讲到这里，他征询冀中同志们的意见说：

“你们想想，是否使村与村之间都打通一两条地道？这是一。有没有办法让地道过河，通到敌占区边缘，在野外开几个万无一失的口子？这是二。我们知道，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天也能翻个面。但这种工程的巨大，可能要大过万里长城。”

黄敬同志望着吕正操同志说：

“个别近邻的村子已有地道相通，我敢肯定能做到。”

吕正操同志微侧着头想了想，接着说：

“地道过河，老乡有这个经验，他们把水缸底打破，一个个地接起来作水道。我看，从河身底挖条地道，把这种东西安进去，岂不成了河下地道？”

“好，你们都可以去试试，万一办不通，再想其他办法。”少奇同志随又问道：“你们这里的小庙多不多？是否可以在小庙的神座里挖个口，从村里通到村外，既不怕倒流，又可以隐蔽。”

黄敬同志蛮有把握地表示：都可以做到，通到敌人据点附近的地道也能做到。因为冀中群众对地道战已有了越来越多的经验和信心，特别是又有了少奇同志今天给予的这套法宝。

少奇同志无论考虑和处理什么问题，总是那么缜密、周到、细致。对这个问题也是这样，至此，他又再三嘱咐冀中

的同志们，挖地道的时候，要注意土的处理，决不能让敌人和坏分子看出地道的痕迹来，使他们得以追踪来进行破坏。其他问题，也都要考虑周到，都不要疏忽大意。冀中的同志们当即表示说：“胡服同志的指示对我们很重要，没有这道紧箍咒，我们还可能犯粗枝大叶的毛病。”

这时，警卫员同志请大家去用饭。在吃饭的时候，大家说说笑笑，显得心情分外舒畅，少奇同志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大家微笑着说：假使能够把今天大家所谈的样样都做到，冀中的抗战工作就会好搞得多了，主动得多，有把握得多了！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就能有更多的保证，敌人却会因此增加更多困难。这是一场极艰苦、极巨大、极复杂的群众斗争，也是人类战争史上一种空前未有过的伟大创造，人民将会把它载入光荣的史册中去的。

饭后，吕正操同志说：

“我们的问题现在都完满解决了，打算明后天就回冀中。胡服同志还有什么指示吗？”

少奇同志又再三地嘱咐和勉励他们，并亲自送他们走到村外。

太岳反扫荡

我们随少奇同志在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万山绵亘，峻岭环峙的麻田住了一个多月，就又向太岳区西进了。

这一带是有名的太行山区，我们一路翻山越岭，记不清

走了多少山路。离开麻田的第二天上午，我们从太行山主峰下面的一条比较小的山坳穿过。其实，这座山也不算小了，上下四十里路，山势很陡，道路难行。刚上山的时候，我们还骑着马，走了不一会儿，马就累得浑身大汗，气喘咻咻地，一步一颠。我们于是跳下马来，牵着马爬山。北方的十月，气候已经凉了，大家却都累得汗淋淋的。不知是谁在一旁嘀咕起来："奇怪，这山总走不完！"

少奇同志走在前面，回头望了望我们，大概看到我们那副狼狈的神气，不由得笑了。他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指着前方说：

"翻过这座山，从南面下去，就是长治、长子，历史上有名的潞安府盆地，我们的粮仓之一！"

这时，柳岗也想起了历史上的故事，就接着说：

"潞安府，过去是用兵必争之地，五代时李克用和朱温就曾经长期争夺过这块地方……"

少奇同志又告诉我们：太行山区，历来人民生活较苦，但斗争性很强，有着英勇的斗争传统。岳飞抵抗金兀术，他的兵主要就是在这一带组织起来的。

就这样，我们一面走，一面谈，道路同样难行，走起来却不知不觉的轻快了。年轻的警卫员们更是活跃，都想快一点登上山头去眺望眺望。

我们翻过了太行山，突过了白晋公路敌人封锁线，在一个拂晓进入了太岳区。又翻了几座山，进入一条几十里路长的山沟。当我们走出这条山沟，到达一个集镇时，天色已

经很晚了。据护送我们的同志和镇上的老乡们说：这里距离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只有十几里路了。大家都很疲乏，想在这里休息一下再走，于是便去请示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沉思了一下，凝神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又侧过头望了望大家，决断地说：

"在敌后情况变化多。天气已经这样晚，我们再赶十几里路，就到达司令部了。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司令部很可能要转移，那就麻烦了。我们还是赶到司令部以后再休息。"

经少奇同志这么一说，大家又都振奋起来，继续前进。其实就在这一天，阴险狡诈的日寇开始对太岳区进行"扫荡"。将近七万个日本鬼子，分五路从东面和北面，向我太岳区北部（司令部驻地）分进合击。敌人兵力的分布是，主力在北路，而东路的敌人恰好和我们同路，只相距十几里路，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由于我们走在那条大山沟里，天色又晚，敌人才没有发现我们；而我们也不知道后面跟着敌人。在我们离开那个准备休息的集镇不久，敌人就到达了那里。他们因为要等待北路的主力部队，在那个集镇宿营了。如果不是少奇同志英明的决定，我们势必以众寡悬殊之势陷入敌人虎口。

当天夜里，我们到达了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军区司令部驻在一排窑洞里。司令员陈赓同志是一个游击战争的能手，是一个精悍、乐观、豪放不羁的人。他简要地向少奇同志报告了敌情和我军反扫荡的战斗部署。最后，他爽朗地笑着，大声说：

“一切都准备好了！”

少奇同志仔细倾听他的汇报，注视着他，不时地露出信任的微笑。

我们休息了片刻，午夜，又随同太岳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出发了。刚刚走到河沟旁边，便碰上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借着星光月色，辨别出是我们的部队在掩护群众转移。在群众的队伍里，有带着武器的青壮年民兵，有银色鬓须的老大爷和老大娘，也有背着孩子的妇女，还有人赶着牛、牵着毛驴……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然而他们却是这样满怀着对敌人的憎恨，满怀着对抗日的胜利信心，这样的有秩序，这样的镇静，除了母亲怀抱里的婴儿偶然啼哭几声以外，没有丝毫喧闹的声音。少奇同志叮咛我们不要惊动老乡，一直等群众的队伍过去了，我们才又继续前进。

第二天，我们甩掉了日本鬼子，向另一个村镇转进。陈赓同志笑着对少奇同志说：

“敌人‘扫荡’越来越频繁，上次‘扫荡’刚过去，又发动了这次‘扫荡’。看来，日本鬼子是急于想‘胜利’呀！”

少奇同志听了微微一笑，说：

“这不是表现他的强大，恰恰是表现他的脆弱；这是垂死前的挣扎！”

这时，少奇同志的目光忽然落在墙上的大字标语上：“一年战胜希特勒，二年战胜日本！”他注视了一会儿，又侧过头来，看着我们大家说：

“从总的形势看，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有根据的。敌人失败是肯定了的，我们的胜利也是肯定了的，但是，估计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一定要来分割我们的根据地；顽军阎锡山也会来分割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现在就应该有个思想准备，要多吃一些苦，多准备一些条件，如果将来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不致张惶失措了。你们说是不是？”

说到这里，少奇同志笑了笑，意味深长地接下去说：

“不过，我们现在还得做另一种思想准备：我们现在是在农村里转，将来一定要占领一些城市的。我们的军队和干部是要进城的。这是个什么样的形势，首先在我们干部思想上会发生些什么问题和情况？”

这时，走在少奇同志旁边的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同志立刻要求少奇同志：

“请少奇同志给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吧，你要不谈到，我们的确想不到这么远。”

少奇同志仍然微笑着，考虑了一会儿，他才开始慢慢地说下去：

“你们都是负责干部，应该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问题。我想中央和毛主席一定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得到指示，只是个人估计到的，你们要我讲嘛，我作为和大家交换意见来讲。

“估计形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肯定了的。希特勒的失败肯定了，日本帝国主义要跟着失败，也是肯定了的。但是，在打败希特勒以后，不等于说日本帝国主义也失败了，

英美也还没有战胜日本，而且他们也不愿意作出重大的牺牲去战胜日本，因此，仍将可能请求红军出兵，苏联也可能出兵。如果这样，对中国对远东是有好处的。对待这个问题，不能有丝毫怀疑，当然，哪年哪月哪日胜利，我们倒不必去作那样的估计。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失败后，我们哪样胜利法，是不是马上就是人民的胜利，那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蒋介石愿意和我们一起搞民主共和国，那是一种胜利形势，不过，根据蒋介石的性格和大地主资产阶级的特点，这个可能不能说没有，但我看是不大的。最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在美帝的扶助指使下，要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如果是这样，人民的胜利就将要走着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但胜利也是迟早要到来的。蒋介石发动内战，必然将利用它的一切条件，沿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来分割我们，然后来消灭我们。但，这只能是他的打算，能不能实现这个打算，当然又是另一个问题。在我们，如果搞得好，可能占领几大块根据地，占领若干中小城市和个别大城市；即使搞得不好，也一定会占领一些中小城市，重新组织力量，也就是说，经过国内力量的重新组合，最后战胜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达到人民胜利的目的，进入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城市。

“因此，我们总是会进城的，应该有进城的准备，特别是干部们要有这种思想准备。进城以后，将是不同于今天斗争形势的另一种斗争形势。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将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软化我们，腐蚀我们，从我们的内部来削弱

我们的战斗力，瓦解我们的思想武装。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是老于世故的，办法很多的，而且是卑鄙的。他常常玩弄一些花样，可以使我们有些干部只简单地去看问题，搅不清头脑的。

“我们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相当成分的国家，党员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比重也不少，特别还有一些党员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家庭。不仅有若干新党员，就是老党员中，一些在思想立场上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的人，一进到城市里面，特别是大城市里面，那些红红绿绿、花花朵朵的世界，脑袋就不免要发昏，脚跟子就不免要摇摇摆摆，何况资产阶级将要摆下各种各样的迷魂阵和我们斗争。这样，就可能有不少人要摔跤子，甚至于会摔下去爬不起来。我们有些同志，他们吃得起苦的，吃不起甜的；碰得起硬的，但碰不起软的。进城以后，资产阶级和我们的斗争，不只用一些甜的软的方式和我们斗争，甚至这种方式会很多，会到处碰到。

“因此，在没有进城以前，我们就应该有进城的也就是胜利的思想准备，要把这些道理向主要干部、向全党干部讲清楚，使他们有个思想准备。这样，就可以阻止地主、资产阶级对我们的阴谋侵袭，保持党的战斗性，可以防止许多人摔跤子，即使有些人碰了钉子，以至于摔了跤子，也容易觉醒过来；防止或减少我们可能遭受到损失。当然，这不能说，我们有了党，在进城以前有了思想准备，就可以完全不受损失，任何人也不摔跤子。我看，那也是不可能的，有些人还是会摔跤子的，甚至于有些人会摔下去爬不起来

的。……

"这是我随便想到的，没有很好地准备，只作为同志们的参考。我这样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估计党中央和毛主席到一定时机会给全党正确的指示。"

少奇同志讲完之后，薄一波、陈赓、安子文等同志即请求少奇同志就这个问题给区党委和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作个报告。我们到了宿营地后的第二天上午，少奇同志根据毛主席的著作和党中央的文件，对形势的发展作了透彻的分析和估计，显示了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性。

*　　　*　　　*

这时，日寇正集中优势兵力，用所谓梳篦战术，翻来覆去，到处寻找我军主力部队和首脑机关，进行决战，企图消灭我军主力。

一天，我们随陈赓同志转移到安泽县的一个村子。村子虽小，却是个交通要道，村南是一条公路，西北有条大车道。村子正坐落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内。我们到达这个村子后，准备午餐后继续前进。

正在吃饭的时候，侦察人员跑来报告：敌人突然到达了邻村，正向我们休息的这个村子的方向逼近。大家听了都很紧张。

"不要紧，这村子处于两条大路的交叉点，是个交通要道，敌人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休息，一定不会注意。大家继续吃饭好了，就是敌人到了村边，也不要动，不要暴露目标。"陈赓同志很镇静地对大家说。然后，他用征询的眼光

望着少奇同志，等待着少奇同志的指示。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少奇同志总是很沉着的，他点头表示同意陈赓同志的意见，并且说：

"很好，就这样办。这么多的人，一跑出去非出乱子不可。"

少奇同志的话，安定了大家的情绪，又继续吃饭。村子内外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讲话。

鬼子距离我们所在的村子只有半里路了。少奇同志和陈赓同志依然不动声色。同志们的心情都很紧张。

过了好一会儿，侦察员才回来报告说：

"敌人从村外经过，现在已经越过我村有几里路了。"

陈赓同志还请少奇同志考虑是否可以分开行动？少奇同志也表示同意。

陈赓同志把情况和自己的意见，报告了少奇同志，请求指示。少奇同志沉思了一会儿，对陈赓同志说：

"对，敌人到东面寻不到我们的踪迹，完全有可能再回来搜索。我们应该立即转移。

陈赓同志立即决定派军区参谋长毕占云同志负责保卫少奇同志向山区转移，他自己率领一部分部队向相反的方向转进。据后来得到的情报知道：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子不久，敌人就返回来搜索，什么也没有捞着，就又沿着原来的方向走去了。

当天下午，我们转移到一个小山村，住在半山腰一户农民家里。安置好行李背包，少奇同志信步走出来，站在门外

的小坪里，向外眺望。这时，一个中年农民挑着一担水，从山脚下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蹒跚地爬上来。他走得那样艰难，两条腿向里弯曲着，几乎每跨上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少奇同志的目光一直关切地注视着他。过了好一会儿，老乡终于爬上了山坡，向院子里走来。原来这位老乡正是我们宿营的房主人。

少奇同志于是走过去，慈祥地问道：

"老乡，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你的腿有病吗？"

老乡抬起头，把双手伸出来给少奇同志看；十个手指的关节都肿得象小萝卜一样。他痛苦地告诉少奇同志说：

"这种病，叫柳拐子病，骨节慢慢地都会这样肿起来的。干活也不方便啦！"

少奇同志关心地问他：

"这里害这种病的人多不多？它对寿命有没有影响？这种病怎么得的？"

老乡回答说：

"这地方害这种病的人可多哩！说不上是怎么得的，反正祖祖辈辈都有人害这病。得了这种病干活很困难，也没法治。"

少奇同志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

"一定能找出害病的根源，想出治病的办法。"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我们到下面去看看。"

少奇同志到了山脚下，循着老乡汲水的小溪，背着手，沿着溪水缓缓地踱着，仔细观察。他时而站住，注视着浅浅

的溪水；时而又漫步前行。忽然一阵山风吹来，满坡的榆树、枣树叶子，簌簌地飘下来，纷纷落到水面上。有些叶子随着溪水打着漩涡流走了，有些叶子却腐集在水浅的地方；其中，有的叶子已变成黑褐色，散发着霉烂的气味。少奇同志停住了脚步，目光集中在那堆烂叶子上。一会儿，他继续循着溪水向上游走去。几条细细的泉水从岩隙中流出来，经过褐色的岩石，又经过红色的沙砾。少奇同志在那里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最后，他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老百姓得这种病是很痛苦的。是不是喝的水不干净，水里有什么毒质或矿质？还是缺少了什么营养？"

少奇同志回到宿营地，就对毕占云同志交代说：

"这里有一种柳拐子病，是群众世世代代的痛苦，我们共产党人不帮他们解决，谁能帮助他们解决？在现在的条件下，纵然不能根本解决，也应该使它减轻，至少要阻止它发展。"

少奇同志稍停了一下，接着又用询问和启发的口气说：

"这种病的根源在哪里？是不是缺碘？如果缺碘的话，附近又找不到海带，是不是可以用碘剂来解决问题？如果是水里含有某种矿物质或是其他毒质的话，是不是可以从饮水方面解决一下。总之，这个问题一定要好好研究，叫部队里的卫生人员认真帮助老乡解决一下。"

毕占云同志把少奇同志的意见一一记在心里。

第二天，由于敌情紧急，我们又跟随少奇同志整装出发了。一路上，少奇同志向我们说：

“在中国农村，类似柳拐子病的灾害是不少的。共产党人应该看到自己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也只有共产党能给劳动人民解除世世代代的灾难和痛苦……”

经过一天翻山越岭的急行军，黄昏，我们到了宿营地，真是高兴。然而，走近村落时，却冷冷清清没有一点声息，村子里空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原来，老乡们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都隐蔽到山里去了；牛羊、骡马、粮食、衣服，甚至锅碗瓢盆等用具，凡是能够带走的，都带走了，实在带不走的东西，就埋在地下了。我们走进老乡家里时，都是四壁空空，土炕上光秃秃地连片席子都没有。翻了一天山路，大家都疲倦了，肚子也饿了。怎么也找不到一个老乡，弄不到一点粮食。

一个同志在山后茅厕附近的地面上，发现有些浮土，跺一跺脚，声音有点不同。根据过去的经验，这种地方往往下面是埋过东西的。于是试探着挖下去，果然刨出来几个大南瓜，另外还找到一点点小米。

在这种情况下，能搞到这么点吃的东西，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可惜数量太少，怎样更好地利用它呢？我们几个人悄悄地商量，准备把南瓜熬成稀糊糊，分给大家吃；把小米煮点稀饭给少奇同志吃。不料被少奇同志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立即说：

“不要单独给我煮稀饭。把南瓜、小米合煮一锅粥，大家吃。”

他又看着几个南瓜和少许小米，对毕占云同志说：

“看样子，这个村子都是贫苦的农民，生活很苦，他们可能还要指靠这些东西过冬的。我们一定要记下这笔账，在这次反扫荡过去后，向老乡做个交代，照数偿还他们。”

南瓜和小米合在一起，煮了一锅热腾腾香喷喷的稀糊糊。我们盛了一搪瓷缸子，找来细高粱秆，撅成一双筷子，送给少奇同志。但是，他不肯先吃，只是对我们说：

“先尽战士们吃。他们很辛苦，还要准备继续战斗呢！我们顿把不吃，没大关系。”

离开这个村子时，少奇同志又叮嘱我们：

“要仔细检查一下，不要留下我们在这里住过的痕迹。要不然，敌人来了，发现我们在这里停留过，可能要把房子烧掉的，使老百姓遭受损失。”

大搞地雷战

敌人这一次来势很凶，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很残酷。但太岳区的广大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配合子弟兵对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反扫荡中，表现了无比的机智，创造出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其中一项较突出的创造，是地雷战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反扫荡战的转移途中，陈赓同志便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基干民兵游击队用地雷炸敌人的经过，还谈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生动事迹。少奇同志一面行军，一面听陈赓同志谈话，听得分外认真，还不时提出询问。少奇同志说：

“这样说来，地雷战也可说是群众创造的一种较突出的

斗争形式，很值得我们重视。”停了一会，他又问道：“你们总结过经验没有？山西其他根据地也有搞地雷的吧？”

薄一波同志回答说：

“由于经验不够多，还没有正式总结过。等我们今后再多搞一些活动，然后把经验好好总结一下。”

“对，但你们首先还应该研究一下，到底有没有发展的条件和推广的可能。”少奇同志说，“在这次反扫荡中，就可以根据条件再作些部署，去取得经验。”

我们来到一座群山环绕的村庄里。刚宿营不久，就有个分区的负责同志来向司令部汇报反扫荡战进行的情况。陈赓同志要他来向少奇同志汇报。分区的同志对敌人的动态和分区的部署，两天来“扫荡”和反扫荡进展的情况，谈得很具体、生动。少奇同志询问了各种重要情况，还着重询问了有关地雷战的情况。

太岳区大山横贯，丘陵绵延，河流、水道很多，道路和河流都是弯弯曲曲的，很便于游击队的活动。那种河流，也可以说是溪沟，发水的时候，水很深，河面也较宽；而到了秋冬，就只有不多一点水，甚至是只结上一些冰块的干河。因为水浅，水面也不怎样宽，行人通过，一般都不架桥，只是在水里铺些石头，作为过河的道路；水从石头之间的空隙流过，人就踩着石头走过去。敌人来“扫荡”时，基干民兵游击队常常把地雷埋在这种过道的石头底下，侦知敌人要经过时，游击队就埋伏在河两侧隐蔽的地方。他们还常常派人留在村子里，故意让敌人抓住，给敌人带路。有一次，敌人

真抓住了一个这样的游击队员，连逼带骂地要他带路。这个游击队员带着敌人走到离村二、三里的河道边，就故意停住不肯前行。敌人凶恶地责骂他，他说：“太君的，八路的夜里的大大的多！”并用手作出八字形，“这里的地雷的，多多的有。过的，死了死了的，我的不敢。”敌人因看到这里没有“小心地雷”的牌子，似信不信，又有点害怕，就强迫我们这个游击队员先走。游击队员知道地雷埋在哪些石块下，是有把握不踩着地雷的。他一面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一面就小心地踮着脚跳过去了。敌人看到没有地雷，大队人马就放心大胆地跟着过河，还没走到河正中，就一连几声轰隆，炸死了好几个。敌人中了地雷，就不敢再往前走，叽哩呱啦地只顾往后退。我埋伏在河侧两边的游击队就一齐打枪，弄得敌人人马混做一团，进退不得，狼狈不堪。原来没有碰上地雷的，又碰上了地雷，连人带马炸死好多。这样，有时一次要打死炸死好几十个敌人。

少奇同志听罢说：

“这都是很鼓舞人心的场面，只有我们的广大劳动人民和人民的游击队，才能发挥这样的机智和创造，才能有这样的勇敢！”他看了看分区的那个同志，接着说：“你们要充分珍重群众的这种创造和战果，要及时总结经验。在这次反扫荡战争中，还能推广一些嘛！”

那位同志做了肯定的答复，然后匆匆地奔回分区去了。后来，我们在行军中，还经历了一处类似这样的地方，地雷战的痕迹还很新，少奇同志亲自仔细地进行了察看。

陈赓同志见少奇同志很重视地雷战，就对地雷战的情况作了一次系统的收集和整理，然后向少奇同志做了比较详细的汇报。陈赓同志在汇报中谈到了下面一些情况：

最初，我们是把炸药埋在敌人路过的地方，安上导火线，必须有人拉线，才能爆炸。后来，在军区的布置和帮助下，基干民兵与群众又想出办法，把炸药装在铁筒子、罐子、瓶子等各种器具里，做成各种各样的地雷，安上导火管，把它埋在地下，只要碰上导火管就可以爆炸。有些民兵游击队就运用它来打击敌人，每次反扫荡中，总有一些敌人被炸死，并迫使敌人不敢象以往那样放肆，特别是夜间，更不敢大胆行动。后来，有些民兵游击队就故意埋了一些假地雷，并在路口写上牌子："小心地雷！"用来摆布敌人。

少奇同志问道：

"这也是打击敌人的一个好办法。你们这里，现在是不是每个村子的基干民兵、每个游击小组都能这样做了呢？"

经常充满乐观和信心、对太岳区情况了如指掌的陈赓同志，不假思索地说：

"不普遍！已经照这样做的地区，约计不到一半。因为制造地雷条件有限制，不能大量地、普遍地制造。假地雷也不好埋得太多，多了，敌人会认为是恐吓他的假玩意，因此又会放肆起来。同时，群众也还没有完全掌握埋地雷的技术，所以还不能在全区每个村庄都这样做。"

少奇同志又要陈赓同志找几个主管地雷制造的后勤同志和熟悉地雷战的民工同志来谈谈。陈赓同志便令几个有

关参谋来见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从制造地雷的材料问题，成品的性能问题，一直谈到基干民兵是否能掌握制造地雷、埋地雷的技术和地雷战的活动情况，群众对地雷战的反映等等问题。经过少奇同志的启发和指示后，他们认为可以创造条件，多多制造和全面推广。至此，少奇同志又向他们提出：

"你们能否保证地雷只炸敌人，不炸老百姓，你们有什么可靠办法没有？"

"能！村里的基本群众都是帮助基干民兵和游击队搞地雷战的，地雷埋在什么地方，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家里人也不会错碰地雷的。"

"那么，基本群众以外的人呢？"少奇同志问，"如果他们误碰上地雷，那也不好。是不是可以这样：反扫荡时，告知全村的人，都不要走人行道，那不就万无一失了吗？而敌人的大炮和人马，是非走人行道不行的。"

正讲到这里，陈赓同志和区党委的另一位同志走进来了。少奇同志说：

"来得正好，一同来谈谈。"

少奇同志把话头转向党的领导工作上来，说：地雷战也是群众性的武装斗争的一种新形式。这里面既有阶级政策，也有统一战线政策。要推广和搞好地雷战，除去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外，各个村的党支部既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人，防止地主和坏分子了解和泄露地雷战的秘密，及时给那些向敌人通风报信的坏蛋以应有的打

击。更重要的，要做好群众工作，做得越深透越好，要使基本群众都积极赞成和参加地雷战，或直接和敌人打游击，或分头监视坏分子，注视地主的动态，等等。地雷战也和我们其他地方的斗争一样，都是为了削弱敌人和壮大自己，也就是说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千万不能让人民受到地雷的损害。

区党委的同志说：

“把地雷战提到政策原则上，我们过去还没有这样考虑过。根据胡服同志的这一指示，我们的许多工作还要重新把它搞深搞透，不少工作须得重新布置，但我们保证能做好。”

在另外一个日子里，少奇同志还听到了另外一个同志的汇报，他也讲到了游击队员给敌人带路的故事：也是在一处靠近河道的村庄，一个事先布置的游击队员给敌人带路过河。那里写着“小心地雷！”的小木牌，实际上是没有地雷的。敌人也知道我们有些地方有地雷，有些地方不一定有，但他捉摸不定。走到河道边，这位游击队员说：“不能走。太君的，这里的地雷的有的。”敌人还是逼他先走。我们的游击队员为要表示石头底下确有地雷，所以故意不从石头上过。他想，今天即使没有地雷炸死这些狗东西，也不能便宜了小鬼子。于是，他就脱下鞋袜，从冰冷的水里趟过去了。敌人没有办法，也都乖乖地脱下鞋袜，跟着游击队员从水里趟了过去。这时正是寒冬十一月，敌人被冰冷的水冻得哇哇叫，有的还尽埋怨。

少奇同志听那位同志讲完，说道：

“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他们的英勇果敢精神，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的。”

这期间，我们随少奇同志已和薄一波、陈赓、安子文等同志分开行动，因此，当时又把毕占云同志找来了。

少奇同志对那位同志和毕占云同志说：

“根据各方面汇报的情况，证明地雷战很值得坚持和推广，是一种好的斗争形式。你们读过《孙子兵法》吗？”

毕占云同志回答说：

“没读过，在红军大学听到讲过。”

少奇同志于是讲解说：

“依据《孙子兵法》的道理，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虚虚实实，使敌人疑神疑鬼，可以麻痹他们的行动，这就叫做‘疑敌’。敌人疑神疑鬼，夜晚不敢活动，至少不敢放肆活动，使敌人的行动有所限制，这就叫做‘制敌’；敌人是外国人，进到我们根据地，人地生疏，不得不找老乡带路，这样我们就可以到处安排带路的，引着敌人去碰地雷，吃苦头，或者调动敌人的队伍绕路走，也就是按照我们的圈套行动，这也叫‘制敌’。更重要的是，搞些炸药和瓶瓶罐罐，制造些地雷，就可以杀伤敌人，打击敌人的斗志。地雷造得越多，推行得越广越精，就能给敌人以更多更大的杀伤和打击，这就是‘弱敌’。”

少奇同志接着说：此外还得加一条，如果这类斗争坚持和发展下去，掌握得对头，不使群众遭受损伤和打击，那么，

还能使民兵、游击队和广大群众不断提高觉悟，受到锻炼。所以还可以壮大自己。

少奇同志站起来走近几步，亲切地看了看那位同志和老毕，慎重地问他们：

“你们看，普遍使用和推广这种斗争方式，能不能达到这样几个目的？”

老毕说：

“你这就是要我们把毛主席的办法，用到地雷战上来。这有什么说的，我们革命势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呗！”

少奇同志说：

“那么，你也认为这样，我们的民兵、游击队和抗日群众，在各方面都可以不断地得到更多更大更快的锻炼和提高，那就很好。我看关于地雷战的问题，很可以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大大地加以推广和发展。将来还可以提供给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去考虑。”至此，他又望着毕占云同志说：“这些我都零零碎碎的和陈赓同志及区党委其他同志谈过。你回去时，可把我的意见再转告他们一下，请他们当做一个问题，认真地加以考虑和讨论。”

老毕是个急性子，说要趁热打铁，当夜就和陈赓同志通了电话，扼要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陈赓同志复电说：少奇同志这次经过太岳，一到就是反扫荡。在反扫荡中，少奇同志毫不怠倦地考虑了我区敌友我斗争的形势和各种重大问题。他所有的指示，对太岳区今后的工作都要发生很大的作用。在地雷战的问题上，他又给了我们以力量、勇气和明确的政治方向……。

普遍推广地雷战的工作，很快就布置下去了。我们在离开太岳区以前的反扫荡战行进中，到处可以看到“当心地雷！”、“此地地雷！”、“危险！”、“小心！”等等小木牌。当我们走到近敌占区的平川地时，还不断听到关于地雷战的英勇机智的斗争故事。

平遥游击队

过同蒲路前，大家都有这样一种精神准备，如何护卫少奇同志安全到达晋西北。汾河平川是山西的重要产粮区之一，同蒲路是由东北直贯西南的山西交通动脉，敌人封锁、控制很严，沿路两侧都筑有封锁沟和封锁墙。与同蒲路平行的汾河，是敌人设置的又一道封锁线。此外，晋东南和晋西北还有两条主干公路和几条交叉的公路，也都是敌人为对付我军和封锁我区的。如与汾河平行的太汾公路，就经常有敌军摩托队往来巡逻。沿我晋西北根据地，敌人还筑有一条较深较宽的封锁沟，沿我晋东南的太岳区也有这样一条封锁沟。但他怎样也封锁不了与群众血肉相连的我党我军。然而象少奇同志这样一位负责人要过同蒲路，对当地的党组织来说，究竟是一项颇为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太岳区党委、军区和晋西北分局往来电商的结果，决定把护卫少奇同志越过二百里左右的汾河平原敌占区的任务，交给土生土长而又较可靠、较坚强的平遥游击队。

平遥游击队是当地最有觉悟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起

来的，是一种武工队形式的组织，不仅受平遥县委直接领导，而且县委的骨干就是游击队的骨干。所以他一面是我们的县委，一面又是武装组织；夜晚是游击队，白天又都是老百姓；是地上的武装组织，又是地下的秘密组织。这是平遥党和群众的一个创举。

过同蒲路的中午时分，我们就前进到了平遥平川地东面山区的一个山村。毕占云同志带了一个护送团和平遥县委书记带领的平遥游击队的一部分同志，早就在这个山村和其邻近地区做了周密的布置。我们和毕占云同志随同少奇同志到达山村时，县委书记即游击队的政委，早已在窑洞里等候，饭也准备好了。我们到那里就吃午饭。饭后，平遥游击队的政委向少奇同志报告行动计划，他说：

“首长，今晚过同蒲路和汾河要走一百六、七十里，明日得在敌占区隐蔽一天，明晚才能走出敌区，到达晋西北根据地。现在就请首长休息吧，下午五点多吃过饭，我们就下山。到达山脚下，就是黑夜了。”

少奇同志对太岳区的布置和游击队的活动都是充分信任的。但他随时随地又都不放松任何一个了解情况的机会。为要了解平遥地下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他又开始了和游击队政委的谈话：

“你就是县委书记吗？你说说你们的游击队是怎么搞起来的，又是怎样进行活动的，好不好？”

“我是县委书记。今天护送首长的十五个同志都是党员，其中有我们县委的组织部长、保卫部长，我们最精干的

交通员也在这里。我们都是平遥土生土长的人，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因敌占区较大，我们没有武装，在地下活动很困难，所以我们在必要时，夜晚拿起枪，集中起来，按计划出动，进行武装活动。有时还钻到敌伪据点里去活动，袭击敌人据点。在村子里，夜晚为进行工作，就把村子封锁起来。首先把反动地主、汉奸等坏分子监视起来，然后向基本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那么，你们白天怎么活动？”少奇同志问。

“我们夜晚活动完了后，把武装藏起来，就是老百姓，敌人没法找我们。”

“你们夜里是游击队，放下武器就是老百姓。这办法好。但你们夜晚工作时，把汉奸、地主、坏分子都监视起来，不怕他们认出你们去报告敌人吗？”

“没事，认识的不同他们见面，所以敌伪知道有游击队，却始终不知道是哪些人，也不知道我们落脚的地方。”讲到这里，他望了望少奇同志慈祥而高兴的面容，又谦逊又有信心地继续说：“我们的工作才开始，还没有很好展开，还要努一把大力呢！以前过路的首长，也都很关心我们的工作，还给我们提过好些意见，对我们帮助很大。”县委书记并不知道眼前的首长是谁，只知道是前方来的一个老同志。他接着说：“咱这里，不是经常有些负责同志经过吗？经常有打延安出来到前方去的，也有从前方回延安的，都是我们招呼过路的，托党的福，总算没出过岔子。”

少奇同志又关切地问：

"敌人重重封锁得这样严密，你们又怎样能保证不出岔子？这主要靠什么？"

"我们靠党，靠毛主席，靠群众。为了过路同志们的安全，我们布置了两条路线。经过的地方都没有鬼子和伪军的据点，而我们却在那里建立了几个地下据点。咱们同志和队员都是本地穷苦家出身的人，本地人比较好办事。虽然没有敌伪据点，但敌伪人员经常来要粮呀，催税呀，查户口呀……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设法把过路的同志隐蔽起来。其中有两个地下据点——大良庄和小良庄，是比较好的，首长明日就到那里隐蔽。"

"在这些据点里，都有群众组织吧？平遥县的每个村庄是否都有咱们自己的人？"少奇同志问。

"有的区有党支部，有的就没有。有秘密农救会的地方要多些。另外也有些地方联系了一些耳目。"县委书记简要地回答道。

这个县委书记虽然识字不多，但从他的谈话里，可以看出他是很精干的；从他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里，和那坚定的神态中，还可以看出他是坚强的。他很善于摆布敌人。

这时，外面的阳光已从西面射进了窑洞的窗子，户外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得沙啦沙啦响。少奇同志望了望户外，又望了望我们大家，然后面向着毕占云同志和县委书记说：

"我看这又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斗争形式，很可以研究，你们已经开了一个头，作得很不错。"接着，他又以征询的口吻说："是否可以多搞些名堂？白天都是老百姓，这很

好。夜晚都是游击队，是否有时还可化装成武工队，让一些人穿上八路军的军衣，去敌占区进行活动。太岳区也可乘空子派些武工队到平川活动，和他们配合。"

讲到这里，少奇同志转向毕占云同志说：

"你看如何？这些情况，一波、陈赓同志他们全都知道吧？"

"我回去再汇报一下。"老毕谨慎地回答。

少奇同志又转向县委书记，继续说：

"我看，你们还有许多工作可作。如果每个区、村都能有自己的地下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都能有自己的人，游击队就算扎下了深根，敌人就怎样也无法把我们消灭。如果能做到这样，你们想一想，敌占区表面是敌人的，而实际岂不是成了我们的！"

毕占云同志连连点头。县委书记也露出了难以形容的喜悦神情。

那天，因为晚上还要行军，就没有谈下去。

大家在老乡的炕上休息了一会，很快就到了吃饭时间。

下午五点多钟，我们按时出发了。从山顶一层层地盘旋而下，越往下走，回头看，山越高，山坡上的弯弯和岔口里，有很多村庄，金红色的夕阳照着一层层丛林掩映的房屋，看去有似一幅奇幻美丽的图景。俯瞰汾河流域的平川，一望无际，田亩相连，村舍相接，真是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它惨遭敌骑蹂躏和阎顽的剥削，使美好的河山失去了它应有的光辉。想到这些，令人无限愤慨。

沿途布置得很好。夜深人静，离同蒲路还有三里地，就有人在那里等候带路。我们很顺利地从一个村庄通过，进口和出口都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或老大娘在打扫街道。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村庄原先是富饶的，现在却已破落不堪。过了同蒲路，大约不过五里地，就到了汾河边，游击队的同志轻轻地拍几下掌，那边的老渡公立刻就划出了船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送过了河。到了对岸，有人把我们引到一个小草棚里歇息。小草棚里没有一个人，但是柴火烧得很暖和，还预备有开水和茶碗。不一会，忽然有十几辆自行车出现在我们眼前，很快又把我们带上走了。他们的动作真敏捷，布置得真周密。我们到达小良庄时，正是四更天，而庄内有些住户的窗棂还映现着灯光。有个人从村子里走出来问："不歇店嘛？"游击队的同志们答说："明日要出早工，不歇了。"

又走了一程，我们就安全地到达了大良庄，这时天还未亮。游击队把少奇同志安置在一个比较大的院子里休息，那是个不大为人注目的地方。我们隐蔽在一个木匠的屋里，少奇同志的其他随员也都分散隐蔽在老乡家里休息。从我们进村以后，一个游击队员也看不见了，照顾我们的都是老百姓。

天明以后，约八点多钟，我们都起床了。柳岗正想到少奇同志住处去看看，忽然传来了一股谣风，说是鬼子带着伪军已经到了邻村，大概是来催粮。当时尤其使柳岗担心的是少奇同志的安全，提步就往少奇同志的住处走去。木匠

的妈妈却阻止柳岗说："不用担心，那边已安置好了，大家堆到一块去可危险哩！鬼子和狗腿常来糟践人，糟践东西！不用怕，我有办法对付他。你们快往庄稼地里去，碰上敌人，就说是我家的亲戚。"她一边说着，一边就吩咐她的老伴带着我们来到土围子外面。

过了一会，老妈妈嘻嘻笑着走来说："快回去吃点东西吧！鬼子狗腿往别处去了。"

我们担心少奇同志的安全，心里总是忐忐忑忑的，这时便急急忙忙地来到少奇同志住处。那知游击队的政委早已经在那里了。他见了我们说：

"正好，咱们也刚从外面回来。首长正要合计咱游击队的工作哩！"说罢，他转向少奇同志，"首长对咱游击队的工作多指示点吧！"

少奇同志微笑着说：

"没有什么指示的。昨天的话没谈完，继续再谈谈吧。"

"咱这里离毛主席太远。首长昨天的指示，过去都没听到过。"县委书记说。

少奇同志站起来，递给县委书记一支烟，然后又想了想说：

"好，再谈谈你们的游击队吧！根据你们的条件和经验，在每个区、每个村都建立起咱们的地下组织，也就是地下据点，我看是完全可能的。"停了停，又问："你们这样打算过没有。"

县委书记回答说：

"也想过。就是汉奸狗腿子活动得厉害，怕事的人都不敢搞，好多村里都摸不清……"

少奇同志说：

"你这就提出问题了。敌占区同解放区不一样，同游击区也不一样。在这里，敌人统治很残酷，帮敌人做事的汉奸、特务、狗腿子、地主们当道，群众是不容抬起头来的。但是，压迫得越狠，群众同敌人的矛盾也就越厉害，越尖锐。群众口里虽然不敢说，心里就是要求反对他们。只是没有人去提醒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

"咱能行。"县委书记天真地插话说。

少奇同志接着说：

"在敌区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是不容易的，特别在敌伪的据点控制最严的地方。你们当然也有了一些经验。我看武工队的形式可以试一试。"

县委书记问道：

"什么叫做武工队呢？"

"我正要向你介绍。"少奇同志说，"不过，这要和你们敌占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

于是，少奇同志简明扼要地告知他武工队的组织形式、作用和工作方法等，并指出如何与当地情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和办法。

县委书记表示说："这能办到。"

少奇同志又告诉他，还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以及调查研究什么和如何去进行调查研究。同时，还必须选择一些

有能耐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都要是可靠的，去到敌伪据点、敌伪控制严密的地方，和我们还没有工作的区村，利用关系埋伏起来，做秘密工作，配合武工队或游击队的活动，去发现积极分子，和他们交朋友，慢慢地就能建立起地下组织。还有，武工队必须要告知连同汉奸在内的所有人，鬼子一定不久就要失败，胜利必定是中国人民的。不消说，平遥也定是平遥人民的。要使群众看到将来，坏人也应该想想将来。要让群众有胜利信心，眉飞色舞；让敌人、汉奸、狗腿子苦恼、恐慌，愁眉苦脸。

县委书记两只乌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越听越有劲。他精神奕奕地向少奇同志表示：

"这个工作大得很，有些问题还要军区帮助。虽然有不少困难，但是能向首长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少奇同志最后说：总而言之，要记住毛主席的话，紧紧地依靠群众，尽量缩小打击面，争取多数，该中立的就中立他，至死与人民为敌的坏蛋要坚决予以打击。同时，一定要把地下斗争和游击队、武工队的斗争密切结合，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相结合，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在敌区，这一定要结合的恰当，切不可暴露自己，使自己遭受损失。这里有着很多新的东西，应该好好地去掌握它，运用它，发展它。还有，战时的敌区情况变化很大、很快，应该常去了解这些变化，深入、全面、具体而又及时地掌握情况，根据情况发展改变工作方式方法，经常总结经验，以适应新的情况和要求。最后，少奇同志鼓励县委书记说：

“你搞地下工作已有不少经验，看来也很精细，相信你们会搞好的。预祝你们工作胜利。”

县委书记满怀感激的心情说：

“首长的指示对咱们今后工作的门道，都摆得明明白白了。听了你这两天的谈话，咱自己感到大大提高了一步。”

胜利到延安

太岳区党委和司令部预先和我晋西北联系好了的，由第三分区司令员杨秀山同志率领队伍来接少奇同志，并如期派出联络参谋，到预定地点和平遥游击队接头。

晚上，我们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离开了大良庄，前进到距太汾公路上贤庄五里地的一座荒凉的古庙旁边，停了下来，等待三分区联络参谋到来，然后准备以急行军越过太汾路封锁线。

同志们耐心地等待着联络参谋，同时注意了解上贤庄一带的动静。一直等到半夜，联络参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而在这时，县委书记临时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上贤庄的前前后后都象死一样的沉寂。县委书记又急又愁，不知道三分区的部队是否按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觉得进退两难。这里是敌占区的中心地区，继续等下去，必然要暴露目标，危及少奇同志和大家的安全；但是，如果冒冒失失地穿过太汾路，万一三分区因临时发生情况，没能派出军队来，又将冒极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书记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和请示。

少奇同志问我们大家的意见怎样？有的同志当即说：

“古庙离敌人据点上贤庄只五里，如果敌人有行动，上贤庄必然免不了有人声、狗叫，可是现在没有半点动静，可见敌人还没有行动。”

有的同志说：

“我们已经走到这儿了，再返回大良庄，也很可能暴露目标，此外又没有比较可靠的隐蔽地方。”

少奇同志依旧象他惯常那样，慈祥地对县委书记说：

“你是了解情况的，又是和群众有联系的，我们对这儿的情况完全无知，因此，还是要你下决心。联络参谋没有来，可能是派的部队还没有到达。据我们了解，敌人对三分区的活动较为频繁，反反复复地实行了极端残酷、野蛮的‘三光政策’。三分区临时遇到什么情况也是可能的，我们经过了这么长的敌占区，很难保证不走漏消息。”

接着，少奇同志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说：

“敌人如果有埋伏，他也不会哇哇叫，引起人声和狗叫；老百姓看到日本鬼子来了，也可能都躲在家里不出来。因此，没有发现什么声息和动静，不能就作出没有敌人埋伏的判断。我以为还是按照原来预定的步骤行动好一些。必要时可以回大良庄去，现在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再隐蔽一天是可以的。”

讲到这里，他略停顿了一会儿，又非常谦和地望着县委书记说：

“你只把我的意见作为参考，不要动摇你的决心。在这

里，我们是服从你的。”

少奇同志对他的信赖和尊重，使得县委书记深受感动。

当夜，我们返回了大良庄。第二天又派人出去侦察，没发现有什么动静。少奇同志决定当夜立即越过太汾公路。第二天拂晓，我们顺利地到达了三分区，和杨秀山司令员率领的部队会合了。看到了自己的部队，少奇同志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亲切的笑容。

杨秀山同志向少奇同志汇报了情况，并且说：

“据侦察报告，您到达古庙的头一天晚上，有一百八十个敌军在上贤庄埋伏了一夜，他们谣传说是朱总司令要经过这里。第二天拂晓时才撤走了。”

少奇同志听了以后，笑着说：

“我们是马列主义，敌人是资本主义，和我们捉迷藏，他总是要输的。”

过了一会儿，少奇同志又向杨秀山同志交代说：

“三交这一带，敌人‘三光政策’搞得很厉害，现在的问题是，你们如何设法帮助群众过冬，把基本群众保全下来；明年春季如何帮助群众恢复生产。这是两件很重要的大事，应该全力以赴，采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步骤做好这两件事。”

杨秀山同志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后，感慨地说：

“群众的损失实在太重了，我们必须拿出最大的努力来帮助老乡们重建家园。”

“重建家园这个问题嘛，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慢

慢地来。”少奇同志说到这里，凝视了大家一会儿，接着说：“只要把日本鬼子赶走了，他们就会建立起比过去更好的家园。”

少奇同志坚定的话语和乐观的情绪，感染了大家，杨秀山同志和我们站在一旁，都满怀信心地连连点头。

已是严寒的十二月了，晋西北地区山高风大，满目是冰雪世界。前面，我们要通过回到延安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日寇为了分割三分区和晋西北军区的联络，战车和坦克昼夜不停地轮流在交离公路上往来巡逻。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我们还得夜行军。三分区和地委的同志们，担心少奇同志的身体抵不住那样的严寒。少奇同志不在意地说：

“三分区和晋西北军区的部队和群众，不都是常常夜间活动么？你们都能顶得住，我们为什么不能克服这种困难呢？”

从夹着冰雪的河流中趟过，我们离开了交离公路西侧的平川地，进入高寒的山区。迎面吹来的北风，真比刀刺还难受。每个人的眉毛以及男同志们的胡须上，都结了冰珠子。爬山时不断流出的热汗，浸透了衣服，被冷风一吹，变得象玻璃一样，一动就刷拉刷拉地响。身上冷，嘴里渴，肚子饿，嗓子和鼻孔干得象要冒烟了，那种味道真不好受。在这高寒的山上，没有村落和住户，想找个地方歇歇脚、缓口气都办不到。

在这艰难的情况下，少奇同志仍然象他惯常一样，兴趣盎然地给大家讲故事。他告诉大家说：

“前面那座很高的山，就是吕梁山。山上有个人祖庙，我也上去过，庙中有历代的碑记，说人类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起源的……那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你们将来有机会也可以上去看看。”

大家为这个有趣的故事所吸引，忘却了寒冷和饥渴。女同志们都听得格格地笑。大家一边听着，一边鼓着劲走，就这样过了高寒山区。

这时，少奇同志一边抹去眉毛上的冰凌，一边幽默地说：

“中国什么地方的气候都是比较好的，最冷的地方也不至于使人的血液流不动。”

尽管少奇同志自己也冷，也疲倦、饥渴，可是他总是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总是鼓舞着大家不断地前进。就这样，我们经历了十个月的夜行军生活，经历了各种艰险以后，终于跟随我们敬爱的少奇同志，于十二月底平安地返回了革命圣地——延安，看到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在一起了！

书号10009·648
定价　0.39元